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二〇二二年三月第一期(总第九十三期)第二十四卷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收录期刊

2022
第1期

2022年3月 第1期(总第93期)第24卷
Mar.2022 No.1 Sum.93 Vol.24

云南社院院务咨询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把“特色立院”办好办实

1月12日，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务咨询委员会召开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结合庆祝建党百年和党史学习教育，围绕学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实施意见》、省委印发的《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实施细则》，总结2021年工作，咨询2022年工作，对学院“十四五”规划提出“六大工程”之一的“特色立院”进行咨询和协商。



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云南省委主委、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院务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彬和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院务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学院党组书记蔡勇主持。



徐彬说，建好用好院务咨询委员会平台，发挥好各位委员作用，是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办学治院经验成绩的应有之义，也是着眼第二个百年、更好地服务我省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内在需要，更是坚持新型政党制度、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他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确保学院办学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他希望每一位院务咨询委员会委员积极想办法、出主意、发挥作用，为有力推动“联合党校”在正确方向上高质量发展作出努力；围绕统战特色和云南特色开展协商咨询，推动“特色立院”工程在十四五期间见成效；持续支持社院建设，不断完善院务咨询委员工作机制，一起把“联合党校”办好。

李涛说，2021年省社院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教育培训工作，教学质量有提升、智库建设有突破、文化交流有抓手，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作用，院务咨询委员会这个平台作用发挥得很好。他要求省社院坚持“社院姓社”办学方向，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之成为贯穿全部教学活动、科研活动、办学活动的灵魂；主动服从服务统战工作大局，推出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服务我省统一战线事业；发挥好院务咨询委员会作用，为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力量。



会上，学院常务副院长何云葵介绍了学院2021年的工作情况及2022年工作打算。各位委员围绕《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2021—2025年发展规划》所提出的“六大工程”之“特色立院”进行协商咨询，在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加强统战理论研究、打造学院统战特色课程等方面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

云南社院副院长陈友康，党组成员、副院长杨春禄，党组成员、秘书长谢灿坤及各处室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季刊·2022年第1期(总第93期)

本刊顾问

杨保建 徐 彬 高 峰 李玛琳 喻顶成
张宽寿 杨 洋 李学林 杨晓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蔡 勇
常务副主任:何云葵
副 主 任:陈友康 杨春禄 袁光兴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寅平 李从贤 杨松禄 钟瑞华
侯晓芳 诸 芳 谢灿坤 魏贵华
主 编:陈友康
副 主 编:杨松禄

编辑部

主 任:杨松禄
副 主 任:罗 雷 李亚强
责任编辑:念兴昌 朱家麟 刘林华
英文翻译:李志凌
封面设计:严维国
编 务:郭周静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目 次

● 统战理论与实践

- 近二十年国内统一战线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肖光荣, 彭佩文 (5)
- 构建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长效机制论析
——以辽宁省各民主党派参与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为例 崔晓彤 (16)
-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凝心聚力的历史经验及现实启示 陈思诗 (23)
- 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的广东经验与启示 杜联藩 (29)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蕴与培育路径
——基于对香港民众国家认同教育问题的思考 王承就, 赖慧婷 (35)
-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发展与建构基础 秦桂芬, 王毓川 (44)
-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唐 伟 (53)

● 历史与文化

- 城市符号的沉淀与延续
——昆明金马碧鸡坊的文化解读 崔 璨, 赵文娟 (60)
- 内涵·内核·内力
——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论析 太星南 (68)
- 论早期彝族史诗之美学价值和现实社会功用
——以早期楚雄彝族史诗为例 苏文韬 (76)

[期刊基本参数:CN53-1133/D*1999 *q*A4*120*zh*P*¥9.00*1000*15*2022-01]

●云南故事

用地名讲述红色故事

——云南政协报社新媒体助力党史学习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张莹莹, 杨丽娅 (82)

少数民族的优秀干部——张冲 李志洪 (87)

●发展问题研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探析 王 旭 (94)

玉溪推进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研究

——基于苏州、重庆、成都、昆明等城市和玉溪的比较 李 萌, 李辰航 (102)

现代化背景下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建构 赵 阳 (112)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下简称本刊)刊发的文章,内容及观点均由文章署名作者自负文责,不代表本编辑部意见。本刊保有对来稿的编辑修改权,若不同意编辑修改,来稿时请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在论文发表后由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费中已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著作权使用费及论文的稿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1, 2022

Contents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the United Front

- A Review with Expectation of Domestic Researches on the United Front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 Xiao Guangrong, Peng Peiwen(5)
-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with Lasting Effect for Democratic Parties' Specific Supervision:
A Case of Democratic Parties' Participation in Supervision over the Undertaking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Cui Xiaotong(16)
- The CPC's Significant Performances and Experience to Achieve Concerted Effects in the Time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Chen Sishi(23)
- Revealing Guangdong's Experien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United Front Du Lianfan(29)

Forg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 Modern Connotations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and Ways for Further
Reflection on the Guidance as to Hong Kong People's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 Wang Chengjiu, Lai Huiting(35)
-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 Wang Yuchuan, Qin Guifen(44)
- Forg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ang Wei(53)

History and Culture

- Accumulation and Promotion of Urban Sign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Jinma and Biji Memorial Gateways
in Kunming Cui Can, Zhao Wenjuan(60)
- Connotation, Core and Creativity: On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CPC's Culture of Revolution
..... Tai Xingnan(68)
- On the Aesthetic Value and Social Function of the Yi's Old Epics: A Case of the Yi's Old Epics
in Chuxiong City Su Wentao(76)

Tales about Yunnan

- Narrating Patriotic Tales by Means of Place Names: Learning and Inspiration from Yunnan CPPCC
Newspaper's New Media to Facilitate Education about the CPC's History
..... Zhang Yingying, Yang Liya(82)
- Zhang Chong, an Excellent Cadre from Ethnic Minority Li Zhihong(87)

Issues on Development

- A Probe into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civilization Wang Xu(94)
- Study of Yuxi's Promotions of New Form of People-centered Urbaniz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uzhou,
Chongqing, Chengdu and Kunming Li Meng, Li Chenhang(102)
- On Approaches to Revitalize Rural Culture dur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Zhao Yang(112)

统战理论与实践

近二十年国内统一战线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肖光荣, 彭佩文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创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也是独具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研究议题。新千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就统一战线的内涵外延、生成逻辑、发展历程、当代意义、优化理路等深入探讨,成果累累。从概念辨析来看,统一战线不仅具有工具属性与系统属性,文化属性也是构成统一战线意蕴谱系的重要一极。从生成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是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统一战线提供了文化土壤,党的百年奋斗之路是统一战线的实践基础。从发展历程来看,学界主要从历史脉络、关键人物、成就经验等视角进行梳理。从当代意义来看,知识体系、国家治理、国际秩序是与统一战线高度关联的研究路径。从优化理路来看,关键是要不断拓宽视野、更新理念、完善纲领、健全机制、强化主体。现有的统一战线研究在概念辨析、研究深度、逻辑论证、研究思路、研究手段等方面尚存薄弱之处,需要在学理阐释、理论逻辑、实践导向、研究方法等方面继续深化和拓展。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统战工作;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2) 01-0005-1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实践道路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百年征程从筚路蓝缕到春华秋实,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地建立和巩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因而以统一战线视角观察中国政治发展成为重要研究心法。系统梳理近二十年统一战线相关文献发现,学者们主要从内涵外延、生成逻辑、发展历程、当代意义、优化理路等对这座学术富矿展开精细发掘,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一、统一战线的意蕴之思

本文拟讨论的统一战线专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而非泛指历史上或现实中出现的各类政治联盟或利益共同体。研究者力图从多重维度对统一战线相关概念进行开拓性阐释和适当延展,使统一战线的基本内涵更加立体饱满。

(一) 术——工具维度

从工具维度观察统一战线是较为常见的做法,陈明明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70年发展历程研究”(19BDJ019)。

作者简介: 肖光荣,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代表人士统战理论湖南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政党政治、中共党史;彭佩文,湖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学。

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是直接作为政治斗争的策略,中心任务是通过对我友关系的处理,改变力量对比、赢得生存发展机会。^①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武装斗争的地位相应淡化,但统一战线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法宝。^②常士闾认为,新时期统一战线不仅依然肩负着凝心聚力的使命任务,更逐渐成为推动现代化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③

(二) 势——系统维度

工具维度在现实中展开,赋予运转起来的统一战线以系统属性,从而使统一战线以特色共同体显形。林尚立强调统一战线内含一体多元结构,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④杨素群、惠敏认为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和显著的社会性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共同体的独特气质。^⑤张艳娥论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呈现出以“阶级联合”为主到融入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的转变过程。^⑥林华山指出,当代中国与统一战线内源互构,统一战线横向构建领域共同体,纵向构建围绕中心任务的共同体,层次上构建从初级到高级的共同体。^⑦

(三) 道——文化维度

有研究者注意到,统一战线不仅融会工具属性与系统属性,文化维度也构成了统一战线意蕴谱系的重要一极。肖存良认为,有必要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统一战线,而不能仅仅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略和策略。^⑧赵宪军指出,统战文化是党在长期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不断探索、总结、创新的宝贵经验。^⑨叶文龙认为,统战文化以“和”为旨归,是党执政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⑩杜青林强调,统战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⑪根据从统一战线文化概念中萃取的“同心圆”理论,叶子鹏、徐皇冠认为,“同心圆”理论浓缩了中国共产党各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要义,兼具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使命。^⑫

二、统一战线的生成逻辑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⑬通过文献梳理,学界主要从理论、文化、实践等层面回溯统一战线的生成维度,即统一战线不是飞来峰,其诞生是历史与现实多重要素的合力助产。

① 陈明明:《现代国家建设视域下统一战线的三重面相:策略、战略与治道》,《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5页。

② 蔡宇宏:《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法宝》,《江汉论坛》2009年第6期,第29页。

③ 常士闾:《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第4页。

④ 林尚立:《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建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9期,第1页。

⑤ 杨素群、惠敏:《论统一战线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19页。

⑥ 张艳娥:《在阶级联合与共同体之间——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双重属性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第51页。

⑦ 林华山:《共同体视角下统一战线的战略功能与发展趋向》,《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26页。

⑧ 肖存良:《大一统:中国统一战线的文化基础》,《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35页。

⑨ 赵宪军:《新形势下统战文化与文化统战探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56页。

⑩ 叶文龙:《试论新时期统战文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24页。

⑪ 杜青林:《大力加强统战文化建设》,《求是》2012年第7期,第7页。

⑫ 叶子鹏、徐皇冠:《使命与复构:同心圆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在场——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维度视角》,《理论导刊》2019年第9期,第59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页。

（一）理论基础

学者们大都赞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无产阶级大联盟以及各阶级广泛联合的论述，认为它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理论来源。李新芝、钟联国认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属性要求和特质体现，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也将同时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战线战略策略思想。^① 路璐指出，列宁创制了统一战线术语，丰富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政治联盟的内涵。^② 鲁法芹、赵彩燕更是论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将统一战线上升到“国体”的高度。^③

（二）文化根基

现有文献表明，学界对统一战线与传统文化的契合展现出高度关注，不少研究者肯定了传统文化在统一战线中的深远影响。何虎生、赵文心认为，传统文化中的“和”“合”观念是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重要依托。^④ 从与历史惯性的耦合逻辑来看，商莹、蒋满娟指出，统一战线的文化基因内承于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大一统、天下为公、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丰厚理念遗产。^⑤ 宋云高、梁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统战意识，它既是统一战线的逻辑起点，又能对统一战线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⑥

（三）实践依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肇始于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必要性来看，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因而必须联合党外力量的无产阶级政党使命召唤。^⑦ 从可能性来看，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和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对比做出的战略判断，是在分析、研判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利益诉求后的的斗争策略选择。^⑧ 如果说，必要性与可能性只是给定了初始条件，那么统一战线的生成必然性来自于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等伟大胜利的光辉实践。^⑨

三、统一战线的历程考察

统一战线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担负着独特的历史使命，并构成社会历史总过程的一部分。关于统一战线运动的历史性考察，学者们给出了多样的研究视角与路径。

（一）对历史脉络的梳理

魏晓东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一个复杂而艰辛的历史进程，从领导权实现的程度论析，可以分为争取领导权、巩固领导权、完善领导权三个阶段。^⑩ 从自身成长周期来看，郝丽的分类较为典型，即百年来统一战线的历史演变可划分若干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改革开放以来至十八大的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

① 李新芝、钟联国：《百年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演进的历史逻辑论析》，《理论导刊》2021年第7期，第12页。

② 路璐：《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概念的内涵及其演进》，《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第2期，第63页。

③ 鲁法芹、赵彩燕：《论作为国体的统一战线》，《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年第1期，第34页。

④ 何虎生、赵文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精髓要义：法宝、和合与平衡》，《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123页。

⑤ 商莹、蒋满娟：《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社会科学家》2020年第5期，第135页。

⑥ 宋云高、梁琨：《中国传统文化与统一战线的关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45页。

⑦ 丁俊萍、颜苗苗：《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统一战线工作的历程和经验》，《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第11页。

⑧ 杨荣国、张新平：《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成就与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11期，第104页。

⑨ 高春月：《关于统一战线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考察》，《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S1期，第264页。

⑩ 魏晓东：《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历史演变》，《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1期，第99页。

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① 从与此相应的使命目标视角出发,林华山、龚静阳提出统一战线发展的整体性逻辑包括:政治逻辑——服务党建国家、社会逻辑——增进人民团结、目标逻辑——致力民族复兴、价值逻辑——追求命运与共。^② 肖存良则从政党、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的视角出发,指出统一战线经历了社会革命的战略武器、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现代化的推动力量等渐第转型。^③

(二) 对关键人物的聚焦

学界主要围绕中共核心人物的悟思进行把握,重点关注领袖人物们的思想要义及价值贡献。从特定个人角度看,李伟认为,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并成功实践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独立自主、求同存异、又联合又斗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等一系列战略策略。^④ 刘惠强调,毛泽东统战思想为国家的制度建设烙下了鲜明印记,而且对于新时期实现中国梦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⑤ 李小宁认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解决了同盟军问题;争取最广泛的爱国主义大团结是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贡献。^⑥ 此外,关于统战领域中其他重要人物如周恩来、李维汉、林伯渠的研究经久不衰,关于中共历代领导人统战思想的比较研究也日趋活跃,如莫志斌认为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统战思想并进一步创新了工作方法。^⑦

(三) 对成就经验的总结

总体来看,学界对统一战线的历史定位给予高度评价。如肖存良指出,统一战线始终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在整个国家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⑧ 张峰强调,百年来统一战线对于政权建设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政权具有统一战线性质,更在于统一战线对建立、巩固和完善人民政权起着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⑨ 何虎生、赵文心也赞成这一观点,认为统一战线是党领导人民建构现代中国时所选择与践行的独特道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亦可表述为“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新中国”。^⑩ 古语云“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周述杰、朱小宝认为,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加强对统一战线史的梳理总结:一是要弘扬统一战线优良传统;二是要吸取统战工作经验教训;三是要传承统一战线职责使命。^⑪

四、统一战线的当代意义

(一) 从知识体系来解读

统一战线的研究深度与知识生产的广度与厚度相关。从学科建设层面看,百年来统一战线的

① 郝丽:《党的统一战线百年回顾:从历史逻辑到现实定位》,《学海》2021年第3期,第22页。

② 林华山、龚静阳:《建党百年统一战线发展逻辑:从“联盟之术”到“强国之道”》,《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5页。

③ 肖存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地位与作用》,《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1页。

④ 李伟:《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的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21页。

⑤ 刘惠:《毛泽东的统战思想及其对当前统战工作的启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3期,第34页。

⑥ 李小宁:《统一战线本质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3页。

⑦ 莫志斌:《习近平统战思想对毛泽东、邓小平统战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22页。

⑧ 肖存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地位与作用》,《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1页。

⑨ 张峰:《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权建设中统一战线的地位和作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第5页。

⑩ 何虎生、赵文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精髓要义:法宝、和合与平衡》,《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123页。

⑪ 周述杰、朱小宝:《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的辩证思维向度》,《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年第4期,第14页。

实践发展是本土化研究的优质场域,当前的实际需要也为统一战线学科建设提供了重大契机。^①周述杰呼吁,加快学理化进程,以推动统战学学科建设,带动专业人才培养。^②杨君武以统战学、统战理论、统战研究等相关概念切题,对统战理论学科建设做了赓续探索。^③从理论指导层面看,通过考察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互动,刘继华认为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始于共同的理论原点,统一战线理论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指导价值。^④从话语构建层面看,明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演进历程和内蕴的社会发展逻辑,是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⑤

(二) 从国家治理来展开

政党政治的中国逻辑、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运行机制以及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等赋予统一战线以国家治理意蕴,使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⑥

民主发展视角。林尚立认为,在党领导国家的视角下,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民主之间有了更丰富的制度契合性,如统一战线是以实现各阶级联合统治的人民民主为重要初衷。^⑦与此论点相近,蔡宇宏认为统一战线的协商理念、组织形式和制度架构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丰富的政治与制度资源,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坚持共产党领导和人民主权原则。^⑧根据政治过程理论,统一战线可以促进意见表达的全面性、保障信息传输的真实性,也可以通过协商程序的规范化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奠定基础。^⑨刘国普基于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视角,认为统一战线融汇政治吸纳、政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功能,为人民民主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实践路径和制度平台。^⑩

社会整合视角。统战工作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统一战线作为社会成员基于共同利益结成的联盟,能够凭借其整合吸纳功能化解利益冲突,并在提升人民幸福感的过程中提高国家治理绩效。^⑪统一战线践行以人为本,有凝心聚力的价值追求,不断运用求同存异、求同消异、求同求异等基本方式,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弥合了社会分歧,激发了社会成员的热情

① 丁三青:《关于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的再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17页。

② 周述杰:《关于统战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几点思考》,《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23页。

③ 杨君武:《统战理论学科建设若干相关概念辨析》,《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24页。

④ 刘继华:《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33页。

⑤ 张超、曹文宏:《中共统战话语体系的百年演进及其内在逻辑》,《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5页。

⑥ 雷振文、姚祥翔:《统一战线:国家治理意蕴的政治学分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40页。

⑦ 林尚立:《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建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9期,第1页。

⑧ 蔡宇宏:《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生性要素》,《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年第3期,第41页。

⑨ 于丹、杜美玲:《统一战线在优化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学术探索》2015年第10期,第16页。

⑩ 刘国普:《统一战线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探析——基于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视角》,《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42页。

⑪ 孙冲亚、何祥林:《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中的统一战线:功能、挑战及其进路》,《理论月刊》2021年第7期,第51页。

和活力。^①统一战线开放包容、兼容并蓄、互动成长的整合原则和多元化的社会相契合,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和“统筹兼顾”的基本原则,在大统战理念下依托统战平台妥善处理相关问题并兼顾各方利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②

国家团结视角。统一战线工作领域中的五大关系都是国家建设中所必须面对的基本议题,巩固新时代的统一战线有利于协调好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新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③统一战线之中的团结与联合建立在平等、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的基础之上,统一战线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五种关系”的和谐,最大限度地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指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奋斗方向。^④在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方面,提升统战工作的覆盖面和打捞能力,有助于形成理性包容、团结互助的良好风尚,助推建设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⑤

执政能力视角。刘延东较早关注到了统一战线与执政党建设的互动成长,从宏观层面来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以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实现最广泛的大团结大联合,扩大了执政基础,丰富了执政资源,优化了执政环境。^⑥从夯实合法性基础来看,徐小明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即统一战线求同存异的工作原则与共生共荣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转型期的统一战线能够有效吸纳和统筹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利益诉求,保障党领导和执政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认同与支持。^⑦统一战线的民主监督虽构成了制约,但也是一种积极力量,有助于增强我党拒腐防变的能力,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民主性、科学性、先进性,督促领导干部依法正确行使公共权力,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⑧

(三) 从国际秩序来阐发

价值关切维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看,“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的成功,是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出场的自信依据;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具有“正外部性”,表达了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关怀。^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肩负着“人类解放”的历史诉求,统一战线从国家主体扩大到世界范围符合历史进步潮流;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中国积极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和增进人类社会福祉的价值取向。^⑩有学者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阈探讨统一战线与国际舞台的耦合,认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引领、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坚实基础的新时代国

① 张献生:《求同存异 求同消异 求同求异——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基本实践方式》,《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33页。

② 徐振华:《新时代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重挑战与功能重塑》,《领导科学》2020年第18期,第60页。

③ 杨卫敏:《新时代统一战线新型五大关系论》,《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5期,第33页。

④ 阿力木·沙塔尔、胡弘弘:《“爱国统一战线”的规范意义及规范体系构建》,《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第69页。

⑤ 王小鸿:《论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原则》,《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第8页。

⑥ 刘延东:《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和作用 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求是》2004年第22期,第3页。

⑦ 徐小明:《论当代中国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兼论统一战线的社会整合功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203页。

⑧ 覃辉银:《统一战线与“四个全面”:战略的协调和拓新》,《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16页。

⑨ 门洪华、李次园:《构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与实践》,《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第3页。

⑩ 黄延敏、祁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底蕴与时代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11页。

际统一战线具有广阔的前景。^①

路径实现维度。从理念构思出发,张艳娥认为,要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共同体”思维架构引领统一战线建设,塑造将民族国家诉求与世界历史发展要求一体化的无产阶级“大统战”理念。^②从价值取向来看,必须坚持国内统战与国际和平相统一、和平发展与利益一体化相统一、合作共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统一、中国梦与世界梦相统一。^③从对策设计来看,一是要以外交战略大局为重;二是组织和开掘统战工作的国际社会资源;三是依托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优势发挥统一战线国际化的引领作用。^④

对比观察维度。一方面,后发国家由于面临着国家转型、社会整合、经济发展、民主建设等压缩性现代化挑战,加之自身缺乏建构现代化民主所必需的同质性条件^⑤,套用西式民主化模板后反而转型困难,致使政治发展力低下,甚至沦为衰败国家。另一方面,西方竞争型政治屡屡走向极端,引发的深远影响广泛波及社会层面,加剧了社会对立与撕裂;政府、市场、社会中充斥着分化与对抗,并不断恶性循环^⑥。在治乱对比视角下,作为中国特色道路组成部分的统一战线本身内蕴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减少内耗的客观要求,在有序吸纳社会意志的同时又能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以政治和谐助推社会和谐。^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追求政治稳定、执政有力、参与有序、社会和谐,既有利于塑造一种既讲民主又讲纪律、既活泼又严肃的政治氛围,又能以科学决策、连贯施策不断促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⑧

五、统一战线的优化理路

(一) 谋势——统战视野新拓展

首先要树立全球眼光。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我们必须把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统一战线的实施路径置放在世界视野中考量,以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治理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⑨其次要顺应时代主流。在内外联动和相互依赖成为当今世界突出特征的当前,中国应凭借基于共建、共享和共赢目标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着力从价值、主体、载体、平台、沟通渠道和保障机制等方面探究构筑国际统一战线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以期形成助力于中国梦和世界梦实现并同频共振的联合力量。^⑩再次要做强内部格局。林华山、罗振建认为,必须坚持巩固政治

① 贺善侃:《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宗旨、价值与载体》,《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40页。

② 张艳娥:《在阶级联合与共同体之间——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双重属性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第51页。

③ 刘新庚、肖瑞建、刘邦捷:《论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变革与现代创新》,《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8期,第47页。

④ 朱新光、张文潮:《中国统一战线的国际化路径》,《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29页。

⑤ 杨光斌:《一些西式民主化转型国家困境的深层原因及启示》,《红旗文稿》2014年第13期,第14、15页。

⑥ 鹿金友:《国家极化与当代欧美民主政治危机》,《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53—55页。

⑦ 商莹、蒋满娟:《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社会科学家》2020年第5期,第135页。

⑧ 殷啸虎:《统一战线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5页。

⑨ 林华山:《新时代统一战线使命任务:国家视野下的整体表述》,《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56页。

⑩ 亢升、范秀娟:《“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国际统战工作新进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160页。

秩序、增强治理效能、优化社会结构、营造外部环境、建设话语体系的五位一体发展逻辑。^①

（二）明道——统战理念新飞跃

一是要坚定人民情怀。统一战线工作必须顺应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从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入手，维护人民群众在治理进程中的根本利益，把协调和整合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价值指向。^②二是要弘扬主流价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理顺统一战线各项关系，通过政治伦理宣传和教育，使统一战线始终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③三是要浸润文化内涵。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运用现代观念、现代方法和现代话语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重构，从而正确地把握继承、借鉴、吸纳与创新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展统一战线事业。^④四是彰显世界关切。陈翔认为，在强调多样性文化共生共荣“伦理共和”的指向下，树立伦理共和自信、构建伦理共和模式、形成伦理共和的中国特色是完善“大统战”格局的显途，进而使肩负“在一起”伦理启蒙的统战理念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重新定义人类和平、发展等共同价值。^⑤

（三）优法——统战纲领新完善

在性质定位上，基于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钱再见认为，统一战线所要解决的就是政治上的“人心”和治理中的“力量”问题，因此“凝聚人心”依然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政治使命，要旨在于夯实共同的政治基础、凝聚最大的政治共识和巩固广泛的政治联盟。^⑥在任务目标上，覃辉银强调，统一战线应该发挥自身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智力密集、联系广泛、协调利益等功能，更好地发挥服务“四个全面”的优势和功能。^⑦在根本原则上，必须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方面可从更新领导观念、完善领导机制、改进领导方法三个方面综合考虑。^⑧徐振华指出，要探索和总结规律、把握方向，以坚持政治领导形成共识，以照顾同盟者利益激发动能，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实现统战工作新跨越。^⑨

（四）强术——统战机制新作为

一是制度领域。包心鉴认为，统一战线既是一项重大政策措施，又是一项基本制度安排。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关键在于进一步提升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⑩二是法治领域。赵玉增、陈洪宗认为，首先要确立基本的“法治理念”，同时还需要注意养成“四种意识”，即规则意识、程序意识、权利意识和转化意识，以提高统战工作的法治化水平。^⑪三是信息领域。丁忠毅、黄一鑫认为，新时代数字统战的意识和能力亟待提升，并给

① 林华山、罗振建：《新型国家形态的独特道路——以统一战线为视角》，《理论与改革》2019年第6期，第14页。

② 尔肯江·吐拉洪：《把人民至上的崇高理念落实到统战工作实践中》，《红旗文稿》2020年第14期，第4页。

③ 杨晓光：《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统一战线构建》，《人民论坛》2014年第34期，第206页。

④ 宋云高、梁琨：《中国传统文化与统一战线的关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45页。

⑤ 陈翔：《伦理共和视角下爱国统一战线的国际话语体系构建》，《理论导刊》2020年第5期，第71页。

⑥ 钱再见：《“人心”与“力量”：统一战线的政治使命与治理功能——兼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68页。

⑦ 覃辉银：《统一战线与“四个全面”：战略的协调和拓新》，《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16页。

⑧ 魏晓东：《完善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之我见》，《学习论坛》2016年第7期，第12页。

⑨ 徐振华：《新时代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重挑战与功能重塑》，《领导科学》2020年第18期，第60页。

⑩ 包心鉴：《开创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局面的根本纲领——论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1期，第3页。

⑪ 赵玉增、陈洪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方法做好统战工作》，《新视野》2016年第5期，第87页。

出了解答之策: 加强各级统战部门信息化建设、建立完善部门间网络统战协调联动机制、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搭建交互式网络统战工作平台。^① 四是宣传领域。杨卫敏指出, 新形势下加强统一战线宣传, 要牢固树立“分众统战”“争取中间地带”和“善用新媒体”的理念, 建立健全统一战线舆情响应、党外人士发声、网络界人士统战工作、有效组织保障等四项机制。^②

(五) 育器——统战主体新改进

统一战线的良好运转离不开完善的主体建设。在执政党视角下, 一是需要担负起强化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凝聚国家治理价值共识的责任; 二是要不断健全和提升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和促改革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③ 参政党视角下, 有四条路径说, 即加强教育与研习、强化质量和特色、补短板 and 弱项、深化学习和实践。^④ 在党外干部视角下, 陈剑认为, 必须抓住机制构建综合施策, 以大胆用人、精心育人、全面树人、合理选人为导向, 完善党外干部选任、培养、监管、储备机制, 打造满足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党外干部队伍。^⑤ 在学科建设视角下, 首先要着眼于实践发展要求, 不断创新性发展统一战线理论, 实现统一战线的学理研究发展与政策实践落地的良性互动。^⑥ 其次遵循事物发展规律, 近、中、远三个目标逐步推进;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头努力。^⑦ 再次推动相关体制机制建设, 即加强学科“知识形态”的建构、整合学科建设力量、统筹安排学科建设任务。^⑧

六、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整体来看, 近二十年国内围绕统一战线内涵定义、生成逻辑、发展历程、当代意义、优化路径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 并形成了不少共识性观点, 极大地丰富了统一战线的学术资源, 且探索日益蓬勃发展。不过, 现有研究仍存一些疏漏之处, 需要从若干层面持续发力。

(一) 研究局限

研究概念不明。有学者在研究统一战线相关概念时, 会出现将战略策略与统战系统混淆或等同的现象。战略策略指涉工具属性; 统战系统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格局、一类结构, 如共同体形态。与之对应的是一些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概念缺乏前提性反思, 表现为笼统地将统一战线套用在各个领域, 似乎统一战线是个万能筐, 什么都能往里装; 或者统一战线具有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这类思路特征揉进文章中时常以重复论证显现, 如以“统一战线”推进统一战线的发展, 类似一些人对“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概念工具的滥用(这类理论的最大问题就是把社会结构彻底主观化了, 然而社会结构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⑨)。统一战线

① 丁忠毅、黄一鑫:《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统战治边方略》,《云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109页。

② 杨卫敏:《新形势下的统一战线宣传思想工作:机遇、挑战和对策》,《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19页。

③ 王萌、柏维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机理分析》,《行政论坛》2021年第5期,第30页。

④ 高拴平:《新时代参政党自身建设路径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年第1期,第76页。

⑤ 陈剑:《新时代党外干部队伍建设: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理论导刊》2021年第5期,第35页。

⑥ 叶子鹏、黄甄铭:《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演进与历史规律——以党史为中心的考察》,《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45页。

⑦ 贾小明:《统一战线理论学科化的目标与进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11页。

⑧ 张有明、张凤玲:《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创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30页。

⑨ 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190页。

同样具有工具价值且自身就是目的,当“统一战线”什么都能包含的时候,也就是对其解释力和说服力的伤害。

研究深度不够。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出台后,学界掀起了统战领域研究热潮,相关热点与体系初见规模。但与攀升的热度相比,创新度依然稀薄,研究视角的重复无疑加剧了这一现状。很多学术成果拥挤在对统一战线的文本解读、理论阐释与价值探讨,有说服力的少见,在诸文章中表现为只道其然却不论其所以然。例如,研究者大都津津乐道于统一战线的优势,但对这种优势如何具体转化为实际效能的研究覆盖不全、深度不够,前瞻性、预测性的研究成果极为稀缺。此外,在当前研究中,人们能够发现统一战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并以此来强调要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逻辑来设计、安排统一战线的运行方式,却忽视了党的历史、国家制度以及中国深层次的传统因素、文化因子、社会结构对统一战线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逻辑论证不足。共识是统一战线发起的逻辑起点,其一直影响着统一战线的走向,可以说是统一战线的根与魂。研究者肯认凝聚共识的重要性,并踊跃给出对策建议。但事实上,知识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价值,承认共识与贯彻共识是两回事。从逻辑上来看,人们在心思上的相互理解并不能保证在心意上的相互接受^①,共识的存在只是作为可能性条件,从对共识的理解到积极主动接收共识的引领,在这之间存在一个必然性转换,忽视必要条件而直接从可能性跨越到必然性仅是研究者的一厢情愿,进而导致对策建议往往是空中楼阁,不接地气。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大力凝聚共识,扩大覆盖面,更要提升对共识的打捞能力,使思想力量转换为行动力量。可能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连接点将是新的研究生长点。

研究思路单一。一是辩证思维较少出场。统一战线是主客体互动发展的运动过程,目前学界更多的是关注到了作为主体的引导者——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作用,而对作为实践客体的统战对象的反作用关注度不够。二是整体思维依然缺席。统一战线是个好东西,但是学界热衷于论证统一战线的价值意义并给出一系列建设方略,却对统一战线开展成效的判定辨析不足,即什么样的统战工作称得上是达到理想标准、以什么具体指标来衡量统战工作绩效。三是边界思维有待提升。一方面,各部门各层次协同运作构建“大统战”格局的前景令人期待;另一方面,如何清晰界定“大统战”格局中各主体的权责边界,如何保证各部门在实际的统战工作中既不越位又不失位,这些都是研究者面临的紧迫问题。

研究手段不足。实证性方法运用、多学科交叉介入、比较分析研究等手段运用得较少。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定量技术手段重视度不够,使得统一战线的实践价值缺乏数据支撑和实证分析,难以产生足够打动人的解释效力。统一战线囊括政党、民族、宗教、侨务等多学科,而目前学界对各学科相关研究成果的消化、汲取不够,往往各自为政,尚未形成遥相呼应、以点带面的整合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滞缓了统一战线学知识体系的搭建。

(二) 未来方向

第一,增强学理阐释。“统一战线”是一个整体概念,它特有的丰富性需要我们深入辨析与它相关的重要概念。例如,“统一战线”与“战略策略”“统一战线”与“共同体”、“统一战线”与“理念文化”等的关系问题。廓清这些问题的联系与区别,以推动对统一战线研究的清晰化、精深化。从发展历程来看,统一战线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景观。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寻找历史基因,从学理上探讨统一战线形成条件中的历史文化内在规定性,而不是满足于纯粹罗列与统一战线契合的传统要素。另外,应以统一战线学科建设为契机,在加快提炼本土经验的基础上阐释统一战线的中国特色,研究构建一套统一战线治

^①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4页。

理效能的概念框架和评估系统，为中国自主话语权体系建设添砖加瓦。

第二，深化研究内容。要持续研究统一战线的历史过程，研究各历史阶段之间统一战线战略方针接续转承的逻辑关系，有必要澄清过往的历史为统一战线当前状态积蓄了哪些关键要素、孕育着何种发展趋势；顺而也可开展研究社会转型期不同社会思潮对统一战线的影响等。根据矛盾论，作为复杂大系统，统一战线在现实中展开必定有其矛盾运动，我们既要看到统战主体的能动性，又要重视客体对主体的反作用。例如，在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如何充分认识参政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党外人士怎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共的意志。另外，在解释统一战线在某一具体历史情境下为何成效显著时，要从整体上理顺各条线索的逻辑次序，说明各逻辑要素互动的化学反应，而不是简单地罗列其关系。

第三，强调实践导向。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当前学界关于统一战线的研究议题多为宏观的概念性问题，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研究有待加强。习总书记在纪念建党百年讲话中强调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求既上接天线，将统一战线置于治国理政大战略框架下从认知层面解构；又要下接地线从问题意识出发，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国家治理视域下，统一战线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统一治理大系统，有必要通过对系统整个运作过程和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互动的研究，提升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的适用度。对于一项新政策出台后，对统战领域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利益各方参与互动的逻辑如何呈现，政策效果如何，怎样持续对其优化等问题，未来研究可多从实然的角度探讨统一战线治理实践的具体实现形式与治理成效。另外，也可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体验”，强化诸如基层统战平台民主治理的个案分析。

第四，增强哲学自觉。当前已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不同领导人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哲学意蕴，也有人开始思考统一战线的伦理向度，这都是有意义的探索，但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够。“大统战”格局下开展统一战线研究，因为哲学论证不能缺席，哲学是关于事物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人类思维的最高层次。事实上，统一战线兼具工具性与价值性，是“硬件”与“软件”的结合；统一战线在现实中的展开也是一种辩证运动，因此哲学研究前景明朗。例如，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构建“大统战”格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统一战线各种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以系统思维把握统一战线领域内的重大关系；坚持唯物史观的人民立场，深刻领会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统一战线的价值追求。

第五，丰富研究方法。一是强化定量研究。长期以来，统一战线研究主要停留于经验总结或理论思辨层面的论述，但讲好中国故事也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统一战线是共产党人的社会学，注重调查研究是做好统战工作的重要原则，统战研究者也应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因此，未来可多开展田野调查，尝试从鲜活案例切入，对数据“深加工”，逐步构建系统规范的评价体系，突破以往固化在定性研究方面的不足。二是强化比较研究。对统一战线的研究既要有时间的承续性，也要有空间的并列性。换言之，统一战线研究可加强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别、地区比较，发掘具有镜鉴意义与启发价值的治理经验。三是强化交叉研究。提倡研究要勇敢“破圈”，加强学科之间的协同，跨学科、多种研究方法并用，推进学科视角的融合与研究范式的再生产。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构建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长效机制论析

——以辽宁省各民主党派参与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为例

崔晓彤

(辽阳市社会主义学院, 辽宁 辽阳 111000)

摘要:积极开展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是新时代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越性,突出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独特优势的创新实践。构建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机制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战略价值。构建实践进程中存在的定位认知不准,系统性、规范性规定不足,开展形式、应用领域较单一等问题,要求从构建工作保障机制、内容清单机制、流程规范机制以及随机监督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提升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效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自身建设以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完善。

关键词: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1-0016-07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受党委委托就有关重大问题专项监督等工作中,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等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①自此,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有了正式的党内法规。2016年,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布《关于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了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原则、重点内容、主要形式和保障机制”^②,标志着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的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工作的正式启动运行,并为构建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机制提供了必要遵循。

一、构建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机制的现实意义

2018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引导广大成员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使新时代多党合作展现出勃勃生机。”^③这“四新”要求把新时代推动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提到新高度,也意味着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定位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制度化、程序化水平,对于构建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机制提出了迫切要求。

基金项目:2019年度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智库”社会招标课题“构建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机制”(2019NMSYZKKT31)。

作者简介:崔晓彤,辽阳市社会主义学院科社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统一战线学。

①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2021年1月5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1/05/content_5577289.htm, 2021年10月20日。

② 陈明明、肖存良主编:《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前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5页。

③ 《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习近平总书记讲了哪些暖心话?》,2019年1月29日, http://news.youth.cn/sz/201901/t20190129_11858615.htm, 2021年10月5日。

（一）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重大创新

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政党间的相互监督是推动民主政治发展、提升执政党治国理政实质效果的重要保障。我国实行区别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不像西方反对党那样以“搞垮执政党”^①为目标，而是以“支持和帮助执政党和政府加强领导、改善领导、改进工作、完善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②为存在目的。由此，各民主党派通过开展党委委派的不同领域的专项民主监督，对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是凸显这一全新监督形式作用的重要渠道。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机制有别于日常的互相监督，是创新性地在一定时期内专门针对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实施开展集中深入的重点监督，这样的监督更为具体和富有实效。这一监督机制的创新构建，有助于各民主党派进一步发挥其在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探索实践中不断完善，形成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的相关制度安排，有利于补齐民主监督职能短板，深化拓展“合作型”政党制度实践，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

（二）新时代提升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必要依托

从2013年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提出，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2035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③，再到2050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④，这一连续进程意味着以制度现代化和执行制度的人的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必然对于涉及党和国家建设的具体制度以及制度体系建设带来深远的影响。构建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机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尝试在内容、形式、效果等层面构建民主党派专门针对某一任务或领域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机制，督促相关工作合法依规高效推进，对其不断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意见建议，才能在各项重大工作和各个重要领域中为执政党提供除自身监督之外的异体监督机制。这不仅有利于构建民主党派“有为有位”的履职平台，更有利于推动、产出更为科学民主的决策及其实施成果，进一步提升多党合作的制度效能。

（三）为更好履职提供重要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概括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科学内涵，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⑤。这是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以及现实逻辑的揭示和强调。民主监督职能是各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中长期坚持的重要政党职能，目的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与共产党形成合力”^⑥。构建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机制对于深化拓展民主监督职能的精准度和实效性是一项必要的重大创新，构建起“党委（中央、地方）出题目——党派（中央、地方）实施专项民主监督”的监督反馈机制，从而推动实现工作闭环。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委托下，围绕国家和地方层面发展亟待解决、突出的难题和亟待化解的重大风险、深化改革进程中亟待啃掉的硬骨头、省市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议题、与人民群众利益关联密切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既为各民主党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

① 张惠康主编：《参政党民主监督功能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② 《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习近平总书记讲了哪些暖心话？》，2019年1月29日，http://news.youth.cn/sz/201901/t20190129_11858615.htm，2021年10月5日。

③ 本书编写组编：《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④ 本书编写组编：《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第23页。

⑤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8页。

⑥ 张宏伟著：《中国参政党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民主监督创新平台,又为其创新民主监督形式、更好履职拓展了重要渠道。

二、民主党派开展专项民主监督的现实问题

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的重要职能。但在实践中,这一职能的发挥存在短板。相对于民主监督的既有形式,专项民主监督是民主监督形式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其“民主党派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新领域”^①的定位。

2016年6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标志着民主党派中央对口中西部8个省区的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工作正式启动。^②此后,全国部分省市参照中央做法在本区域范围内积极开展实践和探索。例如,上海市委委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就“五违四必”区域环境综合整治(2016年)、食品安全和交通整治等民生工程(2017年)、科创中心人才政策贯彻落实(2018年)等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浙江省委委托各民主党派就“最多跑一次”改革开展专项民主监督(2017、2018年);北京市委要求各民主党派结合自身特色优势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工作(2018年);^③沈阳市委委托各民主党派市委就营商环境建设开展专项民主监督(2018年)^④;等等。笔者以辽宁省民主党派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为例,对专项民主监督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梳理。

辽宁省委委托各民主党派省委承担对口市的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既具有上述积极意义,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 对专项民主监督定位认知不足

专项民主监督是一种主要针对执政党出台的重大方针及与广大民众利益相关的重大事件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民主监督形式,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监督,尤其对提升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发展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在实践中,对专项民主监督定位的认知存在深度不足、高度不够的问题,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一些实际参与专项民主监督的民主党派成员普遍存在“只提适度意见”的主观预设,担当作为勇气不足,发现问题时不敢提出尖锐意见的情况。二是没有党派主要领导参加时,被监督的部门往往对专项民主监督重视不足、配合不够。三是部分民主党派在拟定专项民主监督具体执行方案时,不直接使用“专项民主监督”一词,而是用类似“调研考察”“考察监督”等词汇取代。四是专项民主监督还存在“提有效意见建议”和“单纯了解情况”比例不相适宜的问题,“单纯了解情况”的比例较大,而“提出有效意见建议”的比例相对小。这些问题折射出部分党委政府工作人员和民主党派人士,对专项民主监督的认知尚未达到应有的深入和高度,存在定位认知不准的问题,削弱了专项民主监督的实效。

(二) 开展民主监督系统性、规范性不足

由于专项民主监督实践探索处于起步阶段,其内涵层面尚未形成统一规定,尤其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脱贫攻坚思想把握和运用得还不够精准,导致实践中出现随意性强,系统性、规范性不足等情况。

《关于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虽然明确了六项重点监督

^① 《发挥党派优势 助力脱贫攻坚——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综述》,2017年10月10日, <http://www.cppcc.gov.cn/zxww/2017/10/10/ART11507598180207817.shtml>, 2021年10月5日。

^② 《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机制研究——民主党派中央参与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启示》,2019年2月25日, http://www.zmj.cn/news_detail.aspx?classid=147&id=71944, 2021年10月5日。

^③ 《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的实践探索》,2018年11月20日, <http://www.rmzxb.com.cn/c/2018-11-20/2222325.shtml>, 2021年10月7日。

^④ 《沈阳市召开各民主党派营商环境建设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议》,2018年7月19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8-07-19/doc-ihfnsvza5125206.shtml>, 2021年10月5日。

内容，即“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情况；贫困人口精准脱贫情况；扶贫资金项目管理情况；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情况；重大决策实施执行情况；扶贫资金项目使用情况”^①，并做出了基本规定，但缺乏相对细化的内容清单和评价指标。另外，其仅仅规定了专项民主监督的形式、次数，对专项民主监督开展时限、时长并未明确规定。由于大多数民主党派省委仅用2到3天的时间到对口市相关部门进行调研，导致民主党派无法对脱贫攻坚实施落实情况进行详细的审核，尤其是在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以及精准管理等需要耗费时间较多的方面短板十分明显，进而导致专项民主监督“快餐化”、形式化、表层化。

（三）民主党派推动专项民主监督自主性受限

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是推动多党合作制度效能提升的重要渠道。民主党派应在现有法规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积极实施监督、完善监督，提升民主监督的效能。但在实践中，一是各党派常选择听取党委、政府部门情况汇报并将其作为开展专项民主监督的主要依据。这种调研方式容易造成“阅读材料”“先入为主”现象。调研若以被动地浮于文字材料为主，不深入实际，就难以挖掘和发现问题，必然会制约民主监督主动性、能动性作用的发挥。二是民主党派省委实地考察地点常是当地政府部门预先安排或者推荐确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制约民主监督自主性的充分发挥。三是对于扶贫资金的投入和使用的专项民主监督，要求掌握审计学、统计学知识以及脱贫攻坚的相关政策，而一些参加专项监督的民主党派人员既缺乏专业知识又缺乏脱贫攻坚工作的亲身经历、感悟和相关政策把握，导致专项监督能力不足。

（四）专项民主监督开展形式、应用领域较单一

切实开展好专项民主监督必须激发多维度的创新意识以拓展应用领域和空间，提出更精准建议以提升监督质量。此次各民主党派开展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主要采用以下5种形式，即“开展考察调研；提出意见建议；参加专项监督评估；加强日常联系；进行政策宣讲”。在实践中，各民主党派省委开展专项监督更多的是依托座谈会、实地调研以及听取情况汇报等方式，这在监督形式上属于上述5种监督形式中的“开展考察调研”。通过这种形式，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当地脱贫攻坚工作的基本做法和情况。但更重要的是后续还需要针对调研获取的情况，就其中的关键环节、堵点、痛点和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符合当地实际的对策建议或创新思考，而这常常是专项监督实践中的薄弱环节。二是一些接地气的监督形式应用还较为缺乏。例如，对群众进行问卷调查、到群众中访谈了解其对脱贫的诉求和取得的成效、与相关部门建立日常联系等。三是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应用领域仍较为单一，目前主要应用于脱贫攻坚领域，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的全国性专项民主监督尚未推广到其他领域，还无法通过不同领域的实践比较和经验积累，进一步获得提高专项民主监督效能和民主党派相关履职能力的丰富给养。由是观之，专项民主监督仍有十分广阔的拓展空间。

三、构建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长效机制的实践路径

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具有主题明确、任务具临时性、过程具整合性以及绩效可测量等特点。^②可见，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作为一种创新型的民主监督形式具有突出优势和实践价值。但民主党派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实践折射出，目前这一监督形式的实施仍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存在形式化、表面化、不够规范等问题，制约了其破解不敢监督、不善监督、质量不高等民主监督难题的积极作用的发挥。由此，构建民主党派专项监督长效机制，是从根本上推动专项民主监督效能完善、应对现实问题解决的必要举措。

^① 陈明明、肖存良主编：《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前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5页。

^② 曹伟：《民主监督项目化：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的新模式》，《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19页。

（一）构建工作协调保障机制，着力解决“不敢监督”问题

构建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长效机制，首先要致力于切实发挥专项民主监督职能作用，做到真监督、实监督、敢监督。当前，由于党政部门的一些相关人员对多党合作制度认知不深，各民主党派人士认知程度参差不齐，导致“不敢监督”等问题突出，削弱了专项民主监督的实效。由此，有必要构建工作沟通保障机制，向相关主体（党委、党派以及相关部门）清楚传递开展专项民主监督的重要性及其定位性质等，解开思想枷锁的同时形成思想合力。

1. 建立专项民主监督主体日常工作联系制度

参与固定主题的专项民主监督主体之间必须加强日常工作联系，围绕范畴内议题集中发力，形成合力。通过建立日常工作联系制度，出台对应的指导性文件，特别在思想层面进一步加强专项民主监督主体间的沟通和联络，增强专项民主监督效能。一方面，通过主体间良好沟通促进工作交往和理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专项民主监督实践中的心理顾虑，共同提升专项民主监督效能，完善拓展多党合作实践、激发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共同调研形式实现一手材料、调研信息、材料的共享，共同挖掘梳理现实问题，以此突破仅靠某一民主党派“单打独斗”，资源、视角、思路单一，势单力薄，监督科学性、权威性、底气不足，不敢监督的问题，从而实现更科学全面的监督履职。

2. 建立党政部门向民主党派公开数据信息制度

虽然有关文件对专项民主监督相关数据向民主党派公开有相应规定，但相对笼统。在实际操作中，民主党派开展专项民主监督获取数据信息仍存在一定困难，抑或有时获取的数据片面、陈旧，制约了民主党派对被监督事项的全面了解。另外，对所监督的相关事项调查得不够深入，也是导致“不敢监督”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一是根据专项民主监督实际需要，积极建立数据信息使用条例，规范数据使用、拓展使用范围，为获取相关数据提供保障和便利。二是通过党委政府相关部门编制的简报，将阶段性的重要信息以及数据转给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成员。三是民主党派可以根据需要，提请中共党委政府协助沟通协调其他部门提供相关数据信息。

3. 建立专项民主监督协同沟通工作小组制度

专项民主监督关涉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是经济社会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社会关注度高，对参与人员的权威性、专业能力要求较高。同时，对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民主监督仅靠某一个部门提供支撑是难以实现的，需要多部门参与并予以合力支持方能达到预期效果。鉴于此，有必要建立专项民主监督协同沟通工作小组制度，对于专项民主监督涉及的重点事项和重点领域开展沟通协调。例如，可以针对脱贫攻坚工作中的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情况；贫困人口精准脱贫情况、贫困县摘帽情况；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情况；重大政策措施执行情况；扶贫资金项目管理使用情况^①等脱贫攻坚的不同任务，建立协同沟通工作小组，协调相关部门、力量更好地形成合力，发挥各方专业优势。小组成员可拓展到专项民主监督所涉部门及外聘专家等。工作小组调度和召集工作可以由开展民主监督的党派与主管部门协商主导，切实发挥民主党派开展专项民主监督的作用，提升其主动性和主导性。

（二）构建监督内容清单机制，着力解决“质量不高”问题

构建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的内容清单机制就是要规范细化监督内容、规定清楚监督什么、着力解决专项民主监督“质量不高”这一重大问题。只有明确监督内容，专项民主监督才能开展得有的放矢。通过积极探索“清单管理”形式，逐步推进规范化的专项民主监督长效机制的构建。

1. 制定监督内容清单要围绕不同层级、不同阶段的中心工作

从性质上讲，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关注的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高层次的政治监督。专项民主监督的内容选择要体现参政党职能和价值，就必须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亟待破解的难题来

^① 辽宁省委统战部：《关于组织各民主党派省委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2018年，第7页。

选题，这样更能体现出民主党派开展专项民主监督的实践价值。一是将国家发展进程中阶段性目标以及“十四五”时期需要重点攻坚的中心工作作为专项民主监督的内容选择。例如，生态治理、区域协同、乡村振兴、数字经济，等等。二是结合省情市情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选题。例如，优化营商环境、粮食生态安全、推进国企改革、历史文化名城等。高质量选题是提高专项民主监督质量的首要条件，以这些重大、鲜活、“接地气”的实践作为专项民主监督的选题，从选题质量上为专项民主监督质量奠定基础。

2. 制定监督内容清单要坚持系统化、规范化、大局性

专项民主监督内容选择要坚持系统化、规范化的推进方向，通过制定《专项民主监督内容清单选择指导方案》等文件，在坚持党委政府中心工作选题原则基础上，细化专项民主监督范畴，拟定内容清单，极力避免随意性、形式化、“快餐化”等问题。一是尽量体现监督周期性（如1~3年）、深入性（由浅到深）。这样制定内容清单，有助于深入持续地推进工作，并做细弄透，提出真知灼见。二是内容清单选择要坚持动态监管的思路。这样有助于不偏离正确方向和基本原则，凸显高层次政治监督的实践价值。三是内容清单选择要着眼于服务大局的基本方向。尝试构建党委领导下省情市情专业研究机构参与的智库模式，专门对具有前瞻性的专项民主监督进行前置性论证，尤其是在其萌生之初就要积极介入参与，例如数字化发展（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经济以及数字生态）等相关方面。

3. 制定监督内容清单要不断解放思想、提升政治站位

内容清单内容选择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创新探索外，还应体现各级党委对统一战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以及对民主监督的主动接受和支持配合能力。一是内容清单设置不能避重就轻。各级党委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尊重实践标准相统一，严肃论证什么内容可以进入专项民主监督的内容清单，什么内容不能进入清单以及内容清单变更的相关规定，不能避重就轻，导致形式化。二是内容清单设置要体现政治站位高度。对于进入清单的内容，要站在提高专项民主监督实效、提升参政党能力建设、推进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的高度认识和考量，使内容清单所列监督项目重要而必要，到位而不越位，符合参政党民主监督能力、切实可行。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专项民主监督的价值、效能，推动相关制度完善，不断提升监督实效。

（三）构建流程规范机制，着力解决“不善监督”问题

构建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流程规范机制，是对于监督流程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主要回应如何在监督程序上更完善，以保证专项民主监督深入到位，而非浮于表面等重要问题。流程规范机制构建是检验民主党派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实效的重要依据。

1. 创新专项民主监督动态监管平台

专项民主监督本质上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媒体融合以及科技迅速发展为专项民主监督形式创新提供技术支撑，使之不局限于听汇报、实地视察、座谈会等现场形式，还可以利用融媒体、大数据、智能化平台等手段拓展动态监管能力和范围，进一步延展、规范专项民主监督实践。一是构建专项民主监督动态交流平台，为各级党委、各民主党派以及各级政府、事业单位部门围绕专项民主监督打造动态化信息共享平台。二是构建民主监督动态监管平台。针对专项民主监督实质性开展天数较短的情况，在各级党委主导下，打造围绕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动态监管平台，通过报送信息、行动分享、情况分析以及阶段监管等形式提升融入程度，有效提升专项民主监督实质性开展的时间，切实提升民主监督实效。

2. 制定专项民主监督统一实施办法

推进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需要不断完善其制度层面的规定。当前，专项民主监督虽然有实施办法或者方案，但仅针对某一领域的专项民主监督，指导作用不强，尤其对于专项民主监督规范流程完善和实效性监管等方面涉猎较少。由此，有必要及时出台《中国共产党委托各民主党派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实施办法》，作为规范和监管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工作的总体指导和基本遵

循。其中,要重点规定专项民主监督的主要流程,包括前期的重点调研和资料搜集,中期的重点跟进监督及监督开展时长、内容、实现目标、形成的材料等,最后相关党政部门形成反馈意见和针对所发现问题的解决或整改落实情况报告,以及专项民主监督的效果评价等。总之,要细化民主党派对于所开展的专项民主监督的思考调研、实践参与、问题反馈等流程指引和规范,帮助民主党派实现从“不善监管”向“行家里手”转变。

3. 确保专项民主监督队伍稳定持续

真正理解专项民主监督本质、把握专项民主监督实践运转规律的人才和队伍,是推动专项民主监督规范机制完善的关键因素。一是要明确制定专项民主监督的实施标准。制定专项民主监督实施标准,就要细化衡量和评估专项民主监督目标实现程度的指标。二是要依托既定标准培养稳定人才队伍。专项民主监督作为民主监督的创新形式,是民主党派履行职能的新特色、新亮点、新“舞台”。由此,培养一支能执行好专项民主监督任务的民主党派人才队伍,尤为重要和必要。要依靠制定出来的既定标准持续在党委、党派、相关部门几大领域培养人才,不断夯实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解和认识,不断通过实践历练培养各领域人才,作为专项民主监督健康长期开展的必要保障。

(四) 构建随机监督机制,着力提升“主动作为”效果

构建随机监督机制就是要保障民主监督的实效性,避免专项民主监督表面化、形式化。随机监督主要借鉴“双随机、一公开”理念,旨在提高专项民主监督自主性,即通过不指定地点考察、不指定时间人物座谈,采取随机方式提升专项民主监督的“含金量”。

1. 培育利于随机监督开展的氛围和环境

要积极借鉴有助于专项民主监督效果呈现的创新理念推进专项民主监督应用广度。将随机监督理念嵌入专项民主监督是推进其成效实现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转化的首选理念。随机监督理念注重全面准备、全力准备、全域准备,这对随机监督开展的氛围和环境的培育大有益处,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各民主党派对专项民主监督的责任感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在委托专项民主监督时会更加严谨,尤其会注重专项民主监督评价考核体系。

2. 制定随机监督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定要科学回答评什么、怎么评、谁来评、如何改进等几大板块的细化指标,构建分级分等的纵向指标体系。一是规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范畴。明确评价内容范畴,为随机监督制定基本评价原则。二是规定评价指标体系实施细则。明确通过何种指标和方式去评价专项民主监督的成效,为随机监督规定规范路径。三是规定评价主体的选择、产生及其权利、义务、责任和相应分工。四是规定评价结果应用和指标体系的完善,明确改进方向等内容。通过上述指标体系的探索,构建起随机监督机制的框架。

3. 丰富随机监督机制运行的依托形式

随机监督机制是补齐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自主性尚未充分发挥的短板的实践探索。专项民主监督实践运行进程中凸显出民主党派监督主动性不足问题,抑制了各民主党派对深层次问题的发掘。一是发挥民主党派开展专项民主监督作用,推动调研形式创新。可以探索亲身体会式、联合调研式、田野座谈式、对象访谈式等方式,搜集更充分、更鲜活的一手材料。二是借鉴民主监督既有形式,将其应用到专项民主监督实践,拓展随机监督形式。协商式监督、联合调研组等多种形式都可以与随机监督机制相融合,以提升随机监督机制实践应用价值。

构建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长效、规范机制是对其民主监督职能作用在新时代进一步提升效能的积极尝试。通过构建长效机制可以不断深化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理论与实践,也可以深化党领导下的其他个人和组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认知,更有助于提升多党合作制度效能,进而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进一步彰显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支撑。

责任编辑:罗雷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凝心聚力的 历史经验及现实启示

陈思诗

(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党校, 重庆 400038)

摘要: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并争取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 凝心聚力、团结和争取最大多数是其中一个显著特征, 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功的秘诀之一。文章选取改革开放这一段历史时期, 在梳理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背景及统战工作主要任务的基础之上, 从理论、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分别剖析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凝心聚力工作的重要举措, 总结经验启示, 通过持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理论继承与创新、不断健全体制机制、依靠人民和发动人民, 汇聚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关键词: 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 凝心聚力; 历史经验; 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2) 01-0023-0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 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 是大团结大联合, 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①纵观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的历史, 正是一部不断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不断发展壮大, 并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历史。运用统一战线凝心聚力, 成为中国共产党有效治理国家的宝贵经验, 这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 也得到了充分肯定。

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背景及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 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 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

基金项目: 川渝党校(行政院校)系统2021年党史研究专项重点项目“统一战线视阈下中国共产党凝心聚力的百年进程及经验启示研究”(CQDX2021BZXZD-016); 2022年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委托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地方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研究——以重庆市为例”(CQSYWTKT22021)。

作者简介: 陈思诗, 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党校(区行政学校、区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基层治理、统一战线。

^① 人民网:《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最大的政治》, 2015年6月7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607/c157278-27116258.html>, 2022年1月21日。

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①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明确为“爱国统一战线”,一改“文化大革命”以来使用多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提法,更加强调爱国主义的性质、扩大统一战线的范围、体现大团结大联合的精神。这一时期的统战工作主要有两大任务,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凝心聚力工作的历史经验

(一) 理论层面:增进统一战线思想共识和政治认同

1. 科学阐释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

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作的《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重要讲话,成为新时期统战工作的纲领性文件。通过对当时我国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民族爱国人士、资本家阶级、民主党派、港澳台同胞和国外侨胞等社会各阶级状况的深刻分析,邓小平指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邓小平在讲话中还明确了新时期人民政协的性质为“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以及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②邓小平对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有关问题的科学阐释,理清了关系,统一了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成果。

2. 正式确立多党合作“十六字”方针和“参政党”概念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关系源远流长。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性质的变化,中共同党外人士关系的变化、共同目标任务的变化,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逐渐形成命运共同体。1982年1月,胡耀邦在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同党外朋友真正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③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新时期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关系的重要准则和行动指南。《意见》还首次提出“参政党”的概念,对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多党合作中的地位予以明确,并将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归纳为“一个参加三个参与”。^④从“八字方针”到“十六字方针”的拓展以及“参政党”科学概念的提出,有助于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3. 肯定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人员等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迅速发展。但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对

^① 共产党员网:《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6日, <https://www.12371.cn/2021/11/16/ART11637053281483114.shtml>,2022年3月17日。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17年,第346页。

^③ 张献生:《从“八字方针”到“十六字方针”》,人民政协网,2018年12月18日, <http://www.rmzxb.com.cn/c/2018-12-18/2244498.shtml>,2022年3月17日。

^④ 中国政协网:《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89年12月30日, <http://www.cppcc.gov.cn/2011/09/06/ART11315304517625143.shtml>,2022年1月21日。

非公经济认识的局限，新的社会阶层尤其是私营企业主的出现在党内和社会上一时难以被接纳。2000年12月，江泽民在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讲话中明确指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①这一科学的论断，不仅明确了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阶层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地位，同时也有助于统一全党全社会的思想认识、团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力量、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巩固发展新世纪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意义重大。

（二）制度层面：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规范化

1. 与时俱进五次修改完善人民政协章程

1978年2月，因“文化大革命”停滞了12年之久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恢复召开，会上对1954年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进行了第一次修改，积极推动了“文化大革命”后全国政协工作的恢复和重建。1982年12月，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通过了政协章程的第二次修改，更正了之前“左”的错误理论和提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政协的性质、任务和主要职能。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对政协章程作了第三次修改，在充分吸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和人民政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重点增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我国社会状况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新表述。2000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对照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内容，对政协章程进行了第四次修改，主要修订了一些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的提法，包括学习邓小平理论、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内容。2004年3月，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对政协章程进行了第五次修改，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写入政协章程，明确了人民政协的指导思想、性质、职能和两大主题，规定了政协委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及其权利、义务和责任，规范了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和程序。^②政协章程的修改完善，让人民政协工作更加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对政协事业的发展和政协工作的开拓具有深远影响。

2. 以基本法的形式把民族区域自治固定下来

民族区域自治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基本政策。1984年5月，经过前期较长时间的酝酿，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才得以制度化、法律化。2001年2月，为适应中国入世需要，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民族教育和文化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内容进行了修改，全面总结了自这部基本法颁布以来以法治理国内民族事务的重要经验，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制度发生的巨大变化，高度体现了各少数民族人民加快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集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尽快实现共同进步与繁荣的决心和行动。^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和实践，推动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

^① 中国政府网：《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8年8月1日，http://www.gov.cn/test/2008-08/01/content_1061490_3.htm，2022年1月21日。

^② 中国政协网：《政协章程的制定和历次修改情况》，2011年9月14日，<http://www.cppcc.gov.cn/2011/12/16/ART11513309181878116.shtml>，2022年1月21日。

^③ 孙振玉：《关于修改版〈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思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8—13页。

业的长足发展。

3. 宗教事务逐步进入法治化轨道

在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大背景和新形势下,宗教立法工作逐步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将宗教事务纳入规范化的法制管理成为前进的必然方向。1991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次明确提出“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并就依法管理的内容、目标和方法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两个单项宗教行政法规,以规范宗教活动场所管理以及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与之相应地,国家宗教局也及时颁布了三个配套的部门规章——《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和《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办法》,为宗教界的各项合法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法治保障,标志着我国宗教法制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2004年,国务院颁布我国第一部宗教事务方面的综合性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例》,是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切实彰显了宗教治理的中国特色与优势。中国共产党与宗教界人士之间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关系,有助于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三) 实践层面:促进统一战线工作方式的创新推广

1. 重启“双周座谈会”协商对话机制

“双周座谈会”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央人民政府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国是的一种方式,每两周一次,故名“双周”。^①新中国成立后,“双周座谈会”成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一时掀起了“双谈”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协系统成为重灾区,“双周座谈会”被迫停止活动,逐渐淡出政治舞台。1979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双周座谈会”形式又得以延续,只是不再以“双周座谈会”命名,主要根据座谈会内容命名。“双周座谈会”及与之相关的协商对话机制,作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凝聚共识、共商国是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为国家各方面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也见证了新中国统战工作的历史变迁。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通过这一方式,充分表达对党和国家政策、国家建设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切实发挥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作用,用实际行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 打造“同心”品牌服务科学发展

1988年,国务院批准建立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统一战线倾力参与毕节试验区建设,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助推贫困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②“同心”品牌正是统一战线在参与毕节试验区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并总结提出的。打造“同心”品牌,从参与毕节试验区建设上升到整个统一战线服务科学发展,是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和扶贫开发的新探索。2011年初,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指出: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鲜明的特质,是我们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有力保证。^③围绕这一特质,中央统战部先后举办“同心”品牌研讨会和专题培训班,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把“同心”思想贯穿于各项教育活动中,实施推动科学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和

^① 刘维芳:《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对话机制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7期,第46—55页。

^② 人民政协网:《民建中央帮扶黔西县:同心共筑小康梦》,2018年7月12日, <http://www.rmzxb.com.cn/c/2018-07-12/2110228.shtml>, 2022年1月21日。

^③ 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举行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2011年1月30日, http://www.gov.cn/jrzq/2011-01/30/content_1796261.htm, 2022年1月21日。

促进社会和谐为主要内容的“同心工程”，进一步凝聚共识和力量。比如中国致公党坚持“侨海同心”，开展引凤工程活动，邀请海外留学人员回国考察；民进中央开展“同心·彩虹行动”，组织毕节金沙县西洛乡教师到上海观摩学习。各地统战部借鉴“毕节模式”，组织动员统一战线成员，围绕打造“同心”品牌，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实践活动，取得显著成效，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群众纷纷赞誉：“同心”连着党心、民心，“同心”品牌好。

3. 联合考察调研国家重大建设项目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加大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力度，加强协调配合，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贡献力量。1993年11月，中央统战部组建三峡考察团，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一些无党派代表人士、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等共108人奔赴长江，对长江三峡库区和处于前期施工准备阶段的三峡工程进行为期8天的实地考察，开创了对重大工程项目进行联合考察和决策实施过程中继续协商的范例。党中央、国务院对这次考察十分重视，考察团回京后，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专门听取党外人士考察三峡工程的意见建议，充分肯定了组织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参观考察重大工程项目是参政议政的好形式，要继续坚持下去，争取做得更好。1994年后，先后对苏南和浦东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情况，京九铁路建设及沿线发展情况等进行考察，就耕地保护问题、亚洲金融风暴对我国的影响等重大课题进行调研。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中央统战部又组织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200多人，历时两月有余，对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考察，就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增进民族团结等关系西部大开发全局的重点工作，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另外，中国共产党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塑造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是中国共产党凝心聚力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启航和深化时期。这一时期，党的统战工作，在吸收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两个历史时期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以拨乱反正和逐步走上正轨为起点，不断制度化和规范化，为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巩固、深化和完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段时期，对民主党派的地位、作用，统战相关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定位，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新出现的阶层等方面都作了一些新的论述，为我们新时代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我们国家统一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现实启示。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凝心聚力工作的现实启示

（一）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凝心聚力相关政策的实践基础

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凝心聚力的统战政策始终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一方面，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统战工作是党的工作，在任何情况下，统一战线和各项统战工作都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也是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前提和目的。^①另一方面，党的中心工作要善于运用统一战线这个重要法宝，并且要用好这个重要法宝。能不能用好这个法宝，关系着党的中心工作的成败，关系着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大局的成败。

（二）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共产党凝心聚力指导思想的内在品格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只有一致

^① 史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的创新发展》，《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16—23页。

性、没有多样性,或者只有多样性、没有一致性,都不能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①要实现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主要着力点在凝聚共识。一方面,实现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前提是共识,没有共识就难以求得团结和联合,但共识不是天然存在的,也不会自发产生,需要引导、培育、凝聚,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必须注重对统一战线成员的思想政治引导;另一方面,凝聚共识的要义不是同化共识,消弭不同意见,而是在承认多样性、尊重多样性的前提下,通过协商把各方面的意见聚合起来,从中求得最大公约数,形成协商共识。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目的在于增进一致而不是强求一律,要尊重差异而不扩大分歧,包容多样而不丧失主导。^②

(三) 不断健全体制机制:中国共产党凝心聚力制度机制的变迁逻辑

法律制度是维护权利最有效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不断修改完善的人民政协章程、《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等,实际上正是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具体体现,这是维护统一战线的团结和发展,保证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必要条件。今天,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具体利益诉求上也存在不同,要巩固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不断完善照顾同盟者利益的体制机制,做好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健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制度,凝聚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③

(四) 依靠人民和发动人民:中国共产党凝心聚力成功实践的力量源泉

统一战线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永恒的主题,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统战工作的全过程。所谓大团结大联合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④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人民情怀”,要有“五湖四海”的胸襟和“海纳百川”的能量。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凝心聚力的力量源泉,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开创更加辉煌未来的重要法宝。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新华网:《习近平这样谈统战》,2021年1月5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8055771345341952&wfr=spider&for=pc>, 2022年1月21日。

^② 陈喜庆:《统一战线百年经验: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思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第29—37页。

^③ 共产党员网:《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 <http://www.12371.cn/2019/11/05/ART11572948516253457.shtml>, 2022年1月21日。

^④ 韩东太:《凝心聚力推动大团结大联合》,《人民政协报》2019年2月2日,第3版。

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的广东经验与启示

杜联藩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00)

摘要: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阶段的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 统一战线服务和助力乡村振兴已经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 同时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统一战线参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提升统一战线成员的现实地位, 凸显统一战线成员的主体性力量、科技创新力量和文化创造力量。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 统一战线成员应当发挥政治引领、建言资政、联动协商、经济物质提升、文化创造传承等方面的作用, 汇聚起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关键词: 乡村振兴; 统一战线; 建言资政; 民主监督; 广东经验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2) 01-0029-0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 更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随着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 “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 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团结社会各界别力量、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法宝, 在我国乡村建设历史上, 为探索乡村振兴道路、组织发动群众、培育乡风文明、完善基层治理体制等, 做出重大历史贡献, 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依靠力量。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 如何更好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凝聚全社会共同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既需要加强理论研究, 更需要加强实践探索, 推动构建乡村振兴共同体。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发展统一战线的挑战和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是“十四五”规划中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 既为统一战线提出了新课题、新任务, 也使之面临着新的挑战。从根本上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发展和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具有重大意义。

(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统一战线带来的主要挑战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要实现战略目标。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历史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统一战线的使命更重大, 它遇到的挑战也比过去更严峻。

1. 统一战线服务中心大局的任务更加艰巨。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一个战略安排, 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转变的战略安排。这个安排使统一战线服务中心大局的任务更艰巨、更繁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 主要任务是打好“三

作者简介: 杜联藩,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研究部副主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

大攻坚战”，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打好这“三大攻坚战”，实际上就是聚焦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的突出矛盾或问题。比如，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目的是实现农村地区贫困户的“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1.0版。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阶段，它追求的是乡村发展的“全面性”“系统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2.0版。具体而言，要推动农业全面升级，促进农村全面进步，推进农民全面发展，实现乡村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基层党组织、村容村貌的全面振兴。对统一战线而言，这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推进和实现的迫切任务。

2. 统一战线发挥人才荟萃的优势更加紧迫。推动乡村走向全面振兴，人才是首要因素。但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村青壮年人口外出务工、求学增多，人才外流比较严重，许多乡村出现空心化现象。在脱贫攻坚战中，虽然不少外出务工的农村年轻人看到家乡发展的前景，逐步回流家乡参加建设，但是大部分乡村仍然是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体，农业带头人、新型职业农民非常缺乏。农村现存人才难以满足乡村全面振兴的需要，人才资源短缺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统一战线容纳各方人才，那些外出打拼、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经过洗礼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以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他们既有浓厚的家乡情结，也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既愿意为建设家乡出力，也能够为建设家乡出力，是一支振兴乡村事业的重要依靠力量。因此，统一战线要把各界、各领域的优秀人才团结起来，引导他们发挥带头示范、助力支撑等作用，特别是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乡贤作用，服务于乡村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这些都是统一战线要面对和解决的紧迫问题。

3. 统一战线成员的履职要求更高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专项长期的工作，必然会遇到许多难题，部分难题需要通过民主协商、科学建言、有效监督等方法 and 途径来解决。如乡村振兴规划的设计是否科学，基层治理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是否合理，特色产业发展是否可持续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开展深入调研、科学论证、综合评价，需要尊重农民的意见、征求专家以及各界人士的意见，开展民主协商协调各方利益。同时开展民主监督，有利于乡村振兴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也可以全面客观地了解“三农”发展的实际情况，从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这就对统一战线成员的履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脱贫攻坚的专项民主监督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下更应当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积极建言献策，科学民主监督，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参谋、助手作用。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发展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一战线及其成员提供了大有可为的舞台，对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 凝聚最大的公约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的联盟。为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完成一定的历史任务而实现大团结大联合，这是统一战线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思想基础。没有共同的目标就没有共同政治基础，就不可能建立统一战线。在现阶段，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是引领统一战线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共同目标和现实任务，是凝聚统一战线成员的共识和力量的最大公约数。2018年1月2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①可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得统一战线有更加明确的奋斗目标和现实任务，有更具体的着力抓手。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引领和召唤下，统一战线成员有了凝聚在一起的共同政治基

^① 新华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2月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2/04/c_1122366449.htm，2021年11月12日。

础，一切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积极因素被充分调动起来，建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政治联盟。

2. 锻炼培养统战代表人士队伍。培养统一战线代表人士，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素质优良的党外代表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要完成这个工作任务，就需要构建实践锻炼平台，为统一战线代表人士提供历练机会与基地。由于部分党外代表人士来自各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等单位 and 部门，其成长路径较为单一，客观上导致了他们对基层情况缺乏了解，缺少应对和处理复杂问题的历练。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十分重视党外人士的成长和实践锻炼。2011年至今，由中央统战部牵头，先后在上海、甘肃、贵州、北京、重庆、四川、广西等地建立了7个全国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各地统战部门也相应牵头建立了一批党外人士实践锻炼基地。这些基地的建立，为培养党外干部，促进党外代表人士成长，提供了有效路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一战线成员创造了重要的实践锻炼机会，也为统一战线成员提供了把握国情的重要渠道，这将有利于培养一支知国史、懂社情、解民困，真正把业绩写在中国大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统一战线骨干成员队伍，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3. 有利于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政治联盟。新时代的统一战线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它涵盖了包括大陆同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发展和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首先，统一战线成员中的大陆范围内的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宗教代表人士参与其中乡村振兴战略，一起出谋划策，共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必将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统一战线的共同基础将会更加牢固。其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必将调动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建设国家的积极性，而他们通过投资、回乡创业、就业等方式参与家乡建设，参与国家建设，既传承了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也分享了国家发展与强大的荣光。再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社会提供了重要窗口，可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中国故事。这些对于发展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十三五”期间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的主要做法和不足

“十三五”期间，全国各地统战部门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结合当地的特点，凝心聚力、积极作为，在推动乡村振兴中贡献统战力量，为全面乡村振兴贡献出智慧和经验。

（一）“十三五”期间广东统一战线发挥独特优势助力乡村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

1. 汇聚各方力量，聚焦重点攻坚。按照广东省委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部署，省委统战部支持省内各民主党派开展助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乡村振兴活动，8个民主党派与8个对口地市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建立民主监督、定期座谈、调研考察等工作机制。同时，与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形成凝聚统一战线智慧力量、服务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合力。省内各民主党派先后组织了70项同心调研，形成了26份调研成果、33份提案议案，提交了259条建言献策信息，部分提案被列为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及省市联合督办提案；组织实施“烛光行动”“同心圆工程”“小蜜蜂助学”等公益活动78场，捐赠700.5万元，捐赠200余万元医疗设备，支援基层医院6个重点学科建设，培训乡镇医生3362人次，培训教师2385人次；引导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开展农业技术咨询、品牌打造、营销策略、科学管理、资本运营等智力服务；积极配合推进“新乡贤返乡工程”，鼓励引导海外乡贤反哺故里、报效桑梓，通过乡村治理、投资兴业、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

振兴;发挥侨界慈善平台作用,结合“广东扶贫济困日”“中国扶贫日”等,引导海外侨胞参与慈善事业,把侨资侨捐引向粤东西北地区,投向脱贫攻坚方面,持续办好侨心助学助孤助老等公益项目。

2. 实施万企帮万村,提升帮扶实效。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大市场大凝聚的作用,省委统战部会同省工商联广泛动员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切实做到帮扶到村、帮扶到户,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和发展机会,推动扶贫济困和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20年,累计发动10824个企业投入帮扶资金134亿元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同省农业开发银行签订《政策性金融支持广东省“万企帮万村”行动合作协议》,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加强信息共享,将“万企帮万村”行动中的优质示范企业纳入省农业开发银行金融服务的名单制管理,充分激发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如碧桂园投入5亿元整县帮扶清远市英德新农村建设,并先后促进汕头市潮阳区、韶关市浈江区翁源县等6市7县(市、区)181个村脱贫并实现发展。

3. 开展挂牌督战,确保如期脱贫。2020年3月至年底,组织开展省内脱贫攻坚挂牌督战,省委统战部负责挂牌督战阳江市阳西县。挂牌督战调研督导6次,走访8个镇、27个村、40户贫困户,访谈干部群众166人次,召开座谈会7场次,核查项目11个。帮助贫困户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引导有关企业与阳西县对接,推动开展教育、旅游产业开发合作。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调研组每年对脱贫攻坚开展民主监督,督助一体既真实客观地发现问题确保脱真贫真脱贫,又切实帮助各地解决问题,凝聚社会力量共同决胜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

(二)“十三五”期间各省区市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主要做法

1. 凝心聚力,共促发展。北京市委统战部牵头,各民主党派市委为助推门头沟区域发展,汇聚八个民主党派优势资源持续重点支持一个地区发展。这是民主党派服务经济社会的创新模式,也是基层民主党派工作的一个新的切入点。^①“十三五”期间,各民主党派聚焦门头沟区教育、医疗、文化、低收入帮扶等领域集中发力,协调引进优质资源、项目、企业、资金、人才、技术等,有力推动了门头沟区经济社会的发展。“8+1”行动共达成合作项目73个,结对帮扶低收入村8个,直接捐款捐物近1500万元,项目涉及资金20亿元,形成了九三学社(北京)双创基地、“东胡林人”遗址保护、景山学校京西实验学校、“名医工作室”“科技助农示范小院”等一批助推发展、普惠民生的优质品牌项目。通过“8+1”行动,健全了统战工作体系,提升了基层统战意识和水平。各民主党派加强了与基层的联系,锻炼了人才,凝聚了队伍,提升了社会服务和参政议政的能力水平。实现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民主党派工作、统一战线事业三方共赢,充分体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2. 民主监督,助推乡村振兴。例如,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自觉接受监督、注重监督成果运用。针对致公党中央监督提出的“更加重视培育优质产业,发挥好产业支撑作用”建议,四川在全国率先制定《关于创新扶贫产品销售体系促进精准脱贫的意见》,首创“四川扶贫”公益品牌,全省88个贫困县加盟企业1557家。民建四川省委针对甘孜州泸定县贫困村集体经济较薄弱、培育慢、缺乏支撑力的问题,提出“推进土地流转”“加快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等建议。泸定县积极采纳落实这些建议,探索出“银行+贫困村(户)+企业”的精准扶贫模式。湖南省组织统一战线成员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画大同心圆,凝聚思想共识。以同心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广泛动员突出统战特色,因地制宜,服务中心,服务大局;结合“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等现有统战品牌,共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②

^① 千龙网:《北京市各民主党派重点支持门头沟区发展“8+1”行动成效显著》,2019年9月25日, https://www.sohu.com/a/343261935_161623,2021年12月1日。

^② 付真卿:《脱贫攻坚同心路 乡村振兴再出发》,《四川日报》2021年4月30日,第8版。

3. 搭建平台, 汇聚振兴力量。各地统战部门创建项目招商平台、消费扶贫平台、创新创业平台、民主监督平台、建言献策平台, 一系列平台的建设, 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人才荟萃、资源优势的优势, 促进乡村经济强、产业兴、人才旺, 为乡村振兴集智聚力、招贤引才, 汇聚统战力量。如2016年起, 云南省启动“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广泛动员民营企业力量, 以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技能扶贫为主要方式, 聚焦农村产业发展、村庄建设、脱贫攻坚三大重点。自此, 全省各地村企合力, 各帮扶村精准切入自身问题, 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致富道路, 实现村民富裕, 改善落后村貌, 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截至2021年6月, 全省共有5674个企业、商会参与“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实施项目14602个, 投入资金75.90亿元, 受帮扶村5933个, 受帮扶贫困人口319.96万人。^①

(三) 统一战线在助力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缺乏长期规划, 无法适应持续发展要求。“十三五”期间乡村振兴主要是以脱贫攻坚为抓手, 解决长期困扰“三农”的突出短板。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农村发展的短板基本补齐, 转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而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长期系统性的国家战略。脱贫攻坚中暴露的深层次的乡村产业、教育、公共服务、文化等矛盾, 需要长期的规划、持续的投入、持之以恒的改进才能解决。当前无论基层政府还是社会力量, 都没能深刻认识乡村生产、生态、生活的真正含义, 很多时候简单把发展城市工业化的思维照搬到乡村发展中。如对拆旧复垦、撤村并校存在的一刀切等问题; 对于如何发展乡村缺少基于县、镇、村的全面规划, 也缺少因地制宜的特色发展规划, 一味求快、求新; 统一战线不仅在发挥建言献策、民主监督作用, 及时提出意见和对策方面较为欠缺, 而且助力乡村振兴缺乏长期规划, 更多的是以活动的方式来进行, 这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是不相符的。乡村振兴需要以梯度发展思路来进行长期规划, 县域经济、镇村融合发展、基层治理、农耕文化的赓续发展等都需要有长期规划和建设思路, 只有把建设的底稿梳理清楚, 才能一张蓝图绘到底。统一战线在规划、落实、监督中应该有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长期配套设计, 才能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

2. 缺乏共同富裕的引导思路, 无法加速产业发展正循环。脱贫攻坚期间统一战线成员大多通过“万企帮万村”实现对农村产业的帮扶, 这种帮扶很多时候是帮扶单位、企业不论产品好坏高价包销的公益性帮扶, 没有培养农户的经营能力, 镇村没能参与经营利润的分配, 造成脱贫攻坚结束、企业撤场后农产品滞销、农户返贫, 或是农产品销售利益很少分配给农户造成新的不平衡。究其原因, 就是缺少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理念和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乡村振兴就是要打破城乡的二元结构, 破解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让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 实现发展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要给企业树立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 镇村也要在合作中投入适当的资源, 同时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到合作中来形成利益共同体。促进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将更多的产业链留在乡村, 鼓励企业将适当的经营利润留在当地, 实现企业、镇村、农户利益的合理分配, 形成发展的正循环。

3. 缺乏人才长期帮扶机制, 智力帮扶效果不尽如人意。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乡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缺乏, 大量农村青壮年外流, 谁来推动乡村振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 支医支教、科技帮扶、法制教育等更多的是短时间的帮扶, 持续帮扶、培养当地人才等都没有成为长效性制度性的安排, 无法更好地发挥人才振兴的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仅依靠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中年劳力甚至是留守在家的“老人”是远远不够的。发展人才的匮乏是导致乡村振兴建设缺乏后劲和活力的原因。要建立比如科技特派员制度、支医支教帮扶制度、乡贤帮扶制度等长期性的帮扶

^① 马蕊:《民企助乡村 云岭更锦绣》,《中华工商时报》2021年6月22日,第6版。

机制,引导广大统战成员持续地对一个地方长期帮扶,才能对乡村人才振兴起到真正的作用。

三、创新构建长期平台为乡村振兴贡献统战力量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统一战线成员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势必会涉及政治层面的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经济层面的产业布局、结构调整,文化层面的乡村文明、教育发展,社会层面的基层治理,环境层面的环境保护、美丽乡村等,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的持续投入。统一战线涵盖的社会阶层广泛,需要将他们的力量进行整合统一,需要统战部门搭架好各类长期平台,持续凝聚统一战线成员的力量集中到乡村振兴的舞台上,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 搭建建言献策平台,促进乡村“规划强”

乡村集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教育功能于一体,乡村在文化、社会、生态、健康和教育各个方面尤其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健康中国、生态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实施的成败,也是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精神家园的根魂所在,因此要把农民这个主体地位树牢。统一战线成员人才荟萃,汇聚了大量规划设计、产业发展、产品设计、公共服务、文化建设、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人才,统战部门应该凝聚起他们的力量,搭架长期平台建立地方政府与统战成员间的桥梁,帮助地方党委政府做好县镇村乡村振兴整体规划,做好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设计,也为统一战线成员服务乡村振兴提供路径和思想引导。

(二) 搭建创新创业平台,促进乡村“产业兴”

低效的个体农业经营无法适应当前市场要求,也没有办法打造产业链条,城市公司化的经营又很容易把当地的农户抛出产业利益分配链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既能发挥集体组织的力量,又能充分保障个体权益,有利于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如何对接市场又是一大问题。统战部门应该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搭建平台,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城市企业对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和地方政府树立起共同富裕的思想,既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市场意识、供给能力,又引导企业帮助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和特色开拓产品销路。同时,加强地方以县域统筹因地制宜打造地理标志农产品等特色农业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镇村投入资源,将更多的产业链条留在当地。搭建合理利益分配机制,让镇、村、农户、企业共同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把乡村产业发展成各方共赢的产业,才能让产业振兴进入正循环。

(三) 搭建人才输出平台,促进乡村“人才旺”

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是人才“富矿”、政府“智库”。重视发挥统战工作在汇聚人才方面的作用,定期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政情通报会,向党外人士通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听取意见建议。积极组织统战成员参加重大项目观摩活动,让他们切身感受乡村变化,宣传乡村发展成就,在润物细无声中引导统战成员建设乡村,创业于乡村,凝聚力量支持乡村振兴。同时发挥统战成员在文化、医疗、法律等领域的特长,开创“文艺下乡村”“健康社区行”“送法进乡村”“乡村文化行”等品牌活动,持续对一个地区进行帮扶并培养当地人才。设立研究课题引导统战成员进一步发掘民俗民艺,弘扬耕读传家、勤劳致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完善基层治理。

(四) 搭建民主监督平台,促进乡村“政通畅”

组织各民主党派开展乡村振兴民主监督,将民主监督贯穿到整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全过程,同时在监督调研中引导各领域、各系统、各单位统一战线成员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科学化。

责任编辑:念兴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蕴与培育路径

——基于对香港民众国家认同教育问题的思考

王承就，赖慧婷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540003)

摘要：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培养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国族身份认同，其理论旨归直指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具有的包容性、灵活可塑性、人民性的理论特质决定了其在处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和社会安定和睦问题中的广适性。香港同胞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蕴出发，剖析“香港之困”形成的社会心理和思想根源，对在香港民众中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当前在香港民众中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充分发挥教育的主渠道功能、加强对公共领域的管理和导控、完善治港管港的法律法规、树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至上权威、构建香港地区与祖国内地之间的利益关联和命运关联等举措，将“香港之局”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破解“香港之困”。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香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2) 01-0035-09

香港，这个矗立在亚洲东部，被冠以“东方明珠”美誉的现代化大都市，以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飞速发展的经济、文化成就赢得了海内外无数的艳羡目光。在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那里，香港曾经被寄予了“引领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厚望。香港歌手张明敏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以一首名为《我的中国心》的歌曲，唱出了数百万香港民众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和挚爱深情。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香港社会迎来了历史的新纪元，香港民众深切体会到了挺起胸膛做中国人的激动与自豪。可曾几何时，香港与祖国内地的关系陷入了一个怪圈。中央政府和港区政府致力于改善香港治理和增进民众福祉的政策举措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泛政治化”，“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被断章曲解，更有甚者触碰中央管治权威和“一国两制”底线，猖狂叫嚣“香港民族”“香港城邦”的分裂口号，上演了一幕幕有组织、有预谋的“反中乱港”丑剧，这让每一个关爱香港前途命运的中国人为之困惑与愤怒。香港到底怎么了？香港人无论从民族血缘还是从文化传统上来说不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吗，何来“香港民族”一论？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下辖的地方特别行政区何来“城邦”一云？理应具备的民族认同、国家认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专项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及构建路径研究”(2019ZJY062)。

作者简介：王承就，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赖慧婷，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同为何在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多年后在民众心中未能同向深植?“香港之困”如何破局?我想,习近平总书记应时代之需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命题可以给我们破解当前的困顿局面提供一个有效的切入口。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蕴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系统阐释其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提出“共同体”的概念并对不同所有制下的共同体所具有的不同性质进行了分辨。不管是代表资产阶级少数人特殊利益而以“虚幻的共同利益”为标榜的“虚假”的、“冒充”的共同体^①——资产阶级国家,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向往的代表全体成员的“真正的共同利益”^②的共产主义社会,“共同体”这一概念都表达着一种因共同的信念追求、价值选择和利益诉求而建立交往走向联合的群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涵,结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需要,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凝聚人心、整合力量指明了方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者之间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实然的存在之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对它的认知和反映。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又具有相对独立的特点,那就是对实然之物的反映会有不同步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它有可能对实然之物的认知存在片面性,或是落后于实然之物的实际变化与发展。因此,这就有了在主体间“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命题。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该如何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蕴呢?

(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旨归

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指一种国族身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概念最早是由梁启超于1902年在其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中正式提出的。此概念提出后,其意义不断调整和丰富,今天在我们的日常语境中,“中华民族”是指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56个民族的统称,是56个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名称。^③确切地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国族概念,所谓“国族”即一个广义的人的聚集体,通过共同的血缘、语言或历史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形成的人群共同体,通常以一定的政治目的而组织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且占居一定的领土。换言之,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代表国家认同的政治概念;它不是指一个单一民族,而是由56个不同民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认同对象而构成的国族共同体;它以“统一国家为框架,是一个与统一国家互为表里”的国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与中国是“一体两面”的关系,^④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指向国家认同。

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指对本民族忠诚向对国家忠诚的延展。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国族概念,意味着不同的民族因一定的政治目的而逐步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大民族”——国家的过程,必然引导各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忠诚向着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延展。以国族认同为基础的国家认同,并不排斥各民族对其民族自身的认同和抹杀各民族特点,它寻求的是在同一政治与地域空间范围内国家与民族间共生共存的基质。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在谋求民族与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4页。

③ 《中华民族称谓的由来》,2014年5月8日, <http://tyzx.people.cn/n/2014/0508/c372202-24992346.html>, 2020年12月29日。

④ 王震中:《强化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7版。

家之间利益的“最大同心圆”。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向度

从实践的向度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顺时代变化要求而生，应实践发展要求而成。“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生、形成和作用的时代背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命题的提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处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理论的原创性贡献，是解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这类治理难题，体现中国特色、饱含中国智慧的创新性探索。

在2014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解决好民族问题的精神保障。^①在2019年9月27日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同时，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更要团结一致、凝聚力量，确保中国发展的巨轮胜利前进。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②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命题旨在解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和社会安定和睦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是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险和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所提出的凝聚人心、整合力量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特质

从理论特质来看，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概念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如前所述，它在民族与国家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并不以排斥民族利益和抹杀民族独特性为前提，具有海纳百川、求同存异的极强包容性。其次，这个概念具有可塑性和灵活适用性。“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国族概念决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实践命题起点于民族，落脚于国家。因此，它绝不仅限于就民族论民族，随着时代发展和实践需要，其理论的适应性在实践探索中将会得到不断调整和塑造，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再次，人民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本色。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社会安定和睦既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也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关人民福祉，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本色。

二、“香港之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针对香港回归之后香港民众的身份认同问题，香港大学从1997年开始每年通过电话采访和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研究，并公布结果。该研究以“香港人”“中国人”和“混合人”（“香港的中国人”和“中国的香港人”）作为市民身份认同的选项。1997年到2019年20多年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1997年为18.6%，2008年达到上升峰值38.6%，之后开始下降，到2019年这一认同跌至10.8%。与此同时，“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数据从1997年的34.9%跃升至2019年的52.9%。同期，“混合人”的身份认同数据分别为1997年的44.9%和2019年的35.8%。总体看来，香港民众对“中国人”和“混合人”的身份认同呈现下降趋势，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在不断增强。此外，研究还发现，即使选择认同

^①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举行》，2014年9月29日，http://www.gov.cn/xinwen/2014-09/29/content_2758816.htm，2020年12月29日。

^②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19-09/27/c_1125049226.htm，2020年12月29日。

“中国人”身份的受访者，他们对“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认同感强于“中国国民”的认同感。^①

以上这些感性的数据，凸显了香港民众对国家认同的观念淡薄，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2004年以来，香港社会与内地、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当前香港社会的困顿局面是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从社会心理和思想潮流的视角剖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思想根源就在于香港社会“本土意识”的异化、扭曲，向“本土主义”和“反中乱港”思潮的嬗变。

（一）从“本土意识”到“本土主义”再到“反中乱港”思潮嬗变的“香港之困”

香港的“本土意识”觉醒于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时期，它是作为一种香港民众因殖民政策被迫与祖国母体分离，在获得祖国母体庇护无望，同时要反抗英帝国殖民压迫时而建立起的一种“香港是我家”的归属情结。其本真的含义包括了一种反殖民主义的自我身份认同，为捍卫自身利益而进行抗争的民众自觉。这一意识也逐渐成为团结香港民众共同反抗殖民压迫和战胜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风险、困难的聚合剂。^②

但是香港回归之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摩擦由于交往的频繁和深入逐渐增多，香港的“本土意识”在其发展中经历了嬗变，这其中不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意为之。从2003年“反23条立法”、2012年“反国教”，到2014年非法“占中”、2016年“旺角骚乱”，再到2019年“修例风波”，香港的“本土意识”逐步走向极端，演变成一种“本土主义”，即以“捍卫地方独特性和地方利益”为名，突出地方利益优先、凸显地方优越性而强烈排拒外部主体对本地利益的分割，并最终走向拒斥中央、反对中央一面的狭隘地方主义。由此，原本作为聚合香港民众反对殖民主义、捍卫香港利益的“本土意识”，嬗变成一种狭隘的本地优先、本地利益优先并拒斥中央、反对中央的“本土主义”。^③

“本土主义”的“反中”情绪特性正好迎合少数妄图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反中乱港”分子的理论需求，他们借用“本土意识”或“本土主义”的思想外衣，故意强化香港与内地、中央的矛盾摩擦，把“爱港”与“爱国”根本对立起来，以“捍卫香港独特性”和“捍卫香港利益”为旗号博取香港民众的同情，并喊出香港“民主独立”“民主自决”的口号，把“反中”情绪引向“抗中”的极端，从而实现他们分裂祖国、祸乱香港的目的。^④

（二）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破解“香港之困”

2020年7月1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香港教育高峰论坛的致辞中深切表达了她对当前香港青少年由于缺乏国家认同、守法意识薄弱，深受“港独”思潮蛊惑而被煽动从事非法危害国家社会活动的担忧。林郑月娥指出，2019年的“修例风波”引起的暴力违法事件，令香港饱受创伤，法治受到冲击。在这次事件中，一共有3000多名大、中、小学的学生因为参与违法暴力事件而被捕，占有被捕人士百分之四十，而学生中18岁以下竟然占了四成半。除了大量学生被捕外，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事件似乎表明大学校园好像变成了“暴力温床”，学生守法意识薄弱，习惯于用口号或暴力抗争的手法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和争取自己的利益。一些中学生组“人链”、叫有“港独”含意的口号等行为，令人极度担心排拒国家和反对政府的思想已经植根于时下青年人的心中。“修例风波”还催生了一些中学生连线的组织，他们鼓吹罢课，甚至“港

① 《你会称自己为香港人/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中国的香港人：（按次计算）》，2019年6月26日，<https://www.hk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poll/datatables.html>，2020年12月29日。

② 祝捷、章小杉：《“香港本土意识”的历史性梳理与还原——兼论“港独”思潮的形成与演化》，《港澳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22、93页。

③ 李捷、李文慧：《“港独”的极化机制与过程研究》，《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3期，第45—61页。

④ 祝捷、章小杉：《“香港本土意识”的历史性梳理与还原——兼论“港独”思潮的形成与演化》，第12—22、93页。

独”。^①“本土主义”和“反中乱港”思潮的泛滥，不仅破坏了今天香港社会本该有的繁荣和稳定，也荼毒了肩负香港明天、再创辉煌大任的香港青年一代的精神世界。因此，在破解“香港之困”这道难题的时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那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破解“香港之困”何以可能呢？

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一了“爱港”与“爱国”的情绪表达，为香港社会在文化心理、价值追求等方面提供方向指引。“爱港”和“爱国”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港人“爱国”，这并不会减损“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权利，反而因“爱国”维护中央政府最高管治权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从而获得“高度自治”的坚强后盾和有力保障，真正把“爱港”落到实处。今天我们有必要在助力香港“本土意识”回归本真即“热爱香港、捍卫香港的繁荣稳定”的同时，引导“本土意识”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向发展。

其次，从“本土意识”到“本土主义”再到“反中乱港”思潮的嬗变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本土意识”“本土主义”还是“反中乱港”思潮，都是一定群体为实现其目的而打造的“精神黏合剂”，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身就是一个突破了单一民族或狭隘的地域局限性认同，转向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的国族认同的心理粘合剂，它追求各民族、各地区与国家整体之间最大利益的同心圆，并不以排斥各民族、各地区利益和抹杀民族或地域特殊性为前提，因此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理论适应性。

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内含着从“民族认同”到“文化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心理认同路线逻辑，它还内含着从构建“民族共同体”到“利益共同体”再到“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逻辑。因此，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行动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为破解“香港之困”指明了方向。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破局“香港之困”过程中的培育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香港民众的头脑和行动中沿着“知”—“情”—“意”—“行”轨迹的升华过程，就是一个将该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发生过程。因此，对于培育路径的讨论就要落脚于让香港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所“知”、有所“情”，在加强公共领域的管理和导控、完善治港管港的法律法规基础上，使香港民众面对香港与中央、内地的关系问题时，能够坚定立场，不受外界蛊惑（“意”），自觉做出将两者统一而非对立的选择（“行”）。

（一）充分发挥教育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主渠道功能

教育是进行文化传递、思想宣传和精神塑造的有效渠道。有学者认为，造成今天香港社会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意识薄弱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去殖民教育的不彻底和国民教育不给力。虽然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回归之后也有意识地在学校教育中开展国民教育，但由于害怕力度太大引起社会反感，同时在一些政治力量的反对下，香港的国民教育长期以来一直畏首畏尾，迟迟不能理直气壮地推行下去，2012年的“反国教”事件^②就是一个例证。因此，当前在香港民众中开展系统性和针对性的国民教育，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破解香港困局的有效利器。

^① 《香港行政长官出席香港教育高峰论坛致辞》，2020年7月11日，<https://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7/11/P2020071100348.htm?fontSize=1>，2020年12月29日。

^② “反国教”事件即“反对国民教育”事件。2012年港区政府计划在小学和中学先后引入“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以加深学生对国家的认识及对国民身份的认同，提升学生的个人品德及国民素质。但“泛民阵营”却故意炒作国民教育，宣称国民教育有“染红”“洗脑”的嫌疑。2012年7月29日下午由香港“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发起大游行，要求特区政府撤回拟开设的国民教育课程。

1. 必须明确香港国民教育的目标。当前香港国民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育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公民身份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引导香港本土意识融入国家大局意识,战胜“反中乱港”分裂思潮,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深植香港民众的心田,使其成长为牢不可摧的信念,化为凝聚香港各界力量,团结统一推进香港发展进步的软实力。

2. 必须选好香港国民教育的内容。(1) 历史教育具有“寻根”和“指路”的功能。通过历史教育帮助香港民众正确解决“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困惑。当前,要重点加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改革开放史的教育,使香港民众增强民族文化自尊心、自信心,正确看待鸦片战争后港英殖民政府统治下香港社会的发展,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的艰辛和伟大,以及当前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和“稳定奇迹”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顺应历史潮流进行改革开放和艰苦奋斗的结果,从而提高香港民众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的了解,增强其对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自觉反对各种历史虚无主义。(2) 公民教育具有道德教化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功能。当前,在香港的公民教育中,要特别加强爱港爱国的教育和宣传,使民众正确认知“港人治港”的“港人”指的是“爱国爱港者”,只有这样的“港人”才是香港的真正主人,才是“治港”的主体。此外,顺应时代变化和时局变迁,构建新时代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新时代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剔除个人主义、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等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所具有的狭隘性,使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真正能够体现时代进步要求、发扬香港民众敢闯敢拼精神,成为凝聚香港社会各界的黏合剂。(3) 形势和政策教育具有增强民众对国情、民情、世情、党情的了解和认知的功能。当前,在香港民众中要做好国家形势和政策的教育和宣传,增强香港民众的家国忧患意识和对国家大政方针的了解。要加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教育和宣传,广泛调动香港民众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渴望和为实现理想的奋斗激情。(4) 法制教育具有培育公民法治观念、培养守法意识和规范社会秩序的功能。当前,在香港民众中要重点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香港国安法》)和“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教育,使民众正确认知“一国两制”不是“一国两治”“一国两府”,中央对香港拥有完全的主权和全面管治权,“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治前提是坚持“一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维护中央最高管治权威置于最高地位,香港社会只有承认和坚守这一前提,才能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和自由。

3. 必须注意香港国民教育的技巧。教育的目标和教育的内容能否落实下去并取得预期效果,教育的技巧至关重要。从香港以往国民教育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国民教育必须是理直气壮的教育,容不得半点的退让与迟疑;对于各种错误的思想和观念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必须廓清思想迷雾、纠正思想误区,这一点我们是有《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作为法律保障的。此外,国民教育要注重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滴灌式”地、潜移默化地融入香港民众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在长期坚持中呈现教育效果;要采用具体而微的形式,通过“视听中国”“走读中国”等方式、途径达到“感知中国”的目标效果。

(二) 加强对公共领域的导控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

“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是20世纪下半叶以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流行术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哈贝马斯在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著作中对“公共领域”的概念及其功能进行了界说。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在国家权力机关之外的,与私人领域相对的“公众舆论领域”。公众舆论往往以批判者的身份出现,对国家权力机关形成某种监督和压力。中国古代的史书典籍《晋书·王沈传》中也有“自古圣贤,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的成语典故。“舆人”即众人,“论”即言论、评论。“舆人之论”就是指众人的意见和评论,它反映了一定群体的共同

意愿和诉求，会对统治集团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自古以来圣明贤达的统治者是乐于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议的。就“公共舆论”的形成来看，它既可以由群众中自发形成和传播，也可以由国家、政党或是社会集团提出并在群众中有意地引导和传播。今天，特别是借助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推广，“公共舆论”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大大增强，往往成为某些公共事件的“导火索”。因此，要辩证看待公共领域和公众舆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对其加强引导和管理使其朝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维护香港社会健康发展的方向发展。

1. 加强对政治团体的有效监管。因为实行的是“一国两制”的政策，香港保留了独特的政治形态。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迄今尚无规管政党注册的专门法例，在香港政治中代表社会不同声音的各种政治力量——“政党”，均是根据《公司条例》或《社团条例》登记，它们在法律上的地位都是“公司”或“社团”，这就无形中加大了管理各种政治力量的难度。^①在此背景下，借助注册之便，一些具有“反中乱港”性质的“政党”“社团”“阵线”“联盟”得以成立并走向政治活动前台。例如，2015年成立的“香港民族阵线”、2016年成立的“香港民族党”和“香港众志”，实践证明都是一些违反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方针，从事破坏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反中乱港”组织。在他们的煽动和蛊惑下，不少香港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失去理智、思想偏激，沦为“反中乱港”分子从事暴力和骚乱活动的棋子。因此，必须加强对香港政治团体的有效监管，完善相关立法工作，堵住法律漏洞，不让“反中乱港”分裂势力有可乘之机。

2. 加强对大众传媒、报刊和互联网的有效导控。有学者研究发现，香港畸形的媒体环境对造成“香港之困”的局面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长期以来，香港的主流媒体被控制在一些工商垄断集团手里，缺乏客观、公正的媒体立场，甚至成为故意制造香港与中央、内地矛盾事端的罪魁祸首。由于客观、公正媒体的缺失，加之中立的媒体，如《大公报》和《文汇报》被打压和妖魔化，这就大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在香港地区的管治权威，误导了香港民众。^②此外，一些学术刊物以学术讨论为名，公然宣扬“反中乱港”等分裂思潮。如香港大学的学生会官方杂志《学苑》，2013年编印了一本名为《香港民族论》的书，主张香港“寻找一条自立自决的出路”；2014年2月，该刊物还以“香港民族命运自决”为封面专题。假若不对此类媒体和刊物进行有效导控，势必会误导广大的青年学生走上“反中乱港”分裂势力精心设计的祸国乱港之路。需要特别澄清的是，加强对大众传媒、报刊和互联网的有效导控，“不是说只能有一个声音、一个调子，而是说不能搬弄是非、造谣生事、颠倒黑白、违法犯罪，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界限”^③。同时，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要多说多做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和睦的话和事，争做香港和祖国共同繁荣发展的建设者和促进者。

（三）依法治港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制保障

坚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香港是个法治社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香港以往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辉煌成就均可明证。但是，随着香港时局变迁和各方面发展变化，原有的法律和法规需要得到不断补充和完善，如上面已提到的政党注册法例的缺失就是一个例证。因此，必须不断完善香港法制建设，以满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实践需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良好的法治环境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良好的法治环境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香港民众中的培育；反过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也有利于香港社会安定有序，从而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健全的法律法规是良好法治环境的前提。针对近年来香港当局面对止暴治乱时，原有法律法规的缺失与无力，2020年6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① 阎小骏：《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9页。

② 李捷、李文慧：《“港独”的极化机制与过程研究》，《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3期，第45—61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7页。

十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将其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2020年10月4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召开特别行政会议，决定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禁止蒙面规例》（也即“反蒙面法”）并于2020年10月5日零时起实施。香港国安法和《禁止蒙面规例》的制定和颁布是香港法制不断健全的表现，也是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战略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成果，其实施将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制造恐怖活动、勾结外部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

此外，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牢固树立《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在香港法制体系中的至上地位和最高权威。《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根基。《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文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制定并通过的。《宪法》和《基本法》共同确定了香港“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法律依据。2020年是《基本法》在香港颁布30周年，11月17日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首次就《基本法》颁布举办法律高峰论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论坛致辞时指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是邓小平同志当年制定“一国两制”政策的初心，当前要正确认识香港基本法必须回到这个“初心”。^①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22日在网志中也表示，只有正确理解“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才能正确认识和解读《基本法》，处理好《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②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百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也一再强调，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③因此，当前在香港民众中进行《宪法》和《基本法》的宣传教育，使香港民众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方针，正确认识香港的“高度自治”与中央的“全面管治”的关系，具有正本清源的重大意义。

（四）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将香港之局融入祖国内地经济社会发展之大局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人的意识与社会生活关系时说道：“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生源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体认。香港民众的“思想之困”根源于香港社会“现实生活之难”。香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因没能适时完成经济转型升级，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格局中，其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的传统发展优势逐渐式微。与此同时，祖国内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路高歌奋进，在两相对比之下，香港民众心中不免会有失落感和困惑。因此，寻求香港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创造香港经济新的增长极，改善和增进民生福祉，是在香港民众中培育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保障。当前要特别加强香港和祖国内地之间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交往与合作，建立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无法分割”的利益关联、命运关联，在“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实然基础上逐渐培育和铸牢香港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打造粤港澳大湾

^① 《香港律政司首次举办基本法颁布法律高峰论坛》，2020年11月17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 = 1683597494217060482&wfr = spider&for = pc>，2020年12月29日。

^② 《香港律政司司长：有人不理解或故意选择性解读〈基本法〉引起很多误解》，2020年11月22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 = 1684059399514512126&wfr = spider&for = pc>，2020年12月29日。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这既是新时代推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一国两制”事业建设的一项实践创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粤港澳三地的综合优势，深化港澳地区与内地的交流与合作，将港澳地区的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港澳同胞共同投身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共享祖国发展成果。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提出：“完善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机制。支持港澳参与、助力国家全面开放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加强内地与港澳各领域交流合作，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和生活居住的政策措施，加强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①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使香港民众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真切体验到与祖国母体的利益相联、命运共通，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接纳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青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高度重视青年一代的教育和培养工作，鼓励和欢迎广大港澳青年来祖国内地追梦、筑梦、圆梦。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充分运用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年来内地学习、就业、生活，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②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性时，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关于青年一代的成长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期望：“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③广大港澳青年要将个人的梦想追求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当中，以担当民族复兴伟业舍我其谁的气魄，增强做中国人的精、气、神。

综上所述，通过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破局“香港之困”的过程就是一个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香港民众的头脑中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聚民心、强信心、筑同心的创建性过程，也是一个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香港“本土意识”融入国家大局意识，弥合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鸿沟的融合性过程，还是一个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胜“反中乱港”分裂思潮，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地区繁荣稳定的伟大斗争过程。因此，这个过程必将充满无数困难和挑战，必然异常艰辛和漫长，需要我们充分发挥中国智慧，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信心去战胜它。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年3月1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lh/2021-03/13/c_1127205564.htm，2021年7月15日。

^② 《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0月14日，<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10/14/777388.html>，2020年2月29日。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发展与建构基础

秦桂芬¹, 王毓川²

(1. 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01;

2.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费孝通先生当初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为了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必然性, 从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逻辑基础四个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基础进行具体分析, 找出内在联系, 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基础的牢固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强大的生命力, 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多元一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构基础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2) 01-0044-09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①1988年, 费孝通先生在“泰纳讲演”(Tanmer Lecture)会上, 提出了多元一体的思想。1989年, 演讲稿整理出版, 其中指出“多元一体格局”的主题: “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 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 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 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②马戎先生进一步补充道: “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民族繁荣, 应当是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战略目标。”^③至此,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基本奠定。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 论证了“多元一体”理论的正确性。谷苞先生进一步阐释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 多元与一体是并存的, 多元充实着一体, 一体维系着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 56个兄弟民族是多元; 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与56个民族的民族特点是并存的, 各民族的民族特点不断充实着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构成了各兄弟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④此后, 有学者从国际宏观角度出发, 通过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民族文化的比较, 指出中华文化发展的独特性在于文化体系内部形成的一种汉民族文化和各少数民

作者简介: 秦桂芬, 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政策; 王毓川,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政策。

① 习近平:《与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的讲话》, 转引自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3页。

②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1页。

③ 马戎:《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的历史条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24页。

④ 谷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赖以形成的基本条件》,《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第6页。

族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结构。^①也有学者从微观角度出发,研究局部地区少数民族与“多元一体”格局的关系。如王文光、翟国强从西南的地理环境、早期的文化起源、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及中原王朝的互动关系、郡县制度对西南民族融合的影响和西南民族内部多元一体的形成等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这一理论在西南民族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②总之,不管是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发展至今已趋于成熟,是研究中华民族结构的核心理论,是解开中华民族构成奥秘的钥匙,^③也是对中华民族构成的全局和中国的民族问题作了高层次的宏观的新概括。^④

费孝通先生在提出多元一体理论时,曾做出展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发挥各民族团结互助的精神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继续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发展到更高层次。”^⑤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⑥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学术界和学者们关注的主要议题,而这些讨论多是在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上展开的。^⑦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从多元起源开始的,经过了新石器时代的交融和汇集,出现了地区性的多元统一。随着凝聚核心的汉族的出现,中原出现了民族大混杂、大融合,北方民族也开始为汉族注入新鲜血液,随着汉族向南迁徙并和西部民族的交流互动,各民族逐渐走向了一体化。在抗战的烽火中,各民族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万众一心,逐渐形成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整合以及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发展,使得汉族不再作为凝聚其他民族的核心,而是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随着各民族凝聚的核心从汉族转变为“五个认同”,中国的民族格局也从“一体”向“共同体”过渡。在民族学的语境中,“一体”是以一个民族为核心的统一体,而“共同体”则是多个民族平等、团结地凝聚在一起。从对象上来说,“一体”是各民族之间互为对象,处理的是我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共同体”则是中华民族作为中国的国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⑧这种“共同体”并不是更高层次的汉化,而是中华民族作为一种民族身份屹立于当今世界,处理的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华民族“一体”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迈向的一个新的高度。

学术界对于中华民族格局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建构的历史过程,

① 杨志玲:《世界文化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多元一体发展特征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第84页。

② 王文光、翟国强:《西南民族的历史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关系述论》,《思想战线》2005年第3期,第29页。

③ 陈连开:《关于中华民族结构的学术新体系》,《民族研究》1992年第6期,第21页。

④ 宋蜀华:《认识中华民族构成的一把钥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读后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26页。

⑤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19页。

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 2022年2月21日。

⑦ 严庆:《本体与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6页。

⑧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27页。

完整厘清中华民族格局发展的历史脉络。现今,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已经开始迈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界因此敏锐地转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但对其架构基础的研究较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对于民族问题来说,这个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也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各项事业取得巨大发展的基础上建构的,解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基础,能够更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组织的稳固性、发展的必然性,更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基础

(一) 经济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是从“多元”开始的。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满天星斗”,^②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多元性。这种多元起源,是建立在不同的经济类型基础之上的。早期稻作、旱作、游牧等经济类型衍生出不同的文化类型,之后血缘关系的结合与冲突使各文化产生冲撞,在此基础上,华夏族逐渐形成。在华夏族与其他民族的冲突融合之中,“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政治实体的边界逐渐清晰。^③不同的经济类型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虽然中国古代各时期各政权都在努力调和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矛盾,但不管是政治手段还是军事手段,即使有成效,也没有完全成功。近代,由于受到经济侵略,加之政府腐败无能,中国经济情况变得更加混乱,加剧了不同类型经济之间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相互促进,产业内部经济相互配合,这就意味着我国不同类型的经济之间已经逐步实现融合。从经济制度上来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这是我国经济开始走向经济制度统一的基础。由于我国经济类型多样,为调和公有制与其他类型经济之间的关系,我国提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式,而公有制与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关系原则在于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种经济制度的建立,成功调和了所有类型经济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不会也不可能出现不同类型经济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原则使我国经济发展稳定且具有统一性。

同时,我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机制作用,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不断优化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稳步推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这样的经济制度更具生命力。作为全国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地区,其发展状态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充分认识民族地区在全国重要的战略地位,实施差异性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④既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情况,实事求是地制定经济发展策略,推动少数民族经济的稳定发展,又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纳入宏观调控的大环境中,实现经济调控的一体化,因此少数民族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进入“十三五”以来,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呈稳步增长的势态,与全国经济稳步增长率同步增速,同时成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主要贡献地区之一,体现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证明了民族地区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充分证明了我国经济制度的有效性。

在这样的统一、稳定、有效经济制度之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交通、通信等事业的发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0页。

^② 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01页。

^③ 赵越云:《原始农业类型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8年,第1页。

^④ 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研究》,《民族学刊》2011年第1期,第10页。

展,各民族间经济交往密切、迅速,加之我国加大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力度,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之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离不开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也能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任何民族不可能回归到依靠单一、封闭的经济类型而生存,任何人不能也不应该把任何类型的经济从这样的经济体系中剥离出来。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密不可分的经济体系,有着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

(二) 政治基础

恩格斯认为:“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的社会阶层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国家的新社会。”^① 中华民族的起源,是从多个血族团体开始的,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构成的社会基础单位。新石器时代末期,氏族聚落内部成员分化,血族团体开始分离,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最迟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初步建立起强制性权利系统,^② 之后夏朝的建立,是强权系统发展的必然结果。强权系统整合能力是华夏族形成的政治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核心是汉族,汉族能够对其他民族进行有效统治的基础是其政权的强制性和统一性,也就是形成了统一集权的国家组织。不可否认,集权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尤其是在加强民族凝聚力上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这种作用是在一个有限范围内,仍无法避免民族冲突问题的长期存在,这就形成了在加强民族凝聚力的同时又无法避免民族冲突的矛盾,这是伴随着整个封建时代的一个长时段矛盾。之所以无法解决,是因为自秦汉后统一集权的国家组织是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度和集权上的。中央集权和宗法是国家这个统一体中的一对矛盾,中央集权要和宗法进行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才能得到强化。^③ 这里的宗法,是一个有共同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权威领袖的宗族团体。少数民族也是宗族团体成员之一,历史证明,中央集权和民族宗法的斗争最终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羁縻政策就是典型例子。羁縻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夷制夷”,主要措施有三种,一是采取不同于中原的治理方法;二是“乱夷安华”;三是“以华变夷”增加对蛮夷的影响。^④ 这三种措施的核心都在于对少数民族宗族领袖的控制,也是与少数民族宗法斗争的矛盾,根本上来说,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上所施行的种种措施。“华尊夷卑”“华夷之辨”的思想是羁縻政策的思想基础,这就注定了羁縻政策一方面在努力维系着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又无法解决华夷之间的矛盾,导致中华民族一体化在冲突中发展却无法真正建立共同体。因此,要想解决这一矛盾,最根本的是要打破这种不平等的等级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概念始终在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主体范畴,学术界对于其争论也颇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认识到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实践的主体和一切权力的来源”。^⑤ “人民”概念的统一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之一,“人民民主专政”也界定了国家权力的主体,在这一主体中,赋予了各民族同等权力,而且是国家的一切权力。权力的平等性和至高性既打破了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又提高了所有民族的政治地位,各民族被“人民”这一概念纳入一个整体中,成为国家强制权力实践主体,保证各民族的政治统一性。另外,权力主体内部又相互承认其特殊性,为了在这种特殊性之上保证其权力的主体性和统一性。这就是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页。

② 任式楠:《我国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形成与发展》,《考古》2000年第7期,第58页。

③ 刘奉光:《论中国封建主义集权的逐渐强化》,《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第41页。

④ 彭建英:《中国传统羁縻政策略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04页。

⑤ 张弛:《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与“群众”思想探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1期,第38页。
转引自陈昌丰、朱映雪《新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人民”概念的研究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第146页。

民族区域自治,从国家整体来看,涉及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区域自治的关系;从民族自治地方来看,涉及实行自治的民族与区域内其他民族和区域发展的关系。^①这两对关系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逻辑关系。第一个关系是处理少数民族“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其逻辑是保障“权利”来建构“权力”,再用“权力”保障“权利”,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且无权力的权利只是一种利益;而无权利作基础,权力也无由产生。^②简单来说,少数民族同样是国家权力实践主体之一,民族区域自治一方面是国家强制权力在保障少数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参加到国家的强制权力体当中,既是权力的主体,又是自身利益的保障者。第二个关系是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特点注定我国不可能实行绝对意义上的“单一民族自治”,更不可能实施“民族自决”。在民族自治区中,分布有其他民族,这一关系的逻辑则是以地区主体民族为核心,与其他民族共同自治,坚决贯彻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用自治权力来维护好其他民族的利益,同时自治区其他民族能民主地参与到自治权力中,并不是摒弃民主,提高某一民族或者贬低某一民族的政治地位。

维系两种关系的动态平衡,能保障这一制度的有效运行,而该制度有效运行的核心,就是坚持在政治上各民族平等。首先,平等性成功解决了民族冲突问题,聚合了国家与地方、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其次,按照以上逻辑,如果把某一民族剥离出来,就无法参与国家权力体系的构建,也就无法保障自身利益,而无法保障自身利益,就难以实现政治权力,最终陷入恶性循环中。因此,人民民主专政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了中华民族走向共同体的坚实的政治基础。

(三) 文化基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注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多元文化的相互竞争与对抗曾使中国陷入长期的政治和经济的冲突中。西汉以后,多元文化逐渐被儒学文化凝聚。这种文化的凝聚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一元”。虽然“文化一元论”概念兴起于近代,^③但其在中国古代便早已被实践。汉初,儒学完成了初步整合,董仲舒在《对策》和《春秋繁露》中,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融合阴阳家、黄老、法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目的论思想体系。该体系代替黄老,成为汉代官方的哲学思想。^④而对于其他的文化,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⑤在这一思想当中,其他文化被归入“邪辟之说”并被“绝其道”。这就是认为多元文化之间有优劣高下之分,进而认为必然通过“优胜劣汰”而走向统一。^⑥首先承认,这种“文化一元论”是有助于文化的整合统一的。儒学之所以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在于其教化作用。不同于商周时期“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的功利性宗教,儒学作为一种哲学,更注重现实生活,其核心就在于“礼”的教化。《礼记·经解》曰:“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作为一种维护社会秩序,建构社会生活的规则,不同于宗教具有虚幻目的的仪式仪轨,“礼”成为了普遍的、规则的生活样式,这一点是任何宗教所达不到的。同时,儒学并不放弃超越现实,《礼记·中庸》曰:“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诚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合内外之道”所理解的是基于现实并超

① 周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在逻辑》,《学术界》2019年第6期,第18页。

② 漆多俊:《论权利》,《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④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121页。

⑤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3页。

⑥ 李德顺:《全球化与多元化——关于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之争的思考》,《求是学刊》2002年第2期,第13页。

越现实,并非宗教意义上完全超脱现实的“神”。儒学中的“圣”是对现实的全面理解,即“成物,知也”。可以看出,儒家哲学的目的是要为人的存在寻求真实,实现和建立超越性的基础,这是一种地道的形上学。^① 儒学强大的教化能力使其成为古代文化的核心,少数民族或自觉、或被强制地接受了儒学文化,元朝之后,中国少数民族走向儒学认同已成历史定局。^② 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一元论”的弊端开始凸显。恩格斯批判“一元论”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③ 在儒学文化看来,自己的文化是绝对正确的,《孟子·滕文公》载:“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因此,对于蛮夷文化,斥为“蛮夷风”并加以抵制。“一元论”思维使多元文化的互动只能限制在非此即彼的“敌我对抗”模式中,走不出你死我活的“冷战模式”,从而使文化的共存与对话湮没在“文化冲突论”的洪流之中。^④

从明清开始,对儒学的批判持续到新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新文化运动打破了儒学的正统地位,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是什么?康有为到陈独秀、胡适等近代知识分子都探讨了这一问题,最终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将民族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从而奠定了民族发展理论的基础。^⑤ 这里的民族发展,是指各个民族内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全面发展,也是指各民族共同发展,是以各民族的自身发展为重点,在互帮互学、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共同致富、共同繁荣。^⑥ 对于民族文化来说,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是将所有文化都视为平等的,并不突出哪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更不承认文化的优劣性,所有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各族文化之间相互交融、密不可分,这在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随处可见。最典型例子就是普通话,它是建立在北京话的基础上的,而北京话又是以北京京腔儿为基础的清代 mandarin (官话)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京腔儿为主要特征的北京话实际上是清初从东北入关的八旗兵民的满式汉语与明末北京汉人(含南京迁北京的说下江官话的人和金元时期女真所留后裔,元代所称的汉人) 汉语在乾隆末年北京内外城解体后相互融合的语言结晶。这种老北京话虽然作为汉语发展至今,但其中所借用的满语词、满汉合成词、满汉并列词(或者叫作通过满式汉语保留下来的满语词) 仍然不少。^⑦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⑧ 语言的交融代表着各族文化凝聚体的交融,以语言为基础的民族文化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文化。

可以说,现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单一的、纯粹的文化,是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自身文化基础上融合了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而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内部的各族文化早已融为一体,出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文化复合体,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实现了和谐统一。另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转型与重构,以适应现代化的发展。为此,中共中央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的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

① 李景林:《哲学的教化与教化的哲学——论儒学精神的根本特质》,《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第24页。

② 萧景阳:《中国少数民族走向儒学认同的历史考析》,《孔子研究》1995年第2期,第6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

④ 付秀荣:《文化冲突论的当代表现与评析》,《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7期,第38页。

⑤ 吴磊:《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第39页。

⑥ 金炳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理论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88年第3期,第13页。

⑦ 纳日碧力戈:《双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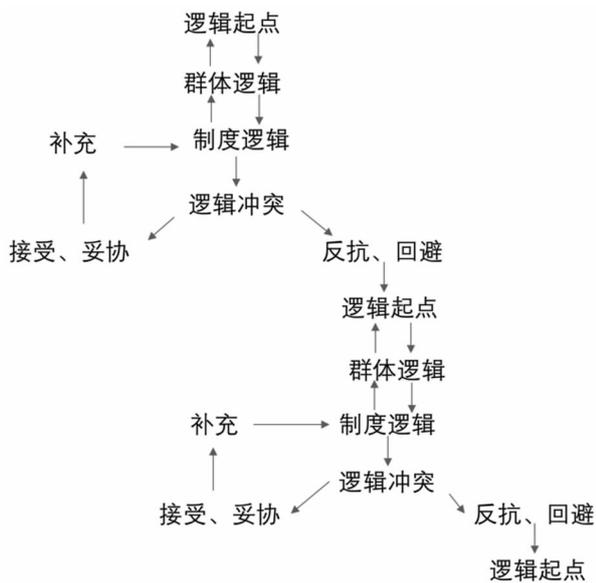
⑧ 杜道明:《语言与文化关系新论》,《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第4期,第133页。

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①通过对文化体制的改革，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协调，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统一。

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础。两个统一，处理了各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使中华民族文化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路，另一方面成功凝聚起各族文化——这种凝聚与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凝聚不同，是一种相互认同、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统一的文化体。在当今新的国际形势之下，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一个统一的文化整体参与到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之中，中华民族文化在不断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走向世界。在这一语境里，中华民族文化是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文化出现的，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秀凝聚体。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②

(四) 逻辑基础

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观念文化是文化的核心，包括了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也就是文化的哲学层面。民族是以文化凝聚在一起的，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所有成员对共同文化的认同就是建立在文化的哲学层面。换言之，就是对共同哲学逻辑的认同。一个族群的组建，在于双向的互动，即群体与个人之间的互动。群体的逻辑，归根结底是个体逻辑的复合，通过自我逻辑的扩大，由个体的逻辑变为全体的逻辑，之后又通过逻辑的有限性，建立逻辑的边界，区分“我们”与“他们”。而逻辑的无限性在于说明逻辑可以无限延伸，群体逻辑的延伸，同样是从个体的逻辑延伸开始的，之后再反作用于群体成员。随着族群组织的扩大，“个人”既能代表自然的个人，又能代表“逻辑起点”。“逻辑起点”的改变能够改变整个群体的逻辑结构。在前工业时代，由于相对的封闭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逻辑起点”以及群体逻辑，同时又由于逻辑的无限性在改变着自身或者他族的“逻辑起点”以进而改变全体逻辑，逻辑冲突由此发生，随之产生的是整套制度逻辑上的冲突。按照 Thorntonand Ocasio 对制度逻辑的理论内涵进行的拓展，可以将制度逻辑定义为：“由社会建构起来的关于物质实践、假设、价值、信念以及规则的历史模式，个体通过这些模式生产和再生产他们的物质生活、组织时间和空间，以及为他们的社会现实赋予意义。”^③由于之前每个群体的逻辑不同，制度逻辑的冲突使群体物质实践、假设、价值、信念产生冲突，阻断了个人对制度逻辑模式的生产 and 再生产，造成了个体与个体的分离、个体与群体的分离，产生了个体与群体的分离与重组，由此，可建构起一个逻辑冲突模型。



从以上模型可以看出，新的逻辑起点形成的原因是逻辑冲突时的反抗和回避，不断地逻辑冲

①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10月18日，<https://www.12371.cn/2012/09/28/ART11348823030260190.shtml>，2022年1月21日。

②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252页。

③ 毛益民：《制度逻辑冲突：场域约束与管理实践》，《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211页。

突和反抗使之不断的产生着逻辑起点,最终产生新的制度逻辑。逻辑冲突是必然会发生的,能否最终产生新的制度逻辑,关键在于看如何回应逻辑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历史上各个时期应对逻辑冲突的策略多种多样,但都无法避免新的逻辑起点分裂,之后又引发新一轮逻辑冲突。所以要打破这一循环,避免新的逻辑冲突,在应对策略中,就不能回避和反抗逻辑冲突,要做到在逻辑冲突中接受和妥协。其中一种常见的办法就是脱耦,即脱离逻辑的实践层面,接受新的逻辑,保持逻辑的运作但停止逻辑的实践。这种策略既能接受新的逻辑,又能防止逻辑起点的变化最终影响制度逻辑。但这种脱耦办法是暂时性的,并不是长效性的,因为逻辑起点一旦长期脱耦,就会产生一个新的逻辑冲突,即群体逻辑会转变为一个新的逻辑起点,与旧的逻辑起点产生一轮逻辑冲突。戊戌变法的失败就是典型例子。逻辑起点接受了新的逻辑,形成了新的政策逻辑,制定了变法的各项策略,但却脱离当时的群体逻辑即落后的封建逻辑,更与当时的制度逻辑完全不符,形成脱耦,最终产生了逻辑体内冲突。因此,脱耦实际上是忽略了群体逻辑的能动作用,要避免脱耦,就要处理好逻辑起点与群体逻辑之间的关系。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自觉,是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的,这种自觉意识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顶峰。^① 全体意识的产生也就意味着群体逻辑的形成,逻辑起点要符合群体逻辑,才能保障制度逻辑的有效运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处理好了这一点,在这一逻辑场域中,逻辑起点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② 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人民的生活,使得每个人作为个体接受了这一逻辑,即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的,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③ 社会主义观念深入群体逻辑,制度逻辑由此形成。

然而,逻辑的无限性指出个体的逻辑也存在无限延伸。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逻辑体,如果将这一逻辑体放到个体逻辑中,就存在无限延伸的可能,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对社会主义逻辑无限延伸的例子。如果每个个体都将逻辑无限延伸的话,群体逻辑终将走向分裂,陷入逻辑冲突中,在这里,就需要一个逻辑核心来凝聚群体逻辑,防止盲目的延伸,并维持逻辑的有限性,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抓住了事物的根本,这个根本就在于中华民族的行事逻辑是追求美好生活,抓住这一根本,就能成为中华民族群体逻辑的核心,其鲜明地反映了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的内在联系,促进国家、集体和个体利益辩证统一的价值原则。^⑤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经提出,就立刻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逻辑核心。

我们要认识到,以上所提的逻辑体系中,逻辑起点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执政党,共产党维系着整套社会逻辑体系。因此,对这一逻辑体系的认同,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制度逻辑建构起点的主体;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是唯一合法的执政党,符合全民族利益,利益的认同最终上升为政治上的认同;在民族问题上,在从革命到执政的过程中,探索并形成了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中建构及建设认同的相应机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9页。

⑤ 吴桂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3期,第56页。

制,并取得了良好成效。^①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已是社会事实,不能改变。此外,在这样的逻辑体系中,各民族的群体逻辑与中华民族的群体逻辑统一,对民族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认同相互依赖。由以上所述逻辑可知,其对本民族的认同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是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在逻辑上形成对党和国家的认同。

三、基本结论

(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建立在现实维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②中华民族的建构,是基于现实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基础是稳固的公有制。这就决定了在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有效实施,正确处理了个人、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而使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实现了和谐统一,加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而成为共同的行动逻辑。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与发展是建立在稳固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逻辑基础上的。这就注定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稳固性,表现在中华民族民族与民族间的相互认同、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相互认同,也体现在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统一、牢不可破。

(二) 牢固的基础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是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已经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在新背景下,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③同时,中华民族面临着新的国内外局势,这就需要中华民族勇于实践、敢于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的,即使已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也未走向衰落,而是随着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在新中国建立起的各项牢固基础之上进一步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使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变成自觉、自强、自新的民族,变成一个团结、统一、强大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民族,这已经成为中国各民族的普遍认同和根本归属。^④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有着强大、旺盛的生命力,是由于其具有坚实牢固的基础,因而能扎稳脚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白利友:《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中的政党认同建设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1期,第33页。

^② 李健、李冉:《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考察民族共同体的构建问题》,《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54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 2022年1月21日。

^④ 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6页。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唐伟

(中共临沧市委党校、临沧市社会主义学校, 云南 临沧 677000)

摘要: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 民族和睦之魂, 是最深层次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根本前提在于文化的认同。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把握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遵循; 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滋养好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血脉; 要正确认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 增强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信念。

关键词: 文化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现实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2) 01-0053-07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在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文明历史发展中, 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本动力,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能够从根本上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前提

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 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前提, 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障。在文化认同的前提下, 各民族通过平等的文化交流, 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 从根本上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这是解决民族团结问题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个时代命题, 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是坚定文化自信, 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 在此基础上, 繁荣和发展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础。

文化认同是人们长期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一种群体的感觉, 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基本价值的认同, 它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追求、精神基因和精神标识。文化是灵魂, 它总能潜移默化地以无形的意识、无形的观念, 作用于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 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文化层面上形成认同, 是最深层次的认同, 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 是 56 个民族牢固的精神纽带。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边疆治理中的文化认同教育研究”(YB2020013)。

作者简介: 唐伟, 中共临沧市委党校、临沧市社会主义学校编辑,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以中国为主要区域,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联系、稳定经济活动特征和心理素质的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构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他同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① 习近平总书记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连接其他“四个认同”的精神血脉层面,深刻阐明了文化认同是“四个认同”中最深层次的认同。由此可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为关键的是文化认同,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前提。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文化认同就是溯源、铸魂的过程。溯源、铸魂的外在表现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属于灵魂层面,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一个民族的团结、稳定,是外在的表现。一个民族的团结与稳定关键是要有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它引导着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二、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被写入党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和基本遵循。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社会发展的主轴、主线,是坚定文化自信、传承文化基因、凝聚中国力量的必然要求。

(一)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②其所蕴含的文化自信的充足底气、精神基因、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是文化认同的精神血脉。

1.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精神文明凝聚力的有力体现。追根溯源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复合体,文化认同实质上就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它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前提条件。因此,从实质上来说,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

2.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③ 坚定文化自信凸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价值和理想,这是文化认同的基础条件,因为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彰显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力量。信仰力量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我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56个少数民族的大国,以文化认同铸牢共同的信仰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① 《习近平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2021年8月28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8/28/content_5633940.htm, 2021年11月3日。

^②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第254页。

^③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第258页。

3.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① 自古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等一系列的核心理念，它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稳定器。坚定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事关民族精神独立的大问题。因此，以中华民族共同核心价值的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

（二）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传承文化基因的必然要求

文化基因是一个民族的根本精神血脉，也是实现文化认同的根本要素。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数千年仍能够不断延续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基因的传承连绵不绝。这种文化基因的传承并没有因为王朝的更迭而断绝，而是得到不断地发展。直到今天，从幼儿教室到大学课堂，从林海雪原到烟雨江南，从胡同里弄到宽敞明亮的写字楼，2000多年前的文字仍然在使用，诗文仍然在传颂，这在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是不可想象的。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之所以能得到不断传承，与历代统治者重视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教化是分不开的。要理解文化基因的传承，可以从大一统的国家观、文化典籍传承和中华民族大融合三个角度来理解。

1. 从大一统的国家观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重视‘大一统’。”^② 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大一统”的国家观已经深入人心。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国家观，注重文化共识的凝聚，因为文化的认同是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一个基础性因素。从夏、商、周、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一例外通过文化认同的方式铸牢共同体意识。例如，秦朝统一天下后，实行的“书同文”；汉朝汉武帝开始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唐实行的“科举制”全国性的标准化考试等，都是通过文化认同实现国家的“大一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从文化典籍传承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优秀典籍是中华文化的强大根基，它可以为我们的文化传承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和支持。《尚书》《周易》《道德经》《管子》《孔子》等优秀典籍，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历经千年不衰，成为中华民族一直流传下来的精神“宝藏”。人们可以不断从这些典籍中汲取智慧、增强力量，这既是文化传承的突出表现，更是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认同。在少数民族文化中，一些优秀文化典籍同样对凝聚民族认同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如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藏族）、《江格尔》（蒙古族）和《玛纳斯》（柯尔克孜族）等，都是中华文化的优秀篇章。无论是汉文化典籍还是少数民族文化典籍，其传承的过程，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形成的过程。

3. 从中华民族大融合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历史上主要实现了三次民族的大融合，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在战争中与其他少数民族频繁接触，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第二次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开发西南和江南地区，匈奴、鲜卑、羯、氐、羌族等少数民族内迁后实现民族大融合；第三次是五代十国时期，少数民族主动、自觉地接受汉族文化，也快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这种民族融合本质上是文化的融合，但并不是汉文化同化少数民族文化，也不是少数民族文化入侵汉文化，而是文化的相互吸纳和融合呈现出交相辉映的状态，这也体现了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所以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不仅在客观上

^①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第251页。

^② 《习近平：中国在民意方面比西方国家追求得更多》，2014年11月15日，<https://news.qq.com/a/20141115/003243.htm>，2021年11月3日。

形成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的关系，也推动着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强大的文化凝聚力让中华民族延续5000年而屹立不倒。

（三）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凝聚中国力量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民思想意识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显著特征，不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的现象仍然很突出，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凝聚力量，形成共识，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为没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将失去民族存在的根基。

1.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①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本动力，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我们要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用“精神力量之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强，精神力量也就越大，民族也就越团结，共同奋斗的力量也就越强大，也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2.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中华文化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和历史文明的积淀，是中华民族普遍需求和终极追求，解决的是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精神世界的根本性问题。没有文化的指引，经济社会发展将会迷失方向。我们要用文化认同铸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凝聚起共同繁荣发展的磅礴之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3.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无数仁人志士不懈奋斗的梦想。我们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不能止步于坐而论道，要落实到伟大时代的奋斗中，要体现在文化自强的行动上，归根要充分体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铸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之力，不断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智慧，才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维护民族的团结稳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③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也为我们以什么样的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

^① 《习近平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2021年8月28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8/28/content_5633940.htm，2021年11月3日。

^② 《习近平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2021年8月28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8/28/content_5633940.htm，2021年11月3日。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共同体意识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① 其为我们以什么样的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深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等重大问题，凝聚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② 我们在文化认同层面就要抓住“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这个着眼点，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认同内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要实现的目标。

2.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丰富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它有着完整、独立的思想文化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也是丰富文化认同内涵的肥沃土壤，要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文化认同丰富的时代内涵和现在表达，增强其影响力、感召力和生命力，实现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因此，我们的文化认同既要充分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与现代社会相融相通，更要深刻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核心思想、人文属性、道德标准，形成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文化认同内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绽放出更加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推进社会文化强国建设。

3. 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智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具有继承性和民族性的特点。事实如此，一个大国的崛起，必须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这样我们才能以中国人的视角观察自己的国家，也才能真正地读懂自己的国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汲取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精华，具有中国立场、中国智慧，反映中国的理念、主张和方案。我们的文化认同层面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充分彰显具有中国风格、大众兼容、中外融通的哲学智慧，以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它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

（二）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好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血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独特文化基因，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智慧源泉，是一个民族传承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要紧紧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以及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滋养好文化认同的精神血脉。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6日，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1-11/16/c_1128070038.htm，2021年11月17日。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1页。

1. 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源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有着完整独立的文化系统,是从地里生长起来的,既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更有升华的家国情怀,既有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更有天下大同的博大胸怀,闪耀着人文之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早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①,中国古圣先贤通过观象授时,指导农业生产,让中华文明从混沌的时空中,进入一个时空分明、秩序规范,按照一定的时序安排生产、生活的时代。从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的信史记录就一天也没有中断过。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相继产生了老子、孔子等闻名于世的思想巨匠。这些思想巨匠围绕着“上究天文、下穷地理、中观人文”的核心价值进行判断,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讲的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等。几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以道、儒、法、兵家为主线的系统治国理政思想,无论是道家、儒家,还是法家、兵家,他们所共同追求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了让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也正是文化认同的终极目标。

2. 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在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特有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我们要传承和把握好。例如,以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为核心的思想理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忠报国、振兴中华,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中华传统美德;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形神兼备、情景交融,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等中华人文精神;等等。只有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才能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才能很好地认识和选择中国的文化发展道路。走向未来,不忘本来,这是文化认同的根本所在。

3. 充分汲取中华优秀典籍以及古圣先贤的智慧。中华古圣先贤们无论是在治国理政方面,还是在中医药文化、建筑文化、文学饮食等方面,都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优秀典籍。道家思想代表作有《道德经》《庄子》《尹文子》等;儒家思想代表作有《尚书》《论语》《孟子》等;兵家思想代表作有《孙子兵法》《素书》《三略》等;医家代表作有《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脉经》等,我们要充分汲取中华优秀典籍里的智慧。同时,我们还要充分汲取中华圣贤的大智慧。古圣先贤们采撷着四书五经的智慧、精髓和谋略,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涤,但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我们可以站在圣祖的肩膀上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这些都是我们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源泉和重要力量。

(三) 正确认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增强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信念

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但差异并不是差距。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交锋、交流与融合日甚一日,尤其是美国在一些文化交流领域通过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干扰,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与外交,对我国开展具有政治意图的文化渗透。我们以什么样的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不仅要正确认识自己的文化,也要正确认识别人的文化,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在增强文化认同中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强。

1. 从治国理政层面正确认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周易》曰:“保合大和,乃利贞。”^② 论语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③ 中华文化强调“内在的和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0页。

② 杨天才、张善文:《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6页。

③ 钱逊:《论语》,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64页。

谐”，这是中国人最高的价值追求。中华文化源起于中国古圣先贤对大自然规律的观察、探索与升华，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始终坚持“民贵君轻”的“民本”的思想和人道是大道的根基，这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主题。西方文化则突出“外在的规则”，鼓励人们去征服自然、征服世界，让世界按照其规则来运行。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美国政府提出“美国优先”战略。“美国优先”从根本上讲就是实行美国霸权，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中国政府提出的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美国政府从本质上看代表的是自我的利益，而中国政府从本质上看代表的是世界人民共同的利益。

2. 从文化思维方式层面正确把握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中华文化注重“合”，而西方文化强调“分”。《周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① 阴阳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相互转化、依存与统摄。例如，纵观中国的医学发展史，《黄帝内经》这部中医的奠基之作，它讲治身奉身之道，而要治身就得理解天地阴阳之道。其他的中医学著作也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它们从人体的整个宏观层面实现“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而西方文化强调的是“分”，天人相分，征服自然，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例如，西方的医学，将人从整个天地之道中独立出来，不断地细分为骨科、牙科、鼻科、眼科、耳科等，随着学科的不断分化只能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而中华文化，将人融入整个天地之道之中，以整体的视角观察事物，看到的是两面、多面。

3. 从人文属性层面正确看待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中华文化以“天伦”定“人伦”，讲“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忠信孝悌”等，倡导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强调礼仪谦卑、不偏不倚；而西方文化突出的是个人利益，是一种个人至上的狭隘民族主义，注重个人放任，崇尚个人奋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个体文化”。把它延伸到制度建设层面来看，西方轻“人伦”，单纯强调以“法”治国；而中国则是重“人伦”，强调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论语》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② 《黄帝四经》曰：“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毆。”^③ 先用德育进行教化，再以法进行辅治，确保国家治理不离其正道，推天道以明人事，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我国是一个拥有 5000 年文化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历史的发展必然，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我们要从大历史观中把握历史发展大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正确看待国外文化，以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磅礴之力。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杨天才、张善文：《周易》，第 571 页。

② 钱逊：《论语》，第 70 页。

③ 张景、张松辉：《黄帝四经》，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 17 页。

历史与文化

城市符号的沉淀与延续

——昆明金马碧鸡坊的文化解读

崔 璨¹，赵文娟²

(1.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2. 云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营造建筑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活动，而城市符号则更多地表达了城市景观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作为城市牌坊的昆明金马碧鸡坊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被誉为昆明的象征。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应用符号学理论，探讨了如下问题：金马碧鸡坊作为城市牌坊何以成为一个城市的符号而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作为城市的文化象征，金马碧鸡坊所承载着的历史文化信息；作为城市变迁的一面镜子，通过金马碧鸡坊的“毁”与“建”，折射出了昆明这一历史文化名城是怎样蜕变成一个“现代化城市”的。通过上述研究，阐释了金马碧鸡坊的城市符号功能与文化象征，透视了隐藏于金马碧鸡坊中的文化内涵及其意义，为昆明的历史文化保护提供参考。

关键词：金马碧鸡坊；城市；符号；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2)01-0060-08

牌坊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建筑形式，其起源可溯及春秋中叶的“衡门”和汉代的“棖星门”。牌坊最初仅作为一种门洞式实用建筑，后来才逐渐演化成为具有了政治诉求和文化道德指引作用的符号，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物化体现。因此，牌坊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和标识。以往对牌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牌坊的文化现象及其社会功能、牌坊的地域分异与成因，以及牌坊折射出的社会伦理文化、制度文化、儒家文化、书院文化、科举文化、宗法文化、宗教文化和建筑文化等^①，而对牌坊作为城市文化符号的研究，尤其是对其文化内涵的阐释以及在传播学意义上的信息传播特性关注不够。本文以城市牌坊——昆明金马碧鸡坊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重点探讨城市牌坊的符号象征与文化解读。

“城市牌坊”相对于建在乡村城镇的牌坊而言。金马碧鸡坊是两座始建于明代、后又几经毁坏和重建，现位于昆明闹市区金碧路旁的牌坊。作为一种建筑，金马碧鸡坊历史悠久且地处城市中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调查研究”(15BMZ039)。

作者简介：崔璨，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赵文娟，博士，云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

^① 赵媛、麻勤、郝丽莎：《中国现存牌坊文化遗迹的地域分异及成因》，《地理研究》2016年第10期，第1948—1962页。

心，其受众数量多，影响力大，更具传播学和象征学的复合意义。

一、作为城市符号与信息传播的金马碧鸡坊

作为一种城市建筑的金马碧鸡坊，满足了符号学意义上的符号特征。其实，使用符号并将其作为传播手段是人类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这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说：“人是符号动物，人类通过创造和使用符号才使得自身成为区别于动物的文化实体，并且只有人类才具有这种符号化了的能力；符号化行为包括语言的传播、神话的思维和科学的认识，换句话说，人类精神文化的所有具体形式——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哲学等，无一不是符号活动的产物”。^①从符号学的视角来讲，一个物质性的，可供感知的事物，若能代表它以外的某个事物，则该事物就成为了一种符号。^②按照索绪尔的理解，每个符号都有它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个基本要素，^③具有传达意义的功能。传播本质上来讲即是信息的流通，而信息则是指只有凭借符号才能流通。事实上，信息首先表现为符号，或者说一种信息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就是某种符号。世界上不可能有离开符号而单独存在的信息，也正如不存在不包含信息的符号。因此，符号总是承载着一定的信息，信息总是表现为某种的符号。^④

作为建筑形式实体的金马碧鸡坊也是传播意义上的媒介，美国学者施拉姆认为，媒介是一种传送工具，它是通过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手段。^⑤其实，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建筑形式，牌坊的实用功能，即为人们提供生存空间的功能一开始就是很弱的，更多的则是华夏文明的一种典型标识和文化象征载体，它向世人传播着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信息，因此牌坊也是一种信息符号的载体。

建筑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信息的传播者，而且是人类文化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众所周知，在文字，特别是印刷品出现以前，建筑，尤其像牌坊这一类的公共建筑就是一种传播者，因为她有着广大的受众群体。即便到了大众媒体普及的今天，公共建筑的传播作用仍不可小觑。而且，一个著名的公共建筑，其传播的人群可以是几代几十代。金马碧鸡坊始建于明朝宣德年间，多次毁于战火或浩劫，后又多次重建，其对信息的传播历史不仅悠久，而且在不同的时代传播着不同的文化内容。由此可见，金马碧鸡坊已经具备了大众传媒的某些特点，可以将其称为“准大众媒体”。因为金马碧鸡坊基本满足了作为大众媒体的三项要素：受众群体数量众多且性质不确定；传播者是一个机构或者组织；以某种机器大量复制信息。金马碧鸡坊是一个公共建筑，其受众是广泛的。5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民众、文人墨客慕名来到金马碧鸡坊前，不仅接受着金马碧鸡坊所传达的信息，并且用各自独特的眼光来解读这些信息。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试图和金马碧鸡坊建立某种微妙的关系；牌坊作为传播者，与通常意义上的传媒“机构”或“组织”如报社、广播电台或电视台不同，他的“机构”或“组织”就是牌坊这一建筑的设计者与营造者。金马碧鸡坊在建立—被毁—重建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地被赋予了多种象征意义，也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设计者对这一特殊公共建筑的理解，并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设计风格。对于营造者来说，不同时期的建设用材也反映出了各自时期的社会发展特点，从最初的石质建材到木质建材再到最后的钢筋混凝土建材，无不打上了各个时代的烙印。据此可知，金马碧鸡坊的建筑设计师和营造工匠在

① 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20页。

② 张法：《20世纪西方美术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3页。

③ 黄华新、陈宗明：《符号学导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④ 戴元光、金冠军：《传播学通论》，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7页。

⑤ [美]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44页。

当时的时代就已经承担起了类似于大众传播中传播“机构”这一角色，发挥着相应的功能；至于信息的大量生产与复制，金马碧鸡坊牌坊并不属于大众传媒利用机器直接生产和复制出成千上万的产品之“硬生产与复制”，而是利用人流变化的一种“软复制”的方法，将牌坊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传遍社会，使大众接受。随着社会的变迁，这种牌坊的“软复制”所传播的信息也越来越抽象化，从最初的标识作用到后来的象征意义，金马碧鸡坊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

由此可见，金马碧鸡坊实际上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公共建筑，更多的是作为符号学意义上的一种传播媒介，其具备了大众媒介的各种条件，只是由于这种媒介本身与新闻传播学中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不同而被称为“准大众媒介”。

二、作为文化载体的金马碧鸡坊

作为文化载体的金马碧鸡坊，它承载着太多的文化内容，也正是这些内容成了其传播的信息。所谓信息，如前所述，是指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一种事物现象，一般泛指情报、消息、指令、信号与数据等有关周围环境及其变化的知识。从符号学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讲，信息是人与外部环境（包括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换或传播的内容。对于建筑而言，这些信息或内容最早是建筑设计师的设计理念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达。像金马碧鸡坊这样的公共古建筑，它所传播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从符号传播的视角看，它所传播的内容经历了一个从“图像传播”到“标识传播”再到“象征传播”的演变过程。金马碧鸡坊建立之初是作为“图像符号”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它所传播的是两种神奇的动物“金马”和“碧鸡”的信息，无论受众者是否了解“金马碧鸡”的传说，当看到牌坊上的动物就知道是“马”和“鸡”，这就是所谓的“图像传播”；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城市需要一个被认识的标志物，由于“金马”和“碧鸡”两种动物有着美丽的传说，为纪念它们而立的牌坊也就自然地成为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而具有了“标识传播”之功能；金马碧鸡坊500多年的历史见证了从明、清两个封建王朝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昆明城市的变迁过程，她所传播更多的是历史文化，具有了更为强烈的象征意义，因而具备“象征传播”的特点。那么，作为一个公共建筑的金马碧鸡坊能向大众传播哪些内容呢？

（一）作为昆明文化象征的金马碧鸡坊

金马碧鸡坊是“金马坊”和“碧鸡坊”两座牌坊的简称。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大多数牌坊“是封建时代表彰忠孝节义、功德、科第等所立的建筑物”^①不同，昆明的金马碧鸡坊所承载是西南地区各民族和老昆明人祈求幸福、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金马碧鸡坊的营造与神话传说中的“金马”和“碧鸡”这两种神奇动物有关。关于金马与碧鸡神话传说的起源和演化，到目前为止学界虽没能达成共识，但都认为这一神话起源于2000多年前今云南中西部地区的大姚县、永仁县一带的禺同山（不同古籍记载的“禺同山”的位置稍有不同，一说禺同山即方山，位于永仁县东北部，另一说禺同山即为大姚县西30里的龙山）。^②关于金马碧鸡为何物，根据古籍的记载，有的学者认为“禺同山”一带盛产矿物，而“金、碧，形状较奇特，方士遂诡称为神”，^③也就是“金形似马，碧形似鸡”。^④有学者结合西南地区古葬习俗推论

①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593页。

② 朱惠荣：《金马碧鸡考》，《学术探索》1999年第3期，第75—77页。

③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01页。

④ 《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50页。

认为，金马碧鸡是两个起源独立、后又合二为一的神话：碧鸡神话的起源与这一地区的民族实行碧珠殉葬习俗有关，并有一个从碧珠、碧鹃、石鸡到碧鸡的演化进程。至于金马神话的起源则与自战国秦汉以来的炼丹成金术以及西南地区盛产金矿和骏马，向封建帝王献宝马有关，而且认为是当时的术士编造了碧鸡与金马并将它们两者结合，形成了金马碧鸡的神话原型。^①也有学者认为金马碧鸡起源于白族的“白马白鸡”神话传说，并从构词学的视角将“金马碧鸡”解释为“非常漂亮的白马和白鸡”。^②近来有学者认为，金马碧鸡的起源与古代白族的盐业生产有关，是由白族的盐业开发演绎而形成的，即起源于白族的盐神传说。^③而有的学者则相信，“金马碧鸡”故事源于滇西高原青铜文化中所存在的鸡、马信仰。^④虽然“金马碧鸡”的起源有不同的解释，但根据古籍的记载，到汉代就形成了金马碧鸡的神话传说并广泛流传于云南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据说汉武帝的梦中惊现五彩祥云，并在滇南出现华美至极、啼鸣远扬的碧鸡神，令人神往不已。^⑤到了汉宣帝时期，皇帝刘询（公元前91年—公元前48年）听说西南的滇池地区有金马和碧鸡这两种神奇的动物，即派四川文人王褒持节前去云南求取。不料王褒半路染病，不得不在建宁停下（今四川西昌），随后写下了《碧鸡颂》一文，以表达对滇池地区这两种精灵的遥想，想请金马碧鸡归汉。颂词为：“持节使王褒，谨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马，缥碧之鸡，处南之荒，深谿四谷，非土之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⑥东晋时代常璩所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就有关于滇池之神马以及碧鸡出现的记载^⑦。唐代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前后），唐朝使节樊绰出使南诏，在其对南诏考察基础上完成的《蛮书》一书中说道“金马山，在拓东城螺山南二十余里，高百余丈，与碧鸡东南西北相对。土俗云：昔有金马往往出现山上，亦有神祠……碧鸡山，在昆池西岸，上与拓东城隔水相对，从东来者，冈头数十里已见此山”^⑧。昆明北靠蛇山，南临滇池，金马山和碧鸡山隔水相望，分别位于滇池的东西两侧，山水相间，风光迤迳。于此，2000多年前的美丽传说依附于昆明秀美的山水，金马山和碧鸡山早已在人们心中化为金马与碧鸡的形象。后来又经历了由唐朝、宋朝、元朝一直到明朝的历代官吏、文人墨客不间断地作诗绘画，使得昔日的金马碧鸡神话演变成昆明的文化象征深深扎根于广大民间而闻名于世。^⑨

金马碧鸡美好的传说引人遐想，人们不仅在金马山和碧鸡山修建了金马神祠和碧鸡神祠，还在昆明城内营建了金马与碧鸡两坊，并将这两个牌坊所在的道路命名为金碧路。如果说历史、传说和官吏墨客赋予了金马碧鸡坊人文之美，那么金马碧鸡坊的“金碧交辉”奇观则是自然之美：“现出此景，须秋分节在酉年之中秋日，届临酉时，日西落而月东升，日月对正而两光相射，日射碧鸡之坊影到地，向东而进，月射金马之坊影到地，向西而进，渐凑渐近，两影相接，故曰金碧

① 卢云：《“金马碧鸡”神话的形成及其南迁》，《思想战线》1990年第1期，第39—44页。

② 苑利：《“白马”、“白鸡”现瑞与“金马碧鸡”之谜——韩半岛新罗神话与中国白族神话现瑞母题的比较研究》，《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39—42页。

③ 廖德广：《白族盐业生产科技——兼论“金马碧鸡”传说源于白族盐神文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年第2期（增刊），第126—131页。

④ 李帅：《试析滇西高原青铜文化中的鸡、马信仰——兼论“金马碧鸡”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4期，第65—69页。

⑤ 张昆华：《金马碧鸡重新走向历史》，《北京观察》2002年第9期，第57—59页。

⑥ 《全汉文·王褒》，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34页。

⑦ （晋）常璩撰、任乃强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四·南中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7—268页。

⑧ 樊绰撰、向达校注：《云南志补注·卷2·山川江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⑨ 张昆华：《金马碧鸡重新走向历史》，《北京观察》2002年第9期，第57—59页。

交辉。但日月躔度，须经六十年而始有此一日。”^①因而，寓意着美好与吉祥，安康与和谐的金马碧鸡所反映的是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昆明作为一座城市也因此被誉为“金马碧鸡昆明城”，金马碧鸡坊已成为昆明人引以自豪的人文情怀和建筑景观，并成为老昆明春城的城市象征符号。

为了进行本文研究，作者对昆明市民做了一项关于昆明形象标志建筑物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调查，其中包括问卷和访谈。问卷的发放对象注意到了不同的年龄与职业的分布。问卷的发放地有公园和街道等公共场所。发出问卷共计550份，回收有效问卷524份。其中的一项问题为：讲到昆明，您首先想到的建筑物是哪一座（自由列举）？名列前几位的是：大观楼（26.29%），（老）工人文化宫（21.42%），金马碧鸡坊（21.33%），（老）百货大楼（8.27%），胜利堂（7.81%）。另一问题是：您心目最能代表昆明形象的建筑物是（单选一）：A：（老）工人文化宫；B：金殿；C：金马碧鸡坊；D：大观楼；F：不好说；G：其他。其排列顺序为：金马碧鸡坊（29.32%），大观楼（29.17%），金殿（26.56%），不好说（5.18%），（老）工人文化宫（5.14%），其他（4.63%）。另外，问卷调查的结果与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如60岁以上的老昆明人中，认为昆明的标志性建筑物的排序为金马碧鸡坊（36.52%），大观楼（33.71%），两项相加超过70%。

上述的调查结果颇有意思。第一个问题由于没有可供选择的答案，调查人员也没有作任何的提示，完全由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回答问题。大观楼位居第一也在情理之中，这与大观楼作为国家级AAAA景区、全国十大名楼之一以及拥有大观楼长联密切相关；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老）工人文化宫和（老）百货大楼都进入前5位，而且（老）工人文化宫超过金马碧鸡坊位居第二。这一方面说明现代建筑在昆明市民中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另一方面还和这两座建筑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老）工人文化宫位于昆明人民群众过去开展健身、文艺活动及举行节庆典礼等的中心场所“东风广场”，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昆明当时最高建筑，其主楼19层，高70米，可同时容纳15000人开展各项活动。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东风广场及其工人文化宫成了昆明市民休闲健身的场所和外地游客的一个旅游观光地，虽然该建筑于2013年被爆破拆除，但仍留在了老昆明人的记忆中；昆明老百货大楼位于市中心的闹市区，始建于1959年，并于当年投入使用，是当时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十大标志性建筑之一，曾经是昆明人30多年的购物天堂，维系了昆明人那个特殊年代的购物情结。而在第二个问题中，由于是单选题，金马碧鸡坊、大观楼和金殿分别名列第一、第二和第三，而且票数较为接近，这说明古建筑在昆明人们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选择“不好说”的比例为5.18%，超过工人文化宫（5.14%），而且该项与“其他”（4.31%）相加接近10%。上述调查结果至少能说明如下问题：1. 金马碧鸡坊或大观楼可以，也应该成为新、老昆明城市的符号；2. 金马碧鸡坊在老昆明人的心目中地位特殊，认可度最高，这与金马碧鸡的传说和金马碧鸡坊的城市象征不无关系；3. 昆明缺乏大众认可的标志性建筑，这也从另一侧面部分验证了“昆明所缺乏的就是一种鲜明的城市形象”的判断。^②

（二）作为城市文化变迁见证的金马碧鸡坊

城市是历史文化的容器，是人类追求和实现理想的见证。城市建筑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城市社会文化变迁的见证者。在中国，作为城市牌坊很少有像金马碧鸡坊这样历史

^① 朱惠荣：《金马碧鸡考》，《学术探索》1999年第3期，第75—77页。

^② 于希贤：《廿一世纪昆明的生态文化建设与旅游城市形象塑造——论昆明国际旅游城市的继承与创新》，《云南环境科学》2000年第1期（增刊），第7—12页。

上多次被毁，又多次被重建的现象。金马碧鸡坊的“毁灭”与“重建”，是昆明城市文化变迁的一面镜子，记录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昆明的城市变迁的诸多信息。

1. 金马碧鸡坊与“以龟其形”的昆明城

其实，金马碧鸡坊的建立除了与金马碧鸡美丽传说有关外，还与昆明古城设计思想密切相关，是昆明这一古城“以龟其形”的中轴线以及城市交通中心枢纽的具体体现。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昆明，其历史可以追溯至唐代南诏国的拓东城。拓东城的建造在设计上贯穿了“以龟其形”的理念。就城市的整体来讲，拓东城就像一只头向南，尾朝北的大龟：龟首是南门，龟尾是北门，龟的四条腿则分别是小东门、大东门、小西门、大西门，故被称为“龟城”。众所周知，龟以长寿而著称，以龟形建城象征着城市长久不衰。又由于“龟城”北枕蛇山，南临滇池，蛇山之下的龟城，形如龟蛇相交，象征着城市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元代以后，昆明城在原城址上虽然做了较大变动，但“龟城”的整体特征仍被保留下来，在城市布局方法上用凸显的中轴线作为划分空间。昆明最古老的中轴线是以五华山向南的正义路为标志，这条线也正是老昆明城的历史文化轴线。在中轴线上曾经分布有多座牌坊，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金马坊和碧鸡坊，两侧有藩台衙门和文庙。这种城市的中轴线由“坊”分割成了许多街区空间相对独立的布局，使得人们在沿着这条路径作空间穿行时会产生持续而和谐的感受。^① 云南府城昆明的交通状况，大体沿袭了南诏以来的形势，受地理环境的制约较为明显。滇西来的大道过碧鸡关后分为水路和陆路，东边、南边的交通则取陆路进入昆明市中心。金马碧鸡坊正处在水、陆通道会合的繁华街衢的转折处，既是云南府城交通的门户，又是府城中轴线的前端，既加强了中轴线，又往两边疏散人流，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2. 金马碧鸡坊的毁与建

金马碧鸡坊在历史上曾经历了多次被毁与重建，二坊也在一次次的毁与建中见证了那些特殊岁月中的重大事件，成为了昆明历史的见证者。

关于二坊究竟最初建于何时，各种记载与观点不尽相同，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其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年），目前较获公认的说法是始建于明朝宣德年间（1426—1435年）。明末农民起义军孙可望、李定国等四将军率部从金马碧鸡坊下入城，人们沿街设香案迎接；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长途跋涉，翻过金马山，从金马碧鸡坊旁经过，沿碧鸡路进城，沿途“百姓遮塞道路，左右观者如堵”。随后二坊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时毁于战乱，此时金马碧鸡坊已屹立了两百多年，也被认为是金马碧鸡坊最长的寿命。直到清朝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原址上重新修建金马碧鸡坊，道光九年（1829年）又对此坊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维修。咸丰七年（1857年）金马碧鸡坊再次毁于战火，光绪十年（1884年）第三次重建金马碧鸡坊。

随后二坊于民国五年（1916年）进行过维修，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彻底拆除，金马碧鸡坊在此期间也见证了昆明的凯旋与骄傲。1915年1月14日，蔡锷将军在昆明起兵，率领云南护国军从金马碧鸡坊下出征讨伐袁世凯，在南方各省的响应下获得成功，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1931年10月3日，昆明市举行了悲壮激烈的反日大游行，有多达3万市民参加，愤怒的人群一举捣毁了位于金碧路上日本人开设的商行保田洋行；1937年10月5日，卢汉将军在金马碧鸡坊下召开声讨日寇誓师大会，随后率滇军六十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45年2月4日，史迪威公路（中印公路）举行通车庆典，车队从金马碧鸡坊下驶过，至此，被日军封锁了近3年的运输生命线再次开通；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驻昆明的中国军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胜利大阅

^① 于希贤：《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景观特征》，《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82—88页。

兵,检阅台就设在金碧路中段,经过多年浴血苦战的中国士兵,怀着胜利的喜悦,操着整齐的步伐,行进在金碧路上;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了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爱国运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造成1位教师、3位学生死亡,“各校学生受重伤者十一人,轻伤者十四人,联大教授也有多人痛遭殴辱”^①的惨案,1946年3月17日,“一二·一”运动中四位烈士的出殡队伍从金马碧鸡坊下通过;1948年7月的昆明学生运动,学生们举行反美大游行,唱起了“反动政府要垮台”的歌曲在金碧路上走过金马碧鸡坊;更值得人们纪念的是,1950年2月,陈赓、宋任穷将军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队伍从金马碧鸡坊下通过,浩浩荡荡地开进昆明,从而揭开了昆明古城人民胜利的新篇章。至此,这古老的金碧路和金碧生辉的金马碧鸡坊,不仅是昆明古城的象征,更是昆明人民的爱国之门、凯旋之门、胜利之门,是昆明人民的骄傲。^②

金马碧鸡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彻底拆除后,直到1999年结合昆明市的城市改造,尤其是金碧路的扩宽,才在原址上按原坊的式样和尺寸重建了金马碧鸡坊,同时修建了金马碧鸡广场。由此可见,金马碧鸡坊不仅仅是两座中国传统的牌坊,它向世人传播的是昆明从古至今、从神话到现实所积淀的文化信息。因此,金马碧鸡坊由最初的建筑符号而逐渐演变为一种审美符号。这两座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牌坊不仅成了昆明人追忆昔日城市的重要坐标,也在向人们传播着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怎样转变成一个“现代化城市”的信息。

3. 重建金马碧鸡坊:民心所向

笔者本次问卷调查表明,昆明市民对金马碧鸡坊“重建”的认可度很高。例如,高达91.50%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重建金马碧鸡坊,他们认为,虽然重建后的金马碧鸡坊是一个“假古董”,但是有比没有好;在回答“您对重建的金马碧鸡坊是否满意”的问题时,有35.67%的受访者认为不满意,其中绝大多数为老人。当被问起不满意的原因时,他们认为金马碧鸡坊的周围环境太嘈杂,汽车太多。作为一个文化的克隆物,如今的金马碧鸡坊孤独地伫立在商业区中心,周围是大量的商铺,包括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快餐店、酒吧、迪高厅等。昔日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老昆明的市井建筑全被现代建筑或仿古建筑所替代,成了一个真正的“金马碧鸡旅游商城”。据《新京报》报道,2019年由于金马碧鸡坊以及周边老街被破坏,没有了周围老昆明的元素,金马碧鸡坊的文化内涵似乎也消失了不少。

上世纪60年代金马碧鸡坊被拆除,向人们传播的是“文革”的动乱与当时对历史文化认知的错位,作为昆明古城文化象征的金马碧鸡坊,被作为“四旧”和“封资修”的代表被彻底拆除,它的重建则反映了中华古老文化的顽强生命力。一座建筑即使被彻底拆除,其代表的文化在人们心中的丰碑则是不能被拆除的,因为它承载了昆明城市的历史和人们追求美好事物的愿望。

金马碧鸡坊还向世人传播着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复兴以及存在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期,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到来,昆明城市建设的速度大大加快,旧城更新改造以空前的规模与速度展开。昆明市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综合功能而进行的大规模旧城改造中,忽视了城市整体建筑文化风格风貌的保护。一方面许多古旧建筑和老街区被拆除,另一方面又斥巨资重建了许多历史文化景观和仿古一条街,试图恢复昆明古城的文化脉络。站在昆明街头,再难重拾老昆明的记忆:老城昔日拥有的灵龟之像已形影迷离,城市原来的中轴线已被网络状的城市道路所取代,仅存的几条老街,也已淹没于高层建筑群之中,昆明在变得现代化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

^① 闻一多:《“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上网日期阙如, <https://xsg.tsinghua.edu.cn/info/1006/1065.htm>, 2021年10月9日。

^② 杨树群:《老昆明风情录》,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特色。有学者指出，这种所谓旧城改造中的“复古”是一种被西方建筑界于几十年前就已经摒弃的改造计划，以“现代化”且单一的设计理念来对历史街区的建筑进行修建与改造，不仅会抹杀历史街区的历史信息，整齐划一的建筑和城市空间也会带给城市居民单调乏味、与别的城市雷同的感受。但这种“计划”在我国的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中却大行其道，也许是一种悲哀。^①当然，对于昆明市民来说，金马碧鸡坊的重建又是幸运的，它为昆明人提供了一个怀旧的场所，使得昆明这座“金马碧鸡城”又有了自己的城市符号，同时，也为外地游客提供了一个了解昆明、品味昆明的人文旅游景点。总之，金马碧鸡坊的重生对昆明城市形象的塑造以及影响力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昆明，其地形为三面环山，左有金马山，右有碧鸡山，背靠长蛇山，《大观楼长联》中“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就是对昆明自然之美的生动描述。昆明与金马碧鸡相关的地名，除了金马碧鸡城、金马碧鸡山、金马碧鸡坊、碧鸡文化广场外，还有金马碧鸡关、金马碧鸡寺以及金碧路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昆明人对金马碧鸡的特殊情怀。

金马碧鸡坊与昆明其他的城市符号如大观楼等一样，不仅仅是昆明历史的载体和文化的象征，还应成为也已经成为昆明城市形象的标志性建筑。金马奔腾、碧鸡展翅，象征着昆明这座古老城市的腾飞。因此，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要注意对昆明老街区和古建筑的保护。同时，由于媒体对城市形象的塑造与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媒体也要做好那些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复古建筑”（如金马碧鸡坊）宣传，使之真正成为昆明的城市符号；另外，还要注重发挥“准大众媒体”的文化传播作用，使金马碧鸡坊这样的建筑成为展现城市文化变迁和书写新的发展历史之丰碑，不断地向世人展示昆明的城市特色。

责任编辑：郭周静

^① 仇保兴：《复兴城市历史文化特色的基本策略》，《规划师》2002年第6期，第5—8页。

内涵·内核·内力

——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论析

太星南

(云南省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蒙自 661199)

摘要: 对于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研究, 应坚持用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看待其内涵与外延, 充分挖掘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 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主体本质、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追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爱国救民反抗压迫的价值立场、立足时代开拓进取的变革意识、不畏险隘不怕牺牲的英雄意志、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的科学品质、艰苦奋斗团结向上的乐观精神。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内涵的挖掘, 提炼出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在当代的现实价值, 使其成为促进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内力。

关键词: 红色文化; 内涵; 内核; 内力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2) 01-0068-08

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是当前中国谋求长期繁荣发展必需的精神底色。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文化, 凝聚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独特思想和精神风貌,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产物。同时, 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也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启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的重要文化, 是构成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创造的深厚积累, 是党执政地位合法性的文化基础。

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 形成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①当前, 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需要不断巩固加强,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需要更加坚定牢固, 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实价值愈益彰显。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内涵挖掘、内核剖析, 对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继续探索和深入分析, 更加深切地感知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内力与魅力。

一、内涵: 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源起与定义

有关红色文化的概念定义, 学界尚未作出统一定论。按不同角度进行定义, 大致有文化资源

基金项目: 云南省党校(行政院校)系统2020年度调研性课题“云南省红色文化的价值认同与功能拓展研究——以红河州为例”(2019XTZS026)。

作者简介: 太星南, 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网, 2017年10月18日,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613660>, 2021年11月24日。

说、革命文化说、先进文化说、特色文化说等；其起始年限，有鸦片战争说、旧民主主义革命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说、中共成立说、土地革命说等；其下限有新民主主义胜利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说、改革开放时期说等观点，不一而足。^① 笔者认为，应该以历史眼光与世界眼光去讨论红色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问题，将其进行广义与狭义的区别。考镜红色文化之源流，在中国，红色被赋予象征意义，中国革命的“红色”叙事隐喻，主要有三重：其一，暗合了红色自古被赋予的驱邪逐恶功效；其二，象征着投身革命熔炉的革命者；其三，预示着革命是一个血与火的洗礼、淬炼历程。^② 在国外，“红色”之深远意蕴最早可追溯到13世纪末的北欧，当时的“红飘带”具有“宁死不屈”的象征意味；17世纪后“红色”逐渐代表“反抗”，18世纪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以“烈士的鲜血”为象征将红旗用作国旗，并且沿用至巴黎公社时期；1923年，苏联的国旗以红色为底色向巴黎公社表达敬意，至此红色开始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红色成了取代旧秩序的宣誓。^③ 因此，广义的红色文化不仅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创造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真理本质的物质载体和精神形态的总和，也应向外延括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人类文明进步的总和。广义的红色文化上溯历史、涵盖现实、延扩未来，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根基、朝着共产主义理想前进的人类社会革命斗争历程的写照。

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乃至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一系列伟大革命、建设与改革而创造的物质载体与精神形态的总和，其中，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源起。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④ “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⑤ 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催生孕育了一个个具体的精神形态，它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谱系共有的精神内核，也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源头活水，在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百年历程中滋养孕育了蔚为大观的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体系。

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时间上限应追溯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应设置时间下限。红色代表革命，革命本义指变革天命，后延伸至重大革新，其本质内涵指向“改变”，不只有流血牺牲的暴力革命，也有新时期革故鼎新的时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勇

① 沈成飞、连文妹：《论红色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当代价值》，《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期，第97—104页。

② 罗永宽、李燕：《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与当代价值》，《文化软实力研究》2017年第1期，第5—14页。

③ 贾微晓：《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理论解析》，《理论月刊》2018年第10期，第62—68页。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21年7月1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146278>，2021年11月26日。

⑤ 习近平：《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人民网，2021年8月31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213603>，2021年11月26日。

⑥ 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网2018年1月6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749016>，2020年12月10日。

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①“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②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所蕴含的革命意蕴，在新时代更具“更新、革新、创新”的意义，其必将随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进行新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而不断发展，捕捉、记录、保存着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就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传承下来的红色精神，将不断焕发新的精神光辉，不断增添新的理论内涵，不断丰富新的文化形态，最终成为蓬勃深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色文化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标识。但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在具体的研究事项中应当有更加明晰的界限。从宏观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时空广度与发展活性，具有学理探究和逻辑推演的意义，然而切入实际的研究以及融入大众生活，必须将其确定至较为恰当的范围，以防止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在现实生活过度泛化或窄化而脱离实际，从而造成难以进行切实可行的挖掘、开发与保护、利用的操作。

二、内核：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深层的精神实质

文化的形成，是精神长时间沉淀的结果，也是精神长时间传承的结果。这种沉淀和传承，本质上就来源于精神作为一种能量，一种能强烈源源不断指导行动的能量，而这个能量指导的行动持之以恒最终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③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就是红色精神沉淀积累所形成的文化，是在特定区域的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吸纳马克思主义真理精髓而派生的先进文化，具有特定国家的民族性，具有时代参照中的先进性，具有开放发展的灵魂活性。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自成一统、蔚为大观，具有丰富多样的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按照学者张泰城对红色资源的分类，红色文化有红色旧址、红色器物、红色文献、红色人物、红色事件、红色文艺、红色建筑、红色精神、红色研究、红色创作。^④但无论哪一种红色文化形态，精微洞烛其深层本质，都能观照到系统化了的经典丰盈、价值恒久的精神内核。具体来看，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反映了八个方面的精神实质：

（一）代表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主体本质

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源自于无产阶级为追求自由解放而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而进行的不懈奋斗。《共产党宣言》向世人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无产阶级第一次取得胜利的革命，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变为现实。中国无产阶级从五四爱国运动登上历史舞台，展现出无产阶级伟大力量，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走向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⑤红色作为精神符号，代表着无产阶级的主体本质。

（二）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

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最核心的理论基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世界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前进方向。”^⑥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来源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斗争，发轫于俄国十月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21年7月1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146864>，2021年7月10日。

② 黄一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伟大社会革命》，《人民日报》2018年5月15日，第7版。

③ 贾微晓：《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理论解析》，《理论月刊》2018年第10期，第62—68页。

④ 张泰城：《论红色文化资源的分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第137—144页。

⑤ 《上下同心再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同出席2019年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人民网，2019年3月15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0976860>，2021年12月30日。

⑥ 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求是》2019年第22期，第6页。

革命胜利后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国内进行的著述演说和宣传，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形成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完成了三次历史性飞跃，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理论结晶。

（三）代表着追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

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最高旨向是引领和推动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代替着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指引下，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于1956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使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

（四）代表着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价值立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不断寻求救国救民道路，最终在诸多社会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具有远见卓识和非凡智慧。中国共产党及其带领的革命军队在各路救国运动均遭失败的情况下，走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真正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性任务。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历史必然性，自建党伊始就具有鲜明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④。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之“红”，彰显了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记录了爱国救民、反抗压迫的斗争实践：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共中央于1928年5月25日发布《军事工作大纲》，明确“规定武装割据区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毛泽东、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将工农革命军的名称正式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带领着中国革命群众，一路书写着红色传奇故事。

（五）代表着立足时代开拓进取的变革意识

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是继往开来的文化，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回答时代之问，彰显变革意识。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各个历史时期，不断革故鼎新，实现理论进化与实践进步的逻辑统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网，2021年11月17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284363>，2021年11月24日。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21年7月1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146864>，2021年11月25日。

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向人民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带领人民大胆试、大胆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中,将新中国带上了“富起来”的道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并强调,“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①。“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②

(六) 代表着不畏险阻不怕牺牲的英雄意志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篇章,从红船启航13人首聚一堂发出宣誓,到进驻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再到长征跨雪山过草地付出巨大牺牲绝地求生,从驻留延安重整旗鼓到融入抗日战争,从西柏坡小土屋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再到天安门开国大典庄严的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依靠顽强毅力和不屈精神完成了民族和国家命运改写的奇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定要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倍加珍惜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今天,在新长征路上,我们要战胜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依然要靠全党全国人民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革命意志”。^③

(七) 代表着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的科学品质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环节中,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时刻提醒中国共产党要依照客观规律办事,要以尊重客观、发挥主观能动性互为依托去进行社会革命。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承认建设时期摸索探索所走的弯路和付出的巨大代价,以清醒头脑和善断谋略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桎梏,实行改革开放,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依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 and 兴旺发展起来的”^⑤。“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⑥

(八) 代表着艰苦奋斗团结向上的乐观精神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是抱着坚定的革命信念,意志坚定而朝气蓬勃的思想行为状态,团结奋

①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第3版。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21年7月1日,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146864>, 2021年7月10日。

③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9页。

④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13年12月26日,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3954163>, 2021年7月10日。

⑤ 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习时报》2012年5月28日,第1版。

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21年7月1日,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146864>, 2021年7月10日。

进为集体利益而奉献的精神旗帜，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风貌。毛泽东书写“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等等，就是对这种精神的映照。^①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科学家们身居戈壁荒漠，在风沙漫天的环境中隐姓埋名数年，艰辛但不无奈，壮烈但不悲凉，以卓越的创造力和意志力成功实现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自主研制，筑起了中国的和平盾牌，造就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革命者所体现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在艰苦环境中不自暴自弃、绝境威胁前不畏惧退缩、困难阻碍时不畏难停滞的大无畏精神。中国革命者所体现的革命集体主义精神，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过程中团结一心、勠力同心、生死与共的精神。

三、内力：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在实践中的运用价值

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经历了形成发展、继承发展与创新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破旧立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以中国共产党及其带领的革命群众为文化主体轴心，不仅传承沿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也汲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世界先进文化的营养，在中国社会革命实践中大浪淘沙脱颖而出，以浩气赴事功，置生死于度外的气魄，熔铸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历程中一座又一座红色精神丰碑，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赓续发展，发挥历久弥新的现实价值。

（一）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是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近现代以来，多元化社会思潮怀揣不一样的目的在中国社会风起云涌，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头。改革开放之后，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复古主义等思潮袭来，一再试图破坏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现存秩序。历史虚无主义打着“理性反思、重新评价、还原真相、范式转换”的旗号，通过断章取义、望文生义、歪曲史实、恶意误导等方式，将革命斗争污蔑为纯粹的“暴力破坏”，将历史趋势污蔑为“私人欲望”，以消解革命的正义性、进步性、人民性。这种挑战、解构、污蔑，已经超出了文学创作、历史研究的范畴，而是一种政治进攻。^②“其核心就是要通过另一种的历史叙事，否定近现代中国发展的历史主线——四个选择，企图釜底抽薪，从历史依据上芟除党执政的历史必然性、政治正当性和现实合法性。”^③在当前时期，红色文化的普及、强调和再教育，能够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同西方敌对势力的价值渗透和颜色革命展开坚决斗争；保卫好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在革命战争历程中靠着抛头颅、洒热血而争取到的和平前途，增进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认同；守护好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踏石留痕、艰苦卓绝走出的革命印记，维持苦难辉煌的共同记忆，增进人民群众对中国革命历程的历史认同；维护好人民英雄的光辉形象，抵御社会中蔑视权威、调侃崇高、污蔑英雄的一系列对革命价值的解构思想行为，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英雄、中国精神的价值认同。

（二）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是筑牢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思想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要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④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充分发挥革命文物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

^①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41页。

^② 王东：《革命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34—41页。

^③ 沈成飞、连文妹：《论红色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当代价值》，《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期，第97—104页。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重要作用”。^① 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奋斗目标追求，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最为显见的文化要素，发扬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本身就是践行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初心。革命战争阶段的战争史诗、英雄烈士、起义场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热火朝天、先锋模范、建设实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建设精神；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先进典型、城乡发展、“开拓进取、兼收并蓄、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改革精神，记录了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② 发扬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能够筑牢全社会理想信念的基石，从根本上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效果，激发全民族由内而外的爱国情怀，有利于形成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三）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是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精神源泉

文化自信源于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所持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我认同、自我肯定、充分热爱和持续创新，而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所彰显的自信，是中国共产党面对民族生死存亡而敢于拨开迷雾选择真理的开创性，是面对敌人围追堵截、几番绝地求生不屈不挠的顽强性，是转战偏僻地区、发动农民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辟性，是敢于亮剑、敢于斗争、敢于决战的斗争性，是带领全国人民反抗内外压迫实现全民族解放的人民性，是在曲折探索中敢于承认错误拨乱反正的反思性，是改革开放开拓创新，找准发展命脉，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创新性，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啃难啃的硬骨头”、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共同推进的持久性，这些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性质，增添了中国人民对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文化昌盛的坚定信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所具备的高尚的道德情操、真挚的家国情怀、激越的向上意识、担当的牺牲精神，具有强烈的教育意义，在多元社会思潮涌动碰撞的当下，如一股浩然清流，涤荡道德失范、价值扭曲、精神颓靡的社会乱象，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极端个人主义对人民价值观念的侵蚀，在引领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向、提升人民大众文化修养、道德水平、思想境界方面，具有出色的净化优化效果。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品牌，在增进国民与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些问题的了解上，拥有荡气回肠的说服力和底气充足的阐释力，为中国文化增添魅力。

（四）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是彰显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情感标识

国家认同来自于国民的共同历史记忆，在当代社会，掌握历史话语解释权、强化民族共同记忆，才能真正构建国家记忆乃至形成国家认同。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传统的价值不仅可以增进社会凝聚力，使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得到灌输和社会化，还可以尽可能地来作为行动的合法性依据和团体一致的黏合剂，因为它已成为知识或民族、国家或运动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历史。^③ 这里的“传统的价值”，不仅指向中华传统文化，更指向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革命传统，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彰显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已经内化为代代相传的意识形态理念，是新时期构建国家记忆的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的历史和记忆的再现，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理论成果的凝萃、积淀、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2018年7月30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730/c1001-30176620.html>，2020年12月12日。

^②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2月，第24页。

^③ [英]霍布斯鲍姆、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转引自沈成飞，连文妹：《论红色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当代价值》，《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期，第97—104页。

创新，都是对新中国国家意志的凸显。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就是标注了现代特色的新中国名片，弘扬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过程，必然是构建国家形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湮没在历史车轨后的烽烟记忆再度燃起，炼就于火热革命时期的集体记忆再度苏醒，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焕发催人奋进、一呼百应的情感号召力，感召国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团结意志，为更远大的目标筑牢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价值认同。

（五）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是加强党的自我建设的强大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①，“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②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中的精神内核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一脉同源，是党执政的精神根基，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资源。党的自我建设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发挥思想净化作用、价值引领作用和意志锤炼作用，也永远不过时。新时期要传承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就是要让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基因流淌到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之中，承继党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为党员干部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补足思想精神之钙，以应对新时期各种内外的风险挑战，应对因党员自身建设不足导致的思想信仰滑坡、理想信念动摇的各种腐败退化问题。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是新时期进行党的自我革命的教育素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温党的来路，体悟中国共产党从最初50多名党员发展到9500多万党员的执政大党的艰辛与不易，牢记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信仰；回望党的挫折与奋起，牢记“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重温党的革命先烈故事，牢记“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的千千万万为中国革命牺牲生命奉献青春的英雄事迹，在对标先进、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中实现自我提升。

（六）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德育资源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③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带着清晰的历史记忆，铭记着中华民族历经的血与火、生与死的岁月峥嵘，向国人昭示“吾辈当自强”“落后就要挨打”的自强不息精神，更印证中国人自古以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和平治世理想。在国内，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具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用，它激励人民为争取民主、平等、自由、和谐的新社会而不断奋进。例如，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挖掘整理和宣传，能够增强少数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感和亲近感；对各行业进行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学习宣传，具有显著的提升效率、加强管理、增强信心的作用。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还能够作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优质素材，为展示国家形象发挥积极作用，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深刻的精神内核，并且极富现实运用价值，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宝库中不可漠视的珍贵资源，必须对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资源加以挖掘、整理、运用，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撑和文化动力。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习近平：《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2月，第109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③ 习近平：《在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2014年7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7/07/c_1111497611.htm，2021年3月1日。

论早期彝族史诗之美学价值和现实社会功用

——以早期楚雄彝族史诗为例

苏文韬

(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早期彝族先民为华夏大地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这其中尤以彝族史诗为人所称道。早期彝族史诗反映的是彝族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朴素认知, 蕴含着丰富的美学价值。探寻彝族史诗中的美感现象和自然美、社会美等层面的美学价值, 挖掘其中潜在的美学规律, 对于我们丰富、指导现代人的审美活动, 挖掘、保护和发展彝族优秀文化,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彝族史诗; 美学价值; 社会功用

中图分类号: I20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2) 01-0076-06

在中国文学史中, 少数民族史诗一直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这些史诗中蕴含的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美学等社会科学的内容十分丰富。少数民族史诗是我们了解少数民族历史的一部活字典, 更是我们感知祖国优秀灿烂的民族文化的聚宝盆。在卷帙浩繁的少数民族史诗中, 早期楚雄彝族史诗除了用文字的形式反映出早期彝人对自然界的认知, 描绘早期彝人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外, 还通过形象塑造等方式创造了独特的美学价值。这一现象在楚雄彝族史诗《梅葛卷》《查姆卷》《阿鲁举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三部彝族史诗中不仅流露出早期彝人审美意识的萌动,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从蒙昧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中特定的社会意识。研究早期楚雄彝族史诗的美学价值, 不仅具有美学、历史学、社会学层面的学术意义, 而且对于我们更好地传承优秀民族文化, 加快民族团结进步步伐, 推动彝族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早期楚雄彝族的《梅葛卷》《查姆卷》《阿鲁举热》三部史诗中的美感现象、自然美、社会美, 及其美学规律的现实社会功用进行一些探究。

一、早期彝族史诗中的美感现象分析

楚雄彝族地区流传着许多关于彝族族源的说法。这些说法大多以神话、故事、史诗的形式在民间流传, 当地俗称“侃古今、说根谱、侃查”。其中以史诗形式说唱族源为最主要的方式, 目前比较权威的史诗是《梅葛卷》《查姆卷》《阿鲁举热》。其中, “《查姆卷》是楚雄彝族讲述天地、日月、风雨、人类、民族、衣食等万物起源的一部史诗”。^① “《梅葛卷》是彝族的一部创世史诗。”^② “《阿鲁举热》是楚雄彝族的一部英雄史诗。”^③ 这三部史诗关于彝族族源的说法虽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作者简介: 苏文韬, 博士, 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讲师, 研究方向为文艺评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杨继中、芮增瑞、左玉堂:《楚雄彝族文学简史》,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年, 第65页。

② 杨继中、芮增瑞、左玉堂:《楚雄彝族文学简史》, 第85页。

③ 杨继中、芮增瑞、左玉堂:《楚雄彝族文学简史》, 第105页。

却反映出早期彝人对美的主客观世界的感知，亦即早期彝人的“美感”。现代美学认为，美感是审美主体对客观现实美的主观感受，是人的一种心理现象，即人类的审美意识。据此，我们可以推知三部史诗中的美感现象不是凭空而来，它是早期彝人对他们所处的客观世界的美的意象性感知，即他们对美的事物的一种主观感受。

这三部史诗，用说唱的方式，反映了早期彝人对人类起源及起源后的生产生活的认知。这三部史诗都对生产劳动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即将生产劳动以及劳动成果判定为美的东西，这正好印证了当代美学所认为的“美感的最终根源和动力来自于社会实践”^①，也即来自于生产劳动。如《梅葛卷》在“开天辟地”一章中说，“远古的时候没有天地，格兹天神派了五个儿子，四个姑娘来造天地，五个儿子喜欢赌钱……吃喝玩乐……一天天懒过去，一天天混过去……四个姑娘心灵手巧，个个喜欢干活”^②，结果造天的儿子们把天造小了，造地的姑娘们把地造大了。从这几行诗句中可以看出，早期彝人对干活造地劳动行为的赞赏，对赌、懒和消极造天懈怠劳动行为的憎恶，这显然是早期彝人的一种美感萌动。

在《梅葛卷》中的“造物”一章中，对盖房、狩猎、畜牧、种包谷、种荞子、造工具等使用很多行诗句。如“哪个来盖房……帕颇的九个儿子……帕颇的七个姑娘……树林中盖了九间房”^③。“牛从哪里来？大理苍山上，露水落下来，红露水变红牛，黄露水变黄牛，黑露水变黑牛”^④。“猪从哪里来……打烂白石头，白猪钻出来，打烂黑石头，黑猪钻出来”^⑤。在造工具这一章中，讲到天王生的九个儿子七个姑娘要榜田种地，没有造农机用的铁和铜就到处去找寻，找到铜花铁花后，啄木鸟去拣时烫得甩也甩不掉，还是人类来拣铜铁，送到几个地方却找不到打铜铁的人，最后送到牟定城才有了打铜铁的人。《梅葛卷》造物这一章，讲述的是彝人的祖先从动物向人类过渡的劳动场面，其中彝人已经感知到住山洞不美，住房子才美，同时也感知到使用牛来种田，用铜铁做工具进行的生产才是美的行为。这种最初审美意识的产生，除了将人与原始动物区别开来外，难能可贵的是肯定了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美。这里不仅将审美联想与审美感知连在一起，而且审美感知的形成源发于对审美表现的肯定和否定。

史诗《查姆卷》将彝人的祖先分为三代，分别为“独眼时代”、“直眼时代”和“横眼时代”。最接近人的这一代横眼睛人，他们种粮食、麻和绵，织绸和缎，找金银铜铁锡块。如神涅依撒萨歇指点阿朴独姆兄妹，“再给你一把种子，你们要勤耕苦种田，庄稼遍地长，粮食吃不完”^⑥。“哪个来种棉……歇索的三个儿子，剖开孔雀头，不见脑浆只有三颗棉花子……歇索的三个儿子来到地里种棉花”^⑦。“泽梗子地方，黑夺方地方……阿勒阿德两兄弟，他们认得藏金银的地方，他们认得藏铜铁的地方……兄弟俩走遍五座大山，找到了藏在山中的宝藏，他们要挖出金石头，挖出银石头，挖出铜石头，挖出铁石头，挖出锡石头，挖出五种矿”^⑧。

《梅葛卷》主要流传于楚雄的姚安、大姚两县，《查姆卷》流传于楚雄双柏县的安龙堡、大麦地两个乡镇。两部史诗中对种田、造工具等实践活动的描写都塑造了劳动者的形象，描述了具体直接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如《梅葛卷》中塑造了“天王生的九个儿子七个姑娘”的形象，《查姆卷》中塑造了“歇索的三个儿子”和“阿勒阿德两兄弟”的形象。这就说明早期彝人的美感是通

① 张涵：《美学大观》，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0页。

②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页。

③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第47—51页。

④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第63页。

⑤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第64—65页。

⑥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第285页。

⑦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第307—310页。

⑧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第320页。

过对外界具体形象的直接体验形成的，其形成的过程是有源点的。现代美学认为“审美过程始终要在形象的，具体的，直接的感受中进行”^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史诗中所描述的盖房子、种田、狩猎、造工具等社会劳动都发散出了美感的社会功利性的意念。也就是说，劳动的结果对早期彝人的祖先是维系繁衍和生产的必需品，因而是有用的，是美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两部史诗虽然都是楚雄彝族的创世史诗，但是由于产生的地域不同，其中描述的劳动方式和过程却有一定的区别，如对造工具的描述区别还很大。这种审美方式显示出审美主体不同的个体直觉性，亦即审美趣味方面的个性差异性。虽然两部史诗都是楚雄彝族先民的作品，但由于产生的地域不同，进入早期彝人审美视野的事物就不同，反映出早期彝人在价值的取舍上受到环境影响的特性。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对两部史诗进行细致的比较，可以从很多诗行中看到。

二、早期彝族史诗中的自然美辨析

楚雄彝族史诗向外传递着许多自然美的意念，这些意念，在一定程度上生发着早期彝人的自然观。史诗中关于自然美的表现大多是在“造人”之后，虽然在“造人”之前史诗中的一些诗行也传递出自然美的意蕴，但是表现得不像“造人”之后那么浓郁，那么直接，反映了早期彝人在大自然面前感受美的非自觉性意识，说明了早期彝人在大自然面前的茫然性，映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化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类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利”^②。史诗中对“造人”之前的大自然的肯定是早期彝人的自然美的原始意念的萌动，如《梅葛卷》中格兹天神的儿子姑娘把天地造好后，“请飞蛾来量天，请蜻蜓来量地”^③，“打雷来试天，地震来试地”^④。“天上没有太阳，天上没有月亮，天上没有星星，天上没有白云彩，天上没有红云彩，天上没有虹，天上什么也没有”，^⑤是格兹天神的儿子杀死猛虎，用虎的各类器官来造没有的东西，“虎眼莫要分，左眼做太阳，右眼做月亮，虎须莫要分，虎须做阳光，虎牙莫要分，虎牙做星星，虎油莫要分，虎油做云彩……”^⑥

《查姆卷》中讲到远古时候，天地连成一片，不分白昼，天地浑浊分不清，没有山川河流，也没有日夜，众神之王涅依保佐额派龙王罗阿玛到太空中种活一棵梭罗树，又派长子撒赛萨若埃到一千重天上种棵梭罗树造成日月。“派撒赛萨若埃，到一千重天上种棵梭罗树……四匹叶上四朵花……白天黑夜两朵花，轮流开在太空中，白天开花是太阳，夜晚开花是月亮……”^⑦这两部史诗中的飞蛾、蜻蜓、雷、老虎、梭罗树等，都是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物，他们在人类产生之前，也就是史诗中的“造人”之前就已存在。早期的彝人对它们予以肯定后，它们成了彝人最早的审美对象，被早期彝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马克思讲过的“人化的自然”，无形中贴上了自然美的社会标签，表现出了早期彝人喜爱自然的情感。在对这些自然物作为美的肯定中，早期彝人“对周围的现实……产生审美知觉的过程中出现人的感情状态”^⑧。

两部史诗中“造人”之后的描写表明早期彝人对自然美的感知已十分浓郁，变成了一种自觉意识。最为典型的就是他们对葫芦的称赞，葫芦这种自然物成了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东西，直接赞美的对象亦即审美对象。令人惊奇的是虽然《梅葛卷》和《查姆卷》产生于两个地域，但两

① 张涵：《美学大观》，第271页。

② 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页。

③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第7页。

④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第9页。

⑤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第13页。

⑥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第17页。

⑦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查姆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3—236页。

⑧ [苏]奥夫相尼柯夫、拉祖姆内依，冯申译：《简明美学辞典》，北京：知识出版社，1981年，第109页。

部史诗中都将葫芦当成了庇护人类躲过灾难的方舟。《查姆卷》中讲述直眼睛这代人心肠实在差，神要重新换掉这代人，于是发大洪水淹死这代人。为了让阿朴独姆兄妹俩躲过灾难，神给了他们一颗大瓜种，然后大瓜种长成的葫芦有房子大，兄妹俩进葫芦飘在水上躲过灾难。《梅葛卷》中格兹天神造人后分为三代，第三代人心不好，格兹天神要把这代人换掉，派武姆勒娃下凡，用洪水漫山川换人种，给了好心的学博若的小儿子三颗葫芦籽，小儿子和妹妹种的葫芦像囤子。洪水来临时兄妹俩搬进葫芦躲过了灾难。此外，“造人”之后，史诗中的早期彝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了直接关系，这些自然物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意义、价值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些自然物在他们的心目中成了最美的东西，能够维系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如《梅葛卷》中造工具这一章节，赞誉了自然物铜花铁花，铜水铁水。“铜的用处多得很，铁的用处多得很，打出铁来一团团……拿出就能做工具……安上铁犁头……开始犁生地……莽子长得好，颗颗像葡萄。”^①此外，《梅葛卷》中还用了两个章节说明了自然物盐和蚕丝的用途，并给予赞誉。在这两个章节里，盐和蚕丝这两种自然对象被直接打上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烙印，使得早期的彝人得以从中直观自身，说明早期彝人在加工改造这两种自然物时，认识到了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引发了意识中的愉悦，体会到了自然物的美妙。这里展现了自然美与人类的关系，“自然美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它是人和自然关系的产物，它是人类在认识、改造大自然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的”。^②而《查姆卷》在“造人”之后即横眼睛时代，对自然物“麻和棉，绸和缎，金银铜铁锡”的生产过程十分肯定，不仅赞誉这些自然物品，而且称颂它们的用途，从中显示出了早期彝人的自然美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查姆卷》用一个章节多行诗句赞美了造纸和笔的自然物竹子和香獐，“竹子作笔管，獐毛做笔头，做成纸和笔……不管风季和雨季，让彝家子子孙孙读书和写字”。^③在这些诗行中，早期彝人自然美的观念已然完全释放，已将读书和写字当成了美的行为，由自然美向着更高一级的社会美过渡。美的观念已不再像“造人”前一样，显得是那样的不直接，甚至带有茫然性。

三、早期彝族史诗中的社会美赏析

楚雄早期彝族史诗《梅葛卷》和《查姆卷》中流露出了早期彝人的许多社会美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另一部史诗《阿鲁举热》中表现的最为直接。这种社会美的观念比早期彝人自然美的观念更为高级，其中渗入了早期彝人的理性思考，标志着早期彝人美的意识的飞跃。这其中的社会美已不再是早期彝人的茫然意识，已打上了主观能动性的烙印，具有了欣赏的价值性。

三部史诗中对社会美的欣赏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对于社会劳动产品的美的欣赏

《梅葛卷》盖房子一章中，叙述了人类由洞穴中居住，搬到通过劳动形成的劳动产品房子中居住的过程，并十分欣赏劳动产品“房子”。“哪个来盖房？帕颇来盖房……各样房子都盖齐，各样房子都盖好……住的住好了，天王地王都喜欢”。^④《梅葛卷》中还十分欣赏蚕丝这种劳动产品，“蚕丝挑出来，丝线纺出来，白茧纺出白丝线，红茧纺出红丝线，黄茧纺出黄丝线，各色丝线都纺好，用它来绣花衣裳”。^⑤《查姆卷》中对劳动产品同样表达了欣赏美的心态，讲述了列贵埃们六个姑娘织出了绸缎后，“城墙上晒红绸子，城楼上晒黄缎子，皇帝见了动心，都府见了红眼，县官见了笑成泥一团……后代的子孙啊，穿上了绸和缎”。^⑥这几行诗句流露出了早期彝人的社会美的

①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第88—90页。

② 张涵：《美学大观》，第300页。

③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第336页。

④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第55页。

⑤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第96页。

⑥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第320页。

意识,其美的观念已经表述得十分明晰。

(二) 对于社会人的美的欣赏

三部史诗中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美的意识也多有流露,对人的内在美以欣赏的方式予以肯定,对内在不美的人予以否定。如《梅葛卷》中,对两只眼睛朝上生的这代人予以谴责:“这代人的心不好,他们不耕田不种地,他们不薅草不拔草……这代人心不好,糟蹋五谷粮食。”^① 史诗还写到,对于心不好的人,格兹天神用洪灾惩罚他们,把这代人换掉。如《查姆卷》中讲述了独眼睛这代人的不美之处,“独眼睛这代人,道理也不讲,长幼也不分,儿子不养爹妈,爹妈不管儿孙,饿了就互相撕吃,吵嘴又打架,时时起纠纷”。^② 面对这代人的不美行为,神仙之王涅依保佐颇召集众神商议,用洪灾换掉这代人。

在另一部已整理发表五百多行诗句的史诗《阿鲁举热》中,早期楚雄彝人的社会美的美学观念流露得更为直接。这部史诗中的“阿鲁举热”被早期楚雄彝人描绘成了一个“英雄”,其英雄的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史诗中的阿鲁举热是“鹰”与人的儿子,长大后沦为部落头人“日姆”的儿子,受尽了苦难。好心的汉族大哥给了他三只鹅,鹅为了感谢阿鲁举热的不杀之恩,给了他神箭、神线。神箭神线法力无边,他就用神箭和神线消灭了日姆。日姆死后,世间还不太平,天上有七个太阳,晒得万物枯焦,还有六个月亮照的大地昼夜不分。阿鲁举热为民除害,射下了六个太阳五个月亮,只留下一个太阳一个月亮,还制服了蟒蛇、石蚌。史诗用多行诗句描写了阿鲁举热的英雄壮举,这些描写背后折射出了早期楚雄彝人对美的意象和美的社会价值的认识。这部史诗中的人物性格各异,其中社会美的意象十分突出。如阿鲁举热勇敢机智,汉族大哥热情善良,日姆贪婪邪恶,日姆的小老婆阴险毒辣。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史诗将阿鲁举热塑造成了一个悲剧性人物,他战胜了日姆后将日姆的太太和小老婆据为己有,最后在其小老婆的算计下淹死在海里。这样的情节安排,让人在惋惜阿鲁举热悲剧命运的同时,还对日姆的小老婆的阴险狠毒感到愤怒,从而产生出一种心理对立的社会美效应,陶冶和净化了人的心灵,达到让观赏者在怜悯与痛苦中洗刷心灵上的灰尘的目的。

(三) 对于社会环境美的欣赏

三部史诗中发散出的社会美的一个共同点是对美的社会环境的认可、追求与向往,让人读后产生美的联想。如《梅葛卷》中追求的“太平”主要靠造物来获取,《查姆》卷中追求的“太平”主要靠惩恶扬善来获取,《阿鲁举热》中追求的“太平”是靠英雄战胜邪恶势力和征服自然来获取。阅读三部史诗中这些追求太平的不同举措,让我们有了一种有看见“甲”而想起“乙”的审美的冲动,能够进阶地品味“太平”世界里的更美的事物,它反映的是早期楚雄彝人的社会美的观念的衍生,体现了人们关于至善至美的生活和观念的完整而具体的感性形象。三部史诗中的社会美还体现在它的艺术美上,如《阿鲁举热》这部史诗故事情节较为完整,情节中的矛盾高低起伏。而《梅葛卷》和《查姆卷》中多处出现的比喻将自然人化,特别是多次出现的排比句式,加深了阅读者对美的事物的关注。三部史诗中共同具备的艺术美是发散着浪漫主义情怀的,如《查姆卷》中到天上种梭罗树,罗塔纪姑娘挑海水洗太阳和月亮;《梅葛卷》中请飞蛾来量天,请蜻蜓来量地。《阿鲁举热》中阿鲁举热骑着飞马飞到海的两岸,以及射下日月等。这种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体现了早期楚雄彝人社会美的特性。

四、早期彝族史诗美学规律的现实社会功用

早期楚雄彝人的三部史诗不仅蕴含着丰富的美学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其内蕴的美学规律对我们今天振兴彝族乡村,发展彝族文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这里所谈的美学规律,亦即三部史诗中

^①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第23—24页。

^② 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查姆卷》,第233—236页。

流露出的自然美学和社会美学之规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深刻领会马克思对美的规律的阐释，美的规律是在人的社会实践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和层次上才出现的，并具体地表现在人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的塑造等各种领域中。按照这一阐释，这三部史诗反映的是早期楚雄彝人从原始公社解体向奴隶制过渡时期的社会意识，是早期楚雄彝人的社会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和层次的产物，体现了人对大自然的尊重，对改造世界和人类本身的肯定，其弘扬真善美的朴素价值取向和浪漫主义美学对于建设美好社会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们要用三部史诗中彝族先民勇于改造自然和人类本身的精神和战天斗地的浪漫主义情怀，激发彝族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变“输血”功能为“造血”功能，像史诗中的早期彝人一样不惧困难去创造美好生活。阅读三部史诗，我们要充分把握其中的美学规律，并以之引导彝族群众培树健康的经济文化、村落文化和彝族本体文化。

（一）培养树立健康的经济文化

三部史诗中流露出了浓厚的经济文化，如民族化的种植养殖，这种经济文化是早期彝人的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形成的，对这种经济文化的肯定本身就发散着一定的美学思想。当前随着现代化在彝族村寨的推进，彝族传统的经济正在消退，经济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种现象的根源除了对本民族的经济文化缺乏自觉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彝族文化自身的美学规律认识不足。须知，只有带有个性化特征的经济，也就是民族化的经济，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如果市场上都是同一类型的经济，其市场交换价值是难以实现的。三部史诗中的经济文化符合美学的基本规律，虽然简单甚至原始古朴，但是可以启迪今天的彝族群众去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文化。

（二）培养树立健康的村落文化

彝族村落长期的发展历史使得彝族村落呈现出稳定性、独立性、天然性和民族性的特征，积淀着浓浓的历史、建筑、宗教、文学、饮食、习俗、哲学和伦理等方面的文化内涵。今天，随着彝族村寨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一些彝族传统建筑被钢筋水泥支撑的小洋楼代替，传统的彝族村落文化受到毁坏，令人不胜惋惜。传统的彝族村落文化到底具不具有社会美的价值，在充分理解三部史诗中流露出的美学规律后，我们得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彝族传统的村落文化在世界上具有唯一性，三部史诗中对建房造物等基础环境的营造的描述，反映的是早期彝族先民对居住环境美化的认知，我们应该运用其指导我们发展健康的彝族村落文化。彝族村落经过长期的发展，不仅内含美学规律而且具有美学的特质。一切建筑物都既有职能的、技术的特质（舒适、实用、坚固、经济），也有审美特质（表现一定思想内容的艺术形象）。三部史诗对创造居住环境的描述是非常独特的，那些独特的创造方法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民族性的美，符合美的规律。今天我们运用这种规律，并不是用它原始的创造方法，而是吸收它适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精神。

（三）发展彝族文学、丰富彝族文化

应合理运用三部史诗中的美学规律来指导我们发展彝族文学，丰富彝族文化。三部史诗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是早期彝人审美联想的萌动，这种想象既有反映又有表现，这种既感性又理性的手法符合我们今天所谈的美的规律。彝族文学发展到今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毕竟还没有出现像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王》、小说《尘埃落定》，蒙古族小说《长生天》，白族电影《五朵金花》，壮族电影《刘三姐》那样有影响力的作品，同时其诗歌散文的创作发展与其他民族相比相对要缓慢一些。从1949年至今，虽有不少彝族作者从事文学创作，但反映彝族典型的个性化形象的作品不多。三部史诗塑造的文学形象虽然粗陋简单，但是其塑造手法上将反映与表现相统一的特性，是非常值得我们广大彝族创作者学习和借鉴的。这种符合美的规律的创作方法告诉我们，在创作过程中既应当注重再现彝族群众的现实生活，使创作的作品真正具有彝族特色，同时又不能对彝族现实生活进行机械性照相和简单再现，而要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提炼升华，从而创作出具有彝族特色的美学形象。

责任编辑：朱家麟

云南故事

用地名讲述红色故事

——云南政协报社新媒体助力党史学习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张莹莹，杨丽娅

(云南政协报，云南昆明 650032)

摘要：地名作为社会基础地理信息，其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管理效益逐渐凸显，这对地名相关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各媒体纷纷以多种载体和形式讲述红色故事，云南政协报社另辟蹊径，充分挖掘地名背后所蕴藏的红色文化，以地名为载体讲述与该地名有关的红色故事。讲述形式上破除新媒体产品同质化严重、内容混乱、平台缺乏社交互动性等制约因素，以“沉浸式+讲述”把观众带到现场，以“现场+云端”开辟学习新途径，以“互动+感悟”炼出学习新局面。通过创新形式内容，提升内容品质，精心策划报道，打造品牌效应等举措，将相关红色故事呈现给广大受众，在新媒体创新建党百年报道、助力党史学习教育方面收获可喜成效和经验。

关键词：党史学习教育；地名文化；红色记忆；红色基因

中图分类号：D2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2)01-0082-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被一直传颂着。红色故事展现了历史的真实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鲜活体现。讲好红色故事，有助于传承党的红色血脉，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与之相关的各类纪念活动也随之增多，但要让这样的媒体产品突出“重围”、得以“出圈”，还需要做到“形神兼备”，务必要在形式和内容上下足功夫。在各家媒体发挥所长，以老党员、文物、家书等多种载体讲述红色故事时，云南政协报社另辟蹊径，看到了地名背后所蕴藏的红色文化，以“地名+红色故事”为主题，围绕100个地名讲述100个红色故事，以实地探访的微视频结合影视资料、情景再现等形式，多元、生动反映了真实动人的峥嵘岁月，吸引广大读者受众一起追寻红色记忆，聆听地名故事。

一、它山之石：云南党史学习教育新媒体产品的不足

(一) 产品同质化严重

2021年正值建党百年，各家媒体的新媒体产品纷纷以红色文物、家书等载体讲述红色故事。

作者简介：张莹莹，云南政协报新媒体部主任，主任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新媒体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杨丽娅，云南政协报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企业文化等。

由于角度相似，红色素材局限性高，自由发挥度低，导致产品内容同质化严重。主要体现在不同属性媒体之间素材相同，不同媒体平台之间内容相似，媒体产品千篇一律，读者观众容易审美疲劳。如此来看，要想讲好红色故事，分众化、差异化必不可少。

（二）产品内容混乱

当前，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自媒体时代已然到来。在这个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制作、上传媒体素材获取便利、流程操作简单容易上手，门槛较低。但由于大众文化水平以及思想意识方面参差不齐，导致新媒体产品内容、品位存在极大差异，质量难以保障。而红色故事关乎历史、政治的真实面貌，马虎不得。新媒体产品内容混乱，俨然成为新媒体报道党史学习教育中存在的大问题。

（三）新媒体平台缺乏社交互动性

当前，一些新媒体产品不注重平台的社交属性、粉丝（fans）粘性等，于用户而言，内容不具有长久吸引力、互动性、体验性，即使是较为优质的素材内容，也难逃读者用户“一次游”。“回头客”难培养，久而久之，平台缺乏活跃度和互动，徒有一群“僵尸粉”而毫无流量可言。

二、破茧成蝶：云南政协报新媒体助力党史学习教育的实践探索

（一）“沉浸式+讲述”把观众带到现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讲好红色故事，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内容为王，讲好事实。

真实性是红色故事的生命。所以云南政协报社本着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在查阅大量史料的同时，向云南省民政厅获取了我省地名相关的权威信息，还向省委党史办考证了该地名发生的“红色事件”以及与之有关的“红色人物”。

在考据史料、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云南政协报社通过鲜活案例做到了讲史实、讲事实，做到旁征博引，使受众在听故事的过程中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为人民的初心宗旨。为了讲好地名的红色故事，云南政协报社记者奔赴基层，在当地寻访老党员、纪念馆的讲解员、当地的党政干部，讲述当年发生的故事以及对后人的影响。在视频剪辑中，通过现场景别、后期制作突出“红色地名”，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新媒体微信、客户端推出的《红色记忆·地名故事》第一期中，记者以 vlog 的形式，带观众走进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节孝巷 39 号，用现场同期声为大家讲述了节孝巷 39 号“中共地下党建党旧址”的红色故事，带动读者受众一起沉浸式感受节孝巷 39 号背后的红色力量，学好党史，凝聚力量，薪火相传。该视频的推出，带动了其他用 vlog 讲红色故事的具有强烈现场氛围的现象级作品在各家媒体陆续推出，但因为突出“地名”元素，在众多的讲述红色故事的报道中，云南政协报特色鲜明，起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促进了政协系统形成全方位党史学习教育氛围。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被一直传颂着。红色故事展现了历史的真实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鲜活体现。讲好红色故事，有助于赓续党的红色血脉，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二）“现场+云端”开辟学习新途径

讲好红色故事，要注重分众化、差异化。在媒体产品同质化严重的当下，云南政协报社在利用全媒体平台讲好红色故事的同时，注重凸显红色故事的教育功能，挖掘其中蕴含的革命精神、思想境界、浩然正气和人格魅力，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特别是在不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中，对

于推动广大干部群众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悟初心、践使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不断深化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斗力量,云南政协报通过《红色记忆·地名故事》栏目以“现场+云端”的模式,创新了讲好红色故事的形式和内容,也为省政协机关、报社党员开辟了学习党史的新途径。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云南政协报社利用现场拍摄地名故事的契机,让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走入纪念馆、烈士陵园、陈列馆等现有红色文化基地,在充分挖掘本土红色文化的同时,开展一些现场教学活动,不仅把红色地名故事讲给受众听,还做到了让讲述者、参与活动者在边走边看边学中接受党性洗礼。

云南政协报社在其客户端、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同步开设《红色记忆·地名故事》专栏,在最终呈现的短视频作品中,不仅有记者在现场讲述的画面,还有专家、学者以及亲历者的讲述。除此以外,还通过影视资料等进行场景再现,很好地普及了党史,让群众接受红色洗礼。

2021年7月初,云南省政协办公厅信息宣传处党支部联合云南政协报社党支部一起走进了云南解放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参观学习中,报社的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同步给观众们讲述了翠湖南路65号地名的红色故事。让大家知道了翠湖南路65号宅院不仅与云南民国时期的历史密切相关,而且是云南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地,也是陈赓、宋任穷两位首长的居住地和办公地,在中缅勘界期间,周恩来总理也居住在这里。

通过讲述这个地名的红色故事,让参加活动的党员,观看视频的读者了解到云南解放的历史,是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史,是云南各族人民不屈不挠与专制统治进行英勇抗争的革命史,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组成部分。云南解放,开创了云南历史的新纪元,结束了数千年漫长的苦难生活,使云南各族人民踏上了一条走向光明、走向胜利的道路。

为进一步发挥新媒体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作用,云南政协报社分析各平台受众喜好,不断丰富内容,创新形式、角度、种类,深入发掘主旋律文化中的独特新闻点,通过直播、vlog、海报等新时代大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有针对性地打造了“地名红色故事”系列差异化的正能量产品,让大众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接受正能量的熏陶。充分利用受众面广、口碑好、热度高的新媒体平台进行了传播。

(三)“互动+感悟”炼出学习新局面

党史学习教育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展开,讲述地名的红色故事只是云南政协报社助力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方面。加强党史学习、抵御历史虚无主义需要明确党史学习的核心目标,准确把握历史真实,注重对史料的挖掘、考证、整理与收获。新时代加强党史学习需要坚持正确的党史观,加深对中共党史问题的认知,摒弃党史学习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因此在党史学习教育实践活动中,把握党史学习教育清晰的逻辑主线,坚持内容和形式并重,强化受众对党史学习内容的领会也是云南政协报社着力引导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方面。

一是增强互动性、体验感,将对象更好“带入”,推动学习教育氛围迅速升温。云南政协报社除了全媒体开设《红色记忆·地名故事》,还联合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开设了《红色故事》,定期发布党史档案中的红色故事内容。开设《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争取更大光荣》栏目,重点发布省政协委员关于接受党史学习教育的感想感言。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云南政协报社各新媒体平台还推出了8期《学党史 促履职 委员微讲堂》栏目,以视频讲堂的形式反映政协委员学党史的心得,让政协委员们带着受众一起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感悟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传递了同心共筑中国梦、履职尽责勇担当的决心和信念。

这些栏目刊发的稿件在云南省各级政协委员间反响热烈。委员们积极参与,踊跃投稿,与报

社新媒体平台一起共同发力，一起打造了“沉浸式+感悟”的党史学习教育新途径。云南政协报还通过组织线下讲感想、讲心得，深入交流、相互点评等形式，激发思考、启发思维，在其报纸、客户端、网站平台发布了省政协机关广大青年对学习党史的感悟文章，力求促进其学深悟透、真懂真用，充分提升了党员、群众参与党史学习的积极性。

二是充分整合资源，“借船、助船出海，组队出海”。云南政协报社发挥自身优势，充分整合利用各方面平台资源，不但通过“借船出海”拓展和扩大自身影响力，还推动实现“助船出海”，帮助相关基地、平台、项目、内容等既有资源获得进一步传播、推广和效能提升。

例如，云南政协报积极发挥自身主流媒体优势和影响力，协同联动省政协建立的“政协委员学习教育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在网站、客户端、微信号对“基地”网上学习展厅进行详细报道，对使用“基地”进行引导，向受众宣传推广并引导其登陆和使用“基地”建设的相关学习平台。如网上参观昭通“扎西会议”教育基地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参观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教育基地，回顾云南各民族代表团结一心跟党走的光荣历史，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参观怒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教育基地，感受云南“直过民族”一步跨千年，实现全面小康的伟大成就等。构建网络教学基地，拓展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形式、丰富了学习内容，方便广大干部群众随时随地自主学习。通过在学中悟、学中思、学中干，不断丰富检验学习党史成果。

结合省政协的党史学习教育，云南政协报社发力于新媒体，推动形成线上线下同频共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演讲比赛”选手风采展示。各个新媒体平台同步刊发展示全省各级政协党史学习的开展情况、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激发学习热情。

三、经验启示

（一）创新形式内容

融媒体时代，内容为王已成为媒体共识。优质的新媒体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吸引读者，也能为媒体平台创造品牌价值，提升品牌形象，增加用户粘度。内容创新是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一环。以创新为核心的战略计划将持续推动媒体内容创新、广告创意、人才培养工作。

以云南政协报新媒体平台通过开设《红色记忆·地名故事》助力党史学习教育的做法为例，很好地运用了新媒体互联网技术的特点，根据不同平台用户画像，制作差异化、分众化、定制化的新媒体产品，采用现场讲述的沉浸式传播，视角上坚持全景构架，让受众在观看时有强烈的包围感、在场感，受众可以体验高度真实的情景重现，沉浸传播激发了受众参与意愿，提升传播效果的同时，也促进了受众学习党史的热情。此外，还要丰富媒体产品内容形式，提升立体感，将真实、即时而独特的新媒体产品呈现给观众受众。这样才能通过打造质量优、价值高、创意新的优质主流媒体产品舆论高地，抢占主流舆论阵地。

《红色记忆·地名故事》栏目这种现场讲述的“沉浸式传播”使党史学习的真实感和参与感明显提升，学习者可以更深入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的百年奋斗史，坚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中国的意义。

（二）提升内容品质

当前互联网环境复杂多变，市场中各类媒体产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保证新闻产品质量，做好相应监督管理工作，成为机关媒体新闻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

要确保新闻产品质量，拒绝传播虚假消息，以高标准、严要求为准则，做好基本的行业自律，保证新闻内容的准确性、真实性、积极性、健康性，做到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同时，还要充分保

持自律，自觉抵制低俗内容、错误内容，主动参与营造健康、积极的网络舆论环境。

（三）精心策划报道

要想在新媒体竞争中取胜，要想让新媒体报道创新出彩，就必须精心策划。云南政协报社精心策划的《红色记忆·地名故事》，以“红色记忆·地名故事”以“+”模式充分整合资源，讲好发生在云南的红色故事，既丰富了百年党史宣传报道的内容，还创新党史学习教育的形式、角度和种类，深入发掘了红色文化中的独特新闻点，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四）打造品牌效应

用户粘性、粉丝品牌忠诚度以及新闻媒体产品传播度等，归根到底都与新闻媒体平台的品牌力度打造有着密切关系。以云南政协报社新媒体平台为例，通过高质量媒体产品吸引广大读者兴趣仅是第一步，坚持坚定政治方向，正确引领舆论导向，在媒体融合发展中巩固扩展主流舆论阵地，通过加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质量和效率，持续打造平台影响力，增加粉丝粘性，扩大平台影响力，成功将云南政协报社新媒体平台打造成独具政协特色、具有强大品牌号召力的机关媒体平台。

四、结 论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不仅有丰富的素材，还蕴含着党的初心使命和丰富的革命精神文化财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加强党性锤炼，砥砺政治品格的一百年，新时代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活动，学习把握党史的精神内涵，践履知行合一，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提升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以“力行而后知之真”，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勇于担当的强大动力和智慧经验。如此才能切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向深入、形成常态。在学习中要既注重充实学习内容，又重视科学合理地运用新的学习方式，这样才能在新时代党史学习教育中更好收获实效。

云南政协报社弘扬主旋律、紧抓社会热点，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紧扣党史学习教育要求，分析社会热点现象，让党史学习教育更接地气、更生动。特别是新媒体助力党史学习教育的经验与启示证明了，以广阔的历史视野、国际视野，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深入提炼和挖掘红色故事的思想内涵，以精神品位升华故事的内容，以理论高度深化故事的主题，以时代站位凸显故事的价值，创新讲述方式方法，方能让历史故事绽放新时代的光芒。

责任编辑：罗 雷

少数民族的优秀干部——张冲

李志洪

(中共泸西县委党校、泸西县社会主义学校, 云南 泸西 652499)

摘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彝族人民的好儿子张冲同志, 一生反抗压迫, 投身革命, 建设祖国, 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讲好张冲故事, 学习张冲同志爱国爱民、自我革新、为民服务、善作善为、实事求是、无私奉献的精神特质, 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凝心聚力, 砥砺奋进, 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关键词: 少数民族; 优秀干部; 张冲

中图分类号: K82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1-0087-07

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样一则讣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彝族人民的好儿子张冲同志因病长期医治无效,于1980年10月3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①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张冲同志仍然受到人们的敬仰。重温张冲同志的伟大功绩和崇高精神,对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凝聚共识,砥砺奋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张冲的革命生涯

在纪念张冲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说:“张冲同志生活俭朴,严于律己,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积极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心云南工作,关心社会进步与发展,关心人民的富裕幸福。”^②可以说,张冲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了一切的一生。

(一) 爱国爱民,反抗压迫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中国危机四起、人民苦难深重,陷入半殖民地半

作者简介: 李志洪,中共泸西县委党校、泸西县社会主义学校教师,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

^① 《胡耀邦参加张冲追悼会》,《人民日报》1980年11月22日,第1版。

^② 《纪念张冲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001年2月27日, <http://www.cppcc.gov.cn/2011/09/24/AR-TI1316857436093121.shtml>, 2021年11月20日。

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① 1885年,法国用武力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一时间,云南大地上战火频仍、民不聊生。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张冲于1901年出生在距泸西县和弥勒县县城约50公里的小布坎村。

“张冲原名绍禹,又名维新,字云鹏。……按尧、舜、禹的顺序起名的,张冲在家中排行老三,故名绍禹,四弟绍汤。”^②“禹”是中国古代与尧、舜齐名的圣贤君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在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张冲家虽身处穷乡僻壤,但也称得上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其父张冀廷参加过反抗法国侵略者的战争,因功受奖,被清廷授予“从六品”官职。张冲父亲为官清廉,深得当地群众好评。张冲从小机敏过人,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光宗耀祖,因此督促他认真学习,尤其是要他熟读四书五经,以便将来能够金榜题名,光耀门庭。不过张冲不喜欢四书五经,反倒十分喜爱《水浒传》《三国演义》《七侠五义》和《孙子兵法》等书籍。张冲也曾在私塾和永宁小学、泸西小学等处就读,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受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影响。在读书和劳动之余,张冲还热衷于习武,他把沙袋绑在腿上练习跑步,登房屋,爬大山,练刀功,学射击,练梅花桩等,不但锻炼了身体,还磨练了意志品质。张冲的别名“维新”,早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意思是反对旧的,提倡新的,通常指变旧法,行新政,最早出自《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句。张冲出生的时候,旨在变法图强却不幸失败的“百日维新”运动刚过去没几年,这个名字既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救亡图存主题,也体现了他本人胸怀家国天下的远大志向。

1840年后,尽管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一系列运动,但旧中国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的病痍长期无法消除。在张冲生活的云南弥勒、泸西等地,民族压迫、阶级压迫深重,土匪横行,民不聊生。

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时局,以及年幼遭遇的家庭变故,使张冲从小形成了“大丈夫要铲除人间不平,要使人人有衣穿,个个有饭吃,才不枉活世上一场”^③的人生理想。

1917年,张冲的父亲去世。1918年,因泸西一些土豪劣绅联名上告张冲通匪,省政府发下公文,要将其“速即逮捕归案”。得知消息后,年仅17岁的张冲开始逃亡,途中因不满团防欺压百姓,杀人夺枪,揭竿而起,为反抗剥削和压迫走上了绿林道路。

为实现“人人有衣穿,个个有饭吃”的人生理想,张冲想效仿《水浒》中的林冲,把名字由绍禹改为冲,有“逼上梁山,替天行道”的意思。他与兄弟们约法三章:“一是我们的队伍不要惯匪、兵痞和地痞;二是我们的队伍永不扰民;三是我们立志为民除暴,干一番事业。”他还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保护农工商,救济贫苦穷”的口号。^④张冲走上了绿林道路,是他实现“人人有衣穿,个个有饭吃”人生理想的最初实践。当时有民间歌谣赞曰:“太阳出来红彤彤,泸西出了个张云鹏,救济穷苦人,打到富家翁,官差不敢来哟!鸡犬免遭殃。”^⑤

大革命时期,张冲反对北洋军阀,支持“二六”政变,推翻了唐继尧的军阀统治,鼓舞了云南人民的革命热情,为云南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六·一四”政变,张冲坚持正义,追随龙云,立功受奖,被委任为滇军第5师师长,时年27岁,成为滇军中的实权人物。

①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9页。

② 谢本书:《张冲传》,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11页。

③ 谢本书:《张冲传》,第13页。

④ 谢本书:《张冲传》,第23页。

⑤ 谢本书:《张冲传》,第25页。

1931年后，张冲以旅长军衔兼任云南盐运使，对盐政进行改革。1932年，他变卖家产，实施“移卤就煤”工程，创建一平浪盐矿，解决了云南盐业危机，为民造福。移卤就煤的成功，是盐业史上的创举，使云南得以度过盐业危机，这对云南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和对抗日战争的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①值得一提的是，一平浪盐矿至今仍为云南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盐矿有职工3000余人，年产盐18万吨，2002年7月，成为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重要盐产品生产单位之一，2003年6月，随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并入云天化集团，2004年，产盐23.39万吨。

（二）红心向党，投身革命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1926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建立，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把地处边疆、民族众多的云南带进了一个崭新的伟大时代。随着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云南的深入开展，张冲在思想上发生了深刻转变，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政党，同时看穿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于是便毅然决然地追求真理、修正错误，主动寻求党的领导。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1930年3月，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1930年5月，由于叛徒告密，中共云南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机关工作人员刘宗汉、陈友贵、董树勋、周子安、张永和、张春旭等先后被捕。不久，王德三、张经辰、李国柱、吴澄等共产党员也相继被捕，并于1930年12月31日被国民党杀害于昆明。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张冲成功营救云南省委机关领导张永和。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5年和1936年，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先后经过云南。艰苦卓绝的长征，途经11个省，但过云南是相对顺利的，毛泽东“金沙水拍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诗句也可以佐证这一点。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无疑是毛泽东用兵如神，四渡赤水调离滇军孙渡部队；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张冲对红军实行追而不打的建议得到了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的采纳，“率领近卫第一、第二两团的兵力，尾随在红军之后，保持一定的距离，追而不打，或按兵不动，做做样子。红军主力渡金沙江用了七天七夜，张冲也按兵不动七天七夜，红军得以安全渡江”。^②张冲的这一建议，为红军顺利通过云南创造了条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华北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37年10月12日，滇军60军誓师出征，抗日救国。张冲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请缨抗战，奔赴前线。在台儿庄战役中的禹王山阻击战中，张冲指挥若定，英勇无畏，身先士卒，固守阵地20天，伤亡过半仍岿然不动，打出了滇军的威望，为台儿庄战役的全面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禹王山阻击战让时年37岁的张冲一战成名，获得“抗日名将”的称号，并升任60军军长。

1938年1月，滇军在崇阳战役中失利，由于小人告密其“通共”，张冲被撤职留任，调回云南。张冲回到云南，遂投身于弥勒、泸西的水利建设事业中。1940年初，云南省政府第713次会议决定设弥泸水利监督署，并委派张冲为监督署监督，直接对省政府负责。1940年3月，弥泸水利监督署于弥勒县城正式成立。1943年，第一期工程竣工。为纪念张冲将军主持水利的功绩，立石碑于茨棚哨，上刻碑文“泽流万古”。另有民谣赞之：“历代著名干南乡，连年干旱地放荒，甸

^① 谢本书：《张冲传》，第113页。

^② 谢本书：《张冲传》，第117页。

溪河水灌不上，广种薄收缺口粮。一年吃穿无处着，高利贷款来养活，一期工程完成后，南乡坝已初改观。”^①如今太平水库已成为旅游风景区，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令人流连忘返。

1945年，在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之时，国民党便背信弃义，向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各解放区发动进攻。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解放战争全面爆发。1945年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师生，投掷手榴弹，炸死师生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史称“一二·一”惨案。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隔4天，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白色恐怖笼罩昆明。

1946年10月，为笼络人心，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而此时的张冲，经过移卤就煤、抗日救国、兴修水利等一系列事件，已是云南威望极高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因而蒋介石不得不把云南“土著”的代表名额分配给他。借参加“国民大会”的时机，张冲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奔赴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等中共领导的亲切接见。据张冲夫人惠国芳回忆，大约到延安的第三天，毛泽东和江青就邀请夫妇俩到他们家里做客，之后朱德和康克清也设宴款待了他们。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使张冲深受感动，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947年月1日，张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张冲被派往东北前线，先后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高级参议、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他利用自己在滇军的极高威望，以滇军老前辈、老上级的关系，多次写信给60军军长曾泽生和暂编21师师长陇耀，宣传党的政策。1948年9月17日，曾泽生率领60军在长春起义，这是解放战争中国国民党军队第一次整军起义，对于瓦解敌军进而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党中央对张冲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主席在北平接见张冲时说：“你们对滇军的工作做得不错啊！”张冲回答说：“都是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红旗插到头上来了。”毛泽东说：“红旗插到头上，还要愿意扛才行，有的人要他扛，他还不愿扛嘛！”^②在从延安到松江时，途径解放区，看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伟大壮举，张冲感慨万千，心想“为什么我从前就没有想到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根据地呢？”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

（二）建设祖国，奋斗不息

新中国成立后，张冲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后又先后当选为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长期担任云南省副省长等职。在新政协筹备工作会议上，张冲同志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大团结的高度，就《共同纲领》提出“只提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不提反对大汉族主义是不全面的”的建议，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党中央的采纳，最终正式写进了《共同纲领》。他还结合云南实际在会上作了《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重要发言，并对《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草案）》积极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政务院广泛征求各大行政区和有关各省意见的基础上，1952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了这个实施纲要，由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实施。

在担任凉山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期间，张冲同志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充分了解民情，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积极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使凉山得以全部解放，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为党的民族工作、统战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乌兰夫在为张冲所写的悼词中提到：“解放初期，张冲同志深入边疆和大小凉山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

^① 谢本书：《张冲传》，第159页。

^② 谢本书：《张冲传》，第199页。

的民族政策，调解民族纠纷，疏通民族关系，团结教育少数民族爱国上层人士和国民党起义人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促进当时全省安定和民族团结，胜利完成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①

1956年底，三大改造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了规定的任务；1964年6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飞行实验成功；1967年6月18日，氢弹爆炸成功；1968年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些成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更加坚定了张冲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1956年后，张冲同志把主要精力倾注于考察和研究长江上游的水利建设，九次穿越险峻的虎跳峡，对开发金沙江水利做了大量的工作：考察马湖，总结出“马湖”天然坝型自然规律；领导了“水中倒土”和“定向爆破”堆坝的实验；新建了曲靖花山水库、祥云普淜水库、元谋东山水库、宾川岔河引水、引洱入宾等水利工程；考察了全省的水利事业。其间四次入弥泸，九次穿越虎跳峡；提出治理金沙江的设想，组织撰写《金沙江考察报告》，完成《加强定向大爆破筑坝科研工作的建议》《张冲对金沙江的设想》两个文件；第一个提出“南水北调”上游方案。“上游方案就是张冲提出来的，即提高金沙江水位，从青海将水北调。”^②张冲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每次到北京参加人大代表会，他都要就水利建设问题，尤其是开发金沙江、南水北调以及定向爆破筑坝等问题发表意见及提出问题。1975年1月13日，他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掌握自然规律，实现“高峡出平湖”——创造崭新坝，做深谷江河的主人》的专题发言。1978年1月下旬，已77岁高龄的他又在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大会上做专题发言。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张冲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张冲虽然年事已高，仍然壮心不已，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促进台湾回归祖国，满怀信心，积极工作。1978年7月，张冲在最后一次考察金沙江的途中，病倒在渡口市，住进了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张冲仍不忘水利建设事业，他说：“呼吸不停止，思考不停止。”“有了模型，有了数字，国家领导同志才好下决心，我还有3000元存款，可拿来做模型，做实验费。”“前进才有生路，前进才有光明，前进才会胜利！”^③这是张冲将军无私奉献、鞠躬尽瘁、奋斗不息的真情流露。1980年10月30日，张冲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79岁。遵照他的遗言，骨灰被撒到金沙江虎跳峡处。可以说，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一生反抗压迫，追求真理，最终把光明留在了人间。

张冲同志是彝族人民和云南人民的骄傲，他的崇高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合体，是共产党人优良品质和作风的集中体现。

二、学习张冲精神，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张冲同志是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伟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优秀干部的代表。新时代，新征程，新挑战，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学习张冲同志的崇高精神，这种精神必将激励我们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① 谢本书：《张冲传》，第372页。

^② 谢本书：《张冲传》，第277页。

^③ 谢本书：《张冲传》，第333页。

国梦不懈奋斗。

（一）学习他爱国爱民，追求真理的伟大情怀

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人民是最有力量的情感。从热爱人民到热爱中国共产党，从热爱祖国到热爱社会主义，是张冲所走的道路。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成长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理想及政治纲领逐渐对其产生影响的过程，也是其个人理想付诸实践的过程。张冲从小立下“人人有衣穿，个个有饭吃”的人生理想，为了实践这个理想，他揭竿而起，反抗压迫，打击侵略，抗日救国。当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先进政党时，便积极主动寻求党的领导，从反动的营垒中冲杀出来，毅然奔赴延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他把个人理想与党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投身革命，建设祖国，奋斗不息。他曾说：“去北平参加政协筹备工作，心中十分高兴。我‘深信只有党的成功，才能达到真正的民族平等’。”^①

（二）学习他自我革新，自我革命的优秀品质

勇于自我革新，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张冲的一生是爱国爱民的一生，是追求光明的一生，是自我革命的一生，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一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张冲将军从农家子弟到揭竿而起反抗剥削，从绿林好汉到接受改编，从反对军阀到三次寻找红军，从投身抗战到奔赴延安，从参加革命到建设祖国……每一次历史转折时期，张冲将军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我革命，自我革新，一心为民，奋斗不息。

（三）学习他高举旗帜，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

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显著标识。1946年10月，中央领导在延安的亲切接见和教诲，使张冲深受感动，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为人民解放事业多作贡献。1948年，他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威望，宣传党的政策，成功策动60军在长春起义；1953年，他深入边疆和大小凉山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调解民族纠纷，疏通民族关系，团结教育少数民族爱国上层人士和国民党起义人员，要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少数民族地区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以后，他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金沙江的水利水电开发提出了积极建议。他曾经对身边的年轻干部说：“要牢记今天，加倍努力，做好民族工作，以实际行动报答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②

（四）学习他以诚相待，广交朋友的优良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③ 广交友是张冲的突出特点，他与族人交朋友，与乡绅交朋友，与少数民族头人交朋友，与民主人士交朋友，与教授、学者交朋友，云南省主席龙云、少数民族头人李和才，民主人士楚图南、李公朴、闻一多、张奚若，大学教授熊庆来、冯素陶、费孝通、冯景兰，画家徐悲鸿等都是他的挚友。张冲同志靠广交深交朋友，为党和人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张冲靠与同族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友谊，成功营救被捕的中共云南省机关领导张永和；解放战争时期，张冲靠与老部下曾泽生的私交，成功策动60军起义；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与

① 谢本书：《张冲传》，第282页。

② 李桂英：《张冲同志二三事》，《中国民族》2001年第7期，第27页。

③ 习近平：《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63页。

部落首领沙马耶戛交朋友，为开辟党在凉山南部地区的工作，肃清国民党残匪，最后解放凉山，并顺利完成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与部落首领沙马耶戛交朋友时，张冲以彝家传统的方式和沙马耶戛举行了钻牛皮、喝鸡血酒的仪式，并亲手把一件察尔瓦（即大披毡，凉山彝族喜欢穿着的服饰）作为见面礼披到了沙马耶戛的身上。沙马耶戛激动得热泪盈眶，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一定听张冲副省长的安排，欢迎解放军，欢迎工作队到西古溪开展工作，并愿意配合解放军和工作队，肃清逃窜到凉山的国民党残匪。^①

（五）学习他实事求是，深入调研的工作作风

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实事求是，深入调研正是张冲同志一贯的作风。无论是干革命还是搞建设，不管是在旧军阀中还是在党的领导下，张冲总是实事求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建言献策。在出任云南盐运使期间，通过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张冲草拟了《移卤就煤》方案并于1933年2月21日呈报省政府第331次会议讨论通过。1939年，他招收技术工人勘察弥勒水利，形成报告，于1940年呈报云南省政府第713次会议通过。1956年后，他专注于考察和研究长江上游的水利建设，九次穿越险峻的虎跳峡，对开发金沙江水利积极提出意见建议。

（六）学习他无私奉献，奋斗不息的精神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行动，为中国精神注入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特殊基因，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人民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奉献精神。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张冲将军始终秉持着无私奉献、舍生忘死的共产党员精神，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责任编辑：朱家麟

^① 李桂英：《张冲同志二三事》，《中国民族》2001年第7期，第27页。

发展问题研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探析

王 旭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 要: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理论创新和伟大实践,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中国化成果,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先导和发展总纲,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通过探究形成动因,廓清逻辑架构,把握实践路径,对于深刻认识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推动构建绿水青山的生态发展格局,传播中国生态文明智慧,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动因;逻辑架构;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D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1-0094-08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着手,通过反思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同文明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应对方式,从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三重层面创造性地回答了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向生态社会转型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尤其是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实现二〇三五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远景目标、完成“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刻不容缓。深入挖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因由,廓清逻辑架构,把握实践路径,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构建新时代生态发展格局,传播生态经验与智慧,是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根本价值所在。

一、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因由

恪守以问题为导向的思维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聚焦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生态困境所作出的科学性回答。

(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国内背景

1. 解决中国生态问题的迫切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早期探索阶段(1949—1977年)、确立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初始阶段(1978—1991年)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发展阶段(1992—2001年),从提出科学发展观战略的成熟阶段(2002—2011年)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新诠释的升华阶段(2012年至今)。在党、国家和人民为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的征程中,我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乐享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成果,却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并呈现稳中向好趋势。以国际性环境问题酸雨为例,2012年我国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2.2%^①,2020年

作者简介:王旭,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基础理论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3年6月6日, <http://www.cnemc.cn/jcbg/zghjzkgb/201306/P020181010526740799816.pdf>, 2022年2月6日。

我国酸雨区面积约46.6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4.8%^①,下降幅度为60.7%,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也由2012年的2117.6万吨^②减少至2019年的457.3万吨^③,大气污染治理成效显著。“十三五”期间我国生态环境9项约束性指标全部超额完成,生态治理现代化水平取得重大发展。但雾霾呈季节性、整体性频发特点,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严峻,水资源缺乏、土地荒漠化等导致湿地面积急剧锐减、生物多样性减少,矿产资源等战略性资源严重短缺,环境恶化导致的极端性气候灾害频发等环境问题仍困扰着我国新时期的发展。多重环境问题使我国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期、攻坚期和窗口期,三期叠加意味着我国正在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④的拐点,生态治理效果并不稳定,一旦松懈就会出现反复。因此如何彻底告别不可持续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破除传统发展范式、形成新型发展范式是时代之问,需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做出回答。

2. 满足人民群众生态美好需求的宗旨旨归。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发生根本性变化,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提出了新的需求,“盼环保”替代“盼温饱”成为其追求美好生活的高层次需求。但我国当前生态环境发展现状与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态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亟需中国共产党立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认清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开展行之有效的对策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的高层次需要得到满足。这一生态实践需要科学的方法论作指导,需要正确的理论引方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是对人民群众希望拥有优美健康绿色生产生活环境的积极回应。

(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国际背景

1. 破除全球生态危机的使命担当。人类通过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但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⑤。尤其是工业文明时代,资本主义造就了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样惊人。资本主义无偿占有、使用自然这一生产要素,对自然环境大肆破坏,造成了臭氧层漏洞、森林锐减、垃圾污染、物种灭绝等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远远超过了自然界实现自我修复的底线,使得“世界已经处于危险的顶点,处于灾难的边缘”^⑥。显然,工业文明与生态危机之间具有对抗的同步性,这决定了人类在工业文明范式内无法寻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路径。中国则坚决拒绝依靠掠夺资源、转移污染等手段发展工业文明。21世纪必将以良性竞争为主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立足于反思和超越现有工业发展模式,承载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指引着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确定了终极发展目标。

2. 挫败中国环境威胁论的政治需要。自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制约、偏见始终存在。随着我国持续深化改革,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所创造的发展奇迹使资本主义刻意制造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而生态文明建设又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指导下进行,必然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这一特性使全球生态问题首当其冲地成为了资本主义宣扬“中国威胁论”的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2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21年5月27日,http://www.cnemc.cn/jcbg/zghjzkgb/202105/W020210527493805924492.pdf,2022年2月7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2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21年5月27日,http://www.cnemc.cn/jcbg/zghjzkgb/202105/W020210527493805924492.pdf,2022年2月7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19年中国生态环境统计年报》2021年8月27日,https://www.mee.gov.cn/hjzl/sthjzk/sthjtnb/202108/W020210827611248993188.pdf,2022年2月7日。

④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由哈佛大学终身教授Theodore Panayotou于1993年提出,该曲线揭示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环境污染程度先因经济发展而加剧,但当经济发展到达一定水平接近某个临界点或“拐点”(如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等)后,环境污染物排放量达到顶峰,随后环境污染程度伴随经济发展由高趋低,环境质量由此逐步改善。

⑤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1页。

⑥ 聂长久:《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年第2期,第95—99页。

借口,“中国环境威胁论”由此产生。“中国环境威胁论”认为,中国人均GDP每增加1美元的背后都是对自然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必然会对世界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的污染和破坏。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的环保责任的重压,为了规避在环境问题上的“修昔底德陷阱”,从源头上根除“中国环境威胁论”,主动向全球展示中国的环保成果,分享中国的环保经验,改善国际形象,维护生态公平与正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化政治担当和国际责任,向生态问题宣战,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二、建设怎样的生态文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架构

从在陕北梁家河为解决树木砍伐问题建成第一口沼气池到河北正定制订发展规划严禁污染搬家、下乡,从福建要求合理使用水资源到浙江推广余村模式,从“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到“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两山论”再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习近平同志四十多年来一直在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持久思考和深刻论述,其对于如何搞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逐渐向构建理想体系的纵深推进。

(一) 生态文明新理念

1.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习近平总书记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自然史”与“人类史”相统一的思想基础上,依据自然、生态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演进规律,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①思想。这一思想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厘清并明确了生态文明的历史内质,并根据现时代的发展需求对生态环境所蕴含的历史性价值进行了目标定位,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观的生态史学思想。这一思想也是当前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清醒认识生态文明发展趋势进而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简称“两山论”,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唯物辩证法对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也是对传统的生产力概念的创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经济学思想。我国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保护资源开发,在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推动自然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物质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协同发展、相得益彰,放弃赚快钱法、大开发的老路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从‘环境换取增长’转变为‘环境优化增长’,推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两难’向‘双赢’转变”^②是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首要任务与目标。

3. 山水林田湖草冰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系统自然观为思想研究基础和思维方法,“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及山下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流域上下游”^③,发现并揭示了人、水、山、田、树、土之间的生化循环,从而科学阐明了无机物与有机物、人与自然只有借助物质变化才能构成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一生态本体论思想成为其生态文明观的立论根基。因此建设山水林田湖草冰沙生命共同体,采取系统治理和生态修复等综合措施,使资源得以逐步休养生息,不断改善生态状况是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基本准则和重要实践途径。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确立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此为原则提出了“环境就是民生、蓝色也是幸福”的重要论述。这一论述既确立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导向,也将生态正义融入其生态文明观,奠定了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基调,即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指向是广大人民群众,确保他们的生态权益符合他们的利益诉求,也是构建生态型政府的基本要求和最终目的。

(二) 优化自然条件新思维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需要多种途径、多种方式来实现的系统性工程,而占据基础性地位的是

① 习近平:《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建设 打造绿色浙江》,《求是》2003年第13期,第42—44页。

②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3页。

③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第156页。

推动实现自然物质条件的持续性。为夯实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基础工程，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中，应坚持以下六个建设思路。

1. 实施人口绿色发展计划。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之一是如何实现人口的可持续、绿色发展。如何实现个体财富水平及幸福指数与全社会整体财富水平及幸福指数的同步提升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需要通过必要的条件实现的。因此，必须以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为主旨，大力实施人口绿色发展计划。

2. 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而言，人类追求发展的需求与自然资源的有限供给是贯穿其始终的矛盾，是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实现的关键性问题，必须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在实现节约、集约利用生态资源中达到和谐。

3. 加快推动能源领域的革命。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能源占据战略性、全局性地位，只有建设能源低碳型社会，通过大力发展绿色清洁能源，全方位推动能源领域的改革，才能有效解决能源问题，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

4. 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环境作为人类废弃物接收场所的用途始终存在，在这一过程中损害群众生态权益的生态问题必然会产生。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依靠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实现，因此必须重点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加强对水、土壤、大气等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态资源的污染防治工作，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5. 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提升生态服务性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标，只有实施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战略方针，大力推进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工程，才能确保山、水、林、田、湖、草的有序可持续发展。

6. 全面提高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国众多的山、水等自然资源既为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优厚的先天性条件，但也增加了其遭受自然灾害的危险。因此必须着力建设灾害防减型社会，“高度重视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生态环境阈值”^①，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建设的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全面提升全域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三）优化国土空间新布局

依靠优化国土空间实施立体化生态建设方略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只有坚持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才能实现全方位的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工作。

1. 优化国土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空间载体的功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是国土的三个功能分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依次对应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目标要求。因此必须坚持国土建设多规合一原则，重视空间规划管理工作。

2. 加强生态城市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有一定的空间依据，人类生产、生活的大型必要场所即城市就成为重要的空间节点，而能够实现人与经济活动、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并存的生态城市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未来实现目标。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大力推进的现时代，按照海绵城市等生态城市建设范式确保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势在必行。

3. 深入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农村是我国文明的发源地，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在巩固提升清洁乡村和生态乡村建设成果的同时重点持续推进宜居乡村、幸福乡村建设，奋力打造“美丽乡村”建设升级版，才能让群众真正有获得感幸福感。

4. 推动区域绿色协调发展。促进人口、资源、经济、环境协调推进是实现区域协调的必然要求，必须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开展区域内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水生态共治等重点工作。

（四）国内生态治理新设计

强化国内生态治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目标指向，是确保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实现的重要保障。首先要坚守生态文明建设的底线和红线，以保障国内生态治理的有序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

^① 张云飞：《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和经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86页。

强调“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①，为坚守生态底线，必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如森林红线、湿地红线等，构筑完善生态治理的底线标准。其次，强化国内治理必须有完善健全的体制机制。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覆盖面广泛，涉及领域多，必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的顶层设计及制度体系建设”^②，使系统、科学的体制机制成为推进国内生态治理的有力支撑，奠定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坚实基础。最后，严格的监督检查是生态治理的重要保障。生态治理的最终成效由人民群众来检验，但也需要严格的监督检查来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取得实效、体制机制发挥作用。“建立并实施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制度”是习近平生态思想的实践要求，也是及时发现、解决生态问题的有效举措。

（五）全球生态治理新方案

中国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治国理政层面、写入执政党行动纲领的国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价值在于对全球人类的生态关切，坚守“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③的探索与创新。

1. 呼吁共建清洁美丽新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生态环境问题的重大挑战，中国将同世界各国加强交流与合作，推动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携手共建美好家园。^④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总部演讲时强调，要“共建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实现世界各国共建生态文明发展之路为国际底蕴，体现了共谋国际生态治理的美好愿景，彰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与中国智慧。

2. 通过南南合作增强发展中国家应对生态治理的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生态危机缺乏资金、技术等条件，我国倡导在国家层面建立协调机制，采取全局谋划、重点推动、整体落实的策略，通过知识分享、人力资源建设、财政支持等具体政策措施，尽最大努力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保护和发展两大难题提供帮助。

3. 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通过“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机制，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面对全球性生态挑战，携手改善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应有贡献。^⑥“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也是深化生态环境合作的绿色丝绸之路。我国借助“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带去绿色发展观念、生态发展技术、生态合作项目等，以实际行动为相关国家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三、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践行路径

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生态发展现状和未来的分析、判断，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妥善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冲突，探索绿色发展的可行性路径是应对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压力大、生态修复工作任务重的必由之路。

（一）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地位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⑦。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决定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有序有效地进行。这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根本原则。

① 《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强调：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 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6月19日，第1版。

②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第4—19页。

③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第4—19页。

④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12页。

⑤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5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38页。

⑦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27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2022年2月10日。

首先,明确党委在建立环境治理体系中的领导作用。综合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实施主体,人民群众及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是推进生态治理的主体支撑。但市场经济在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调节作用的软弱性导致参与生态治理的主体存在失灵(失效)的风险,需要各级党组织发挥部署领导作用,自觉担当政治、企业、公众、社会四方在生态治理中共建共治的发起人、召集者和监督方。因此,只有坚持发动社会多方参与生态建设与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相结合,才能形成在生态治理行为主体上广泛集聚社会力量、在领导主体上齐抓共管的局面。

其次,明确党委在完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机制中的领导作用。当前推进大部制改革是解决生态环境治理“九龙治水”的必要举措,但改革进程中必然涉及机构职能优化、复杂利益格局调整等问题,必须依靠党委在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层面的强有力责任担当。同时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政府通过大部制改革规避“大政府”倾向,成为“好政府”“强政府”,担负起绿色政府的使命职责,从而使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得到有效的行政保障。

最后,明确党委在深化生态治理领域“多规合一”建设中的领导作用。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涵盖人口、环境、防灾减灾、生态安全、能源、资源等多方面具体规划,需要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强化各专项规划的约束指导,需要从各领域交互发展的角度推进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与生态文明领域相关规划的有机统一,需要从顶层设计层面实现国家总体规划与生态文明领域规划的有效衔接,这意味着“多规合一”需要解决多个不同部门的协同、整合等问题,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实现党在“多规合一”中的核心关键作用。

(二)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坚实生态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①。因此首先,要充分发挥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规范、约束作用,构建全面科学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如完善各类环境污染防治制度,加快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健全生态环境资源管理制度、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等各类规范性制度,创新生态红线制度,改进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全民参与激励机制、生态经济激励机制等。与此同时,要注重完善督查机制。如前所述,环保督查是我国为了进一步确保环境整治成效而开展的环保检查、巡视机制,为有效解决我国区域性环境问题开辟了新路径。尤其是环保督查组的成立、“绿盾”行动的开展和《环境保护督查方案》的制定,使我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环境保护力度。云南洱海的水质污染问题、湖南湘潭码头污水直排污染湘江问题、甘肃祁连山生态保护区生态破坏问题、山西临汾市空气监测数据造假等大量生态问题被发现整改,彰显了中共中央在生态问题上的零容忍。“十四五”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的关键时期,仍需紧紧依靠环保巡视督查机制,使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其次,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要求。注重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全局性,在着力推进顶层设计的同时,改革涉及生态环境治理的各类基础性制度,明确跨区域生态治理的重要性并完善相关机构设置。最后,加快落实科学的生态文明考评机制。西方国家现代化建设历程已表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只能是破坏性发展,生态修复的投入远大于破坏性发展带来的收益。因此必须彻底破除以GDP论一切的落后发展观念,“使经济回嵌社会,缓解环境和社会‘双透支’遗留的种种矛盾”^②,建立以生态效益为主导,涵盖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等衡量生态文明建设效果的生态指标,强调以绿色发展指标为核心的考核评价机制,并使之成为着力提升生态文明建设能力与水平的风向标、指挥棒。

^① 习近平:《关于做好生态文明建设的批示》,2018年3月5日,<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8/0305/c385476-29847865.html>,2022年2月10日。

^② 温铁军等:《居安思危: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316页。

（三）完善生态法治建设，筑牢生态建设的法治根基

通过最严密的生态法治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法治观，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重要前提。从生态实践来看，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涉及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还触及政治、社会等多个方面，与企业、政府、人民群众等利益主体相关联。为确保生态文明建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序平稳推进，就必须健全生态法治建设，以最严的生态法治观抓住生态文明的“牛鼻子”。因此，一方面，要继续完善生态法治体系。从1989年颁布《环境保护法》到2013年进行首次重大修改，更加突出政府的监督管理责任、突出公众参与监督、加强工业环保约束等，我国形成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同时，围绕《环境保护法》这一基本法律，国家和地方又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确保能够切实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类生态建设问题，也使各项环保措施在实践过程中能够落实到位，依靠法治科学协调和正确处理生态、经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法规授予社会大众平等的环境基本权，保障其平等地享有生态福利、享受生态产品，以此确立社会大众对法律的信仰与坚守，促使社会大众依靠环境法律法规去解决生态问题与矛盾。除此之外，还要强化党政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分析、解决生态文明领域中新出现的或原有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的能力，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导向真正落到实处。

（四）重点发展生态经济，巩固生态文明物质基础

简单地就环境来解决环境问题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要义，而是要确立“跳出环境看环境”的思维逻辑，使绿色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经济、文化、社会等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在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引领系统性变革。建设好“美丽中国”，确保生态名片不褪色，就“必须有清晰的生态定位”^①，深刻认识到“舍弃一些经济效益，会暂时影响部分人的物质丰足程度，但是如果舍弃生态效益，则会损害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的生存基础”^②，应坚持在淘汰落后产能、过剩产能上做减法，在改革创新、激发新动能上做加法，促进发展方式实现质的转变，将优化调整工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生态化的产业系统”^③作为第一发展要务。首先，在生态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立足其发展基础和产业基础，以发展科技为主导，培育新型特色产业集群，如电子信息、通讯中断、生物和新医药、食品加工等产业，并在放贷、税率等方面进行调整，鼓励产业发展。其次，在我国生态经济发展领域中居于发达地位的地区，应深度优化产业结构，着力发展绿色材料、绿色能源、节能环保、新动力汽车等绿色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强化保持生态经济优先，持续稳固生态经济领域优势，巩固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积累与基础。最后，要加大第三产业比重，构建完善现代服务体系。尤其要优先发展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拓展商贸服务、旅游服务、社区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培育普及文化创意、服务外包等新兴服务业。

（五）改革社会观念，厚植绿色生态发展理念

社会公众既是生态环境的制造者、使用者，同时也是生态环境的毁坏者、迫害者。尤其我国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社会大众所需要的生产生活物质资料及所产生的废弃物也是数量庞大的。只有在人民大众中厚植生态文明意识，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动准则和行为依据，才能从思想上、实践上获得全社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持，凝聚起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全民参与的关键所在。因此一方面要在全社会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加强绿色文化的推广普及。政府等相关部门要创新利用电视公益广告、网络新媒体等各种渠道和途径，用简明有趣、喜闻乐见、富有教育启发意义、能够引起社会大众共鸣的内容引导人民群众自觉养成绿色生活的生产生活习惯，约束规范

① 刘小勤：《生态安全视阈的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年，第145页。

② 刘湘荣等著：《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

③ 张云飞：《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92页。

自身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形成生态文明教育的常态化机制，建立一整套科学完善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育体系，为生态文明教育实现常态化提供支撑，为实现社会观念的变革提供依据，进而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环境、爱护自然为荣，污染环境、破坏自然可耻的氛围，使生态文明教育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让生态文化在全社会扎根”的目标，也为构建一主多元的环境治理体系奠定观念基础。同时，改革社会观念还要建立、畅通、拓展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环境问题治理的渠道与路径，例如与环境问题相关的座谈会、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听证会等，并逐步完善参与机制，使公众真正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当中。只有不断提升公众参与的质量，才能缩短其从自觉到自为参与环境建设的过程，主动担当起应尽的环境责任，使社会生态文化氛围更加浓厚，最终构建起长久维护建设成果、防止生态问题复发的思想基础和理念。

（六）深化国际生态合作，共建美丽新世界

任何国家都不能在全球环境问题中独善其身，必须携手共同应对生态危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也强调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①。因此应加快国际合作，通过实际行动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共享观、生态开放观。首先应主导建立常态化的以加强绿色生态发展为主题的国家交流、合作机制。中国要积极发挥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作用，既要积极引入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先进绿色技术，增强本国绿色生态发展的水平与能力，也要主动同世界其他国家分享绿色科技、环保技术等。同时也要加快与世界各国进行生态合作的制度设计，加大在绿色环保技术等方面的联合攻坚力度，完善共同面对、处理环境问题的机制体制，在全球确立命运与共的思想理念。其次，要进一步创新“一带一路”沿线的生态绿色发展体系。一方面要利用现有的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专项的生态发展基金，并使这一基金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环境问题治理、改善，还可利用这一专项基金鼓励推动沿线国家、企业加快技术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还要建立专门性的机构督促沿线区域的合作。同时还要继续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援助，深化“6个100”^②项目支持，推动与沿线国家在“工业、农业、人力资源开发、绿色能源、环保等领域务实合作”^③，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最后，中国要踊跃参与到全球绿色生态发展相关规则、机制的制定，积极贡献中国的生态建设智慧和经验。要继续充分发挥中国在联合国推动生态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遵循既坚持自身的立场、又从全世界人民长远利益出发的原则，大力参与到与全球生态治理相关的国际论坛、多国峰会等，推动全球生态治理向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开放包容局面发展。近年来，中国广泛参与到与全球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会议、多边或双边协议等，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国家，同时还专门设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基金，帮助不发达国家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如2022年1月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3000套家用太阳能电源系统，为巴基斯坦节能绿色照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以及向全世界作出力争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等，这些实践行动充分表明了中国在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中强烈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及参与国际生态治理的大国担当。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第4—19页。

② “6个100”项目包括100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

③ 习近平：《携手合作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7日，第1版。

玉溪推进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研究

——基于苏州、重庆、成都、昆明等城市和玉溪的比较

李 萌，李辰航

(中共玉溪市委党校，云南 玉溪 653100)

摘 要：与单一的“造城运动”不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是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一体的城镇化。玉溪在地理上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①之中、滇中城市群发展格局的中心地区，因此，如何发挥地理优势，高质高效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苏州、重庆、成都和昆明的调研，分别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居民生活品质六个方面，运用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客观计量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各项影响因子的影响权重及方向，通过城市间的比较，明确玉溪的优势和不足，以期为玉溪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有益探索。

关键词：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GMM（广义系统矩估计）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2）01-0102-10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要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②玉溪处于滇中城市群的中心地区，是全国“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核心区。作为滇中城市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城市之一，玉溪高质高效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通过考察调研重庆、成都、德阳以及苏州等西部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建设，在城市矩阵构建下结合玉溪实际情况，对玉溪新型城镇化提出建设路径。

一、个案分析：从“双城记”“同城化”到“国际窗口”

玉溪作为滇中腹地，一方面是滇中城市群中的重要城市之一，近年来努力探索滇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和昆玉同城化发展，因此，考察成渝“双城记”、成德眉资城市群“同城化”的做法经

基金项目：中共玉溪市委党校2021年重点课题“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破解玉溪资源环境制约难题”。

作者简介：李萌，中共玉溪市委党校副教授，公共管理硕士，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公共管理；李辰航，中共玉溪市委党校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运行理论与政策研究。

①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全面形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具体来说，即优化提升5个（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发展壮大5个（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北部湾等）城市群；培育发展9个（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城市群。

② 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2020年第21期，第4—10页。

验，对滇中城市群及昆玉同城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中老铁路在 2021 年 12 月 2 日全线通车。如表 1 所示，中老铁路国内段站点共 17 个，在玉溪段密集分布于三个县区共 5 个站（包括玉溪站、研和站、峨山站、化念站和元江站）。“昆明—玉溪—景洪”段为双线铁路，这使得玉溪区位和交通优势尤为突出，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交通枢纽。因此，考察苏州工业园区中的中新合作和国际窗口打造的做法经验，对玉溪的国际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表 1 中老铁路国内段站点情况

	站点	占比
国内段	17	100
昆 明	4	24%
玉 溪	5	29%
普 洱	3	18%
西双版纳	5	29%

资料来源：《最详线路图！中老铁路到底修在哪儿？》^①

（一）成渝唱响“双城记”，以资源共享促联动发展：重庆科学城

成都高新区与重庆高新区的联动，就像磁石的两极，辐射着川东和渝西发展，而西部（成都）科学城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相向发展，则形成成渝科创大走廊的两端。

2020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强化重庆和成都的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唱好“双城记”。^② 随着两地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明确了共建“一城”“一廊”“一高地”“一区”“一港”和“一机制”的“六个一”重点任务，即通过西部科学城、成渝科创走廊、全国新经济示范高地、西部创新创业引领区、内陆自贸港和要素自由流动机制的共建，围绕“优势产业合作、创新资源共享、全球资源链接、共建共赢模式探索、重大功能性平台打造”五个方面，共同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③ 2021 年 10 月 20 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发布，明确了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定位，提出了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9 项重点任务。在推动成渝“双城”建设中，西部（重庆）科学城的打造颇具亮点。

一是在重庆科学城形成了生产上“一核四片多点”、生活上“一主四副多组”、生态上“一心一轴两屏”的空间规划和“北研发、中转化、南制造”的发展格局，有效实现了资源集聚、产业集聚、人才集聚。

二是以交通联动为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截至 2020 年底，重庆科学城规划建设 5 条高铁线路、3 条城际公路、4 条都市快线、5 条普速铁路，35 个穿山隧道（现已通车 16 个），多向贯通成都及重庆科学城周边区域。^④ 此外，两地科学城均设第二机场，即成都天府机场和重庆正兴机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共 4 个 4F 级机场，将初步建成世界级机场群。

三是利用大数据搭建“项目落地快速响应平台、项目建设联合推进平台、企业资源整合链接平台、政策兑现联合办公平台”四大项目服务平台。一方面，通过推进开办企业全流程无纸化，

^① 中国铁路公众号：《最详线路图！中老铁路到底修在哪儿？》，2021 年 12 月 3 日，<https://mp.weixin.qq.com/s/MyBhw1JngSmrW3iP92HRDA>，2022 年 1 月 10 日。

^② 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2020 年 1 月 3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01/03/content_5466363.htm，2021 年 7 月 20 日。

^③ 《成都高新区、重庆高新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20 年 4 月 30 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7211146，2021 年 8 月 1 日。

^④ 李星婷、张亦筑：《站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新起点上 西部（重庆）科学城大踏步走来》，《重庆日报》，2020 年 9 月 11 日，第 4 版。

推行“科学政务帮”上门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一业一证”“一码覆盖一证通行”。此外,2021年推出“链长制”,通过“一位委领导、一个牵头部门、一套产业链图谱、一个工作方案、一套支持政策”的工作模式,由主要领导担任产业链链长,打通产业链各个环节之间的“梗阻”,保障产业发展。

(二) 成德眉资“同城化”,以辐射带动形成发展聚力:德阳市

德阳在四川省和与成都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在地理位置还是经济发展上都与玉溪极其类似。德阳距成都仅45公里,是成都城市群中距离成都最近的城市,位于成德绵眉乐城市轴线的中间段,处于成都辐射川北的核心区域,是成都联结川北的重要节点。近年来,德阳积极融入成德眉资同城化,将“成都优势”与“德阳优势”有效叠加,聚焦以“天府数谷”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形成了新的更高质量的发展。

一是从2009年《成德绵区域合作发展战略规划》编制开始,成都与德阳两市开始探索协同发展的路径。2018年成德同城化上升为省级战略,共同印发了《成德同城化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年)》,随后通过签署《关于加快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合作协议》,深入推进包括区域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生态环保、公共服务、户籍管理、人才流动、政策协同等“八个同城化”,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2019年1月18日,德阳市区域协同发展局挂牌成立,专门负责对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进行规划谋划、统筹协调。^①

二是以交通同城化助力产业同城化。目前成德两市之间已建成5条高速、4条快通和4条铁路,其中列车运营密次达每天112列,高峰时段间隔仅5分钟,实现公交化运营。2020年8月出台了《德同城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方案》将通过“9高13快13轨”构建德同城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打造“半小时通勤圈”。^②

三是深化“放管服”改革,通过“一个标准管流程”“一网通办提速度”和“一次办结零成本”流程再造,实现企业开办从2019年的“零成本一日办”提速至“零成本小时办”,实现新进企业“百日开工、年内投产”。

(三) 打造“国际窗口”,以国际合作创造发展契机:苏州工业园区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之间的重要合作项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在占自贸片区面积的一半以上的高端制造与国际贸易区中,有一个集高端制造、经济发展和改革创新为一体的最前沿——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综合保税区。

首先,苏州工业园区在建设和机构运行上,充分体现了高位推动的显著优势。在邓小平同志“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讲话推动下,1994年《关于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下发,中新两国以苏州工业园区为项目开展合作,启动工业园区建设。自2014年起,国务院先后批复同意建设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和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机构运行上,中新两国政府成立联合协调理事会,双方主席均由副总理担任,并设置对应的联络机构,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和运行新模式。

二是交通的便利通达是园区物流产业发展最大的先天优势。高贸区无论是距离上海,还是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都很近,沪宁高速和吴淞江航道横贯园区,因此具备了海陆空立体物流优势。陆港建设方面,沪宁高速园区出入口与园区综合保税区直接对接,实现快速通达;建立“虚拟海港”,通过“海河联运”等方式与上海港、宁波港等一线港口实现多式联运对接;建立“虚拟空港”,直接连通上海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初步形成了覆盖海陆空的多功能立体式区域性物流枢纽。

三是从“营商环境30条”到2021年5月发布的“营商环境4.0版”,园区的营商环境改革每次都

^① 郭静雯:《区域协同发展新年开新局》,《四川日报》2019年3月4日,第2版。

^② 叶斌:《同城同路——成德间将建“9高13快13轨”综合立体交通网》,2020年7月30日, <http://www.deyang.gov.cn/xwdt/dydt/1108239.htm>,2021年12月3日。

会打造一批“全国首创”和“全国领先”，为园区下一阶段的产业发展提供优质的环境。苏州工业园区在2020年度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估中模拟排名全球第25位，已达到全球一流水平。^①一方面通过“直接取消、数据调用、部门核验、告知承诺”四种方式，建立“免证园区”，免证范围覆盖600项政务服务事项。另一方面，作为全国首个综合保税区，通过对试点企业的“信任管理”推行“以数据链监管供应链”的保税监管改革，不仅极大地简化业务核批流程，还大大降低企业成本。

（四）对玉溪发展的启示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以成都为“轴心”来看，成渝“双城记”是一种外循环，成德“同城化”是一种内循环；苏州则是内外循环畅通、相互促进的典范。结合玉溪发展实际，可考虑做好四方面的“文章”。

1. 精准把脉，发挥优势

因势利导，加快发展。一是要把握国家的各项政策，明确省委省政府对玉溪发展的定位、要求和任务，认真梳理玉溪在“昆玉同城化”和“滇中城市群”中的比较优势，积极争取政策扶持；二是要摸排周边、检查自身，把玉溪区位、资源、环境优势尽早转化为发展优势，主动融入“昆玉同城化”和“滇中城市群”的大发展中，与周边城市群同频共振。

2. 规划引领，一城一策

科学发展，规划先行。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结合国家、省委的决策部署和本地实际情况，围绕是否符合本地发展需求、是否顺应外部环境发展需要、是否具备长远发展的前瞻性等核心问题，形成优势与特色交融的发展规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做到一地一策、一城一策。

3. 聚才集产，突出特色

人是产业发展的前提。一是要通过政策调节和制度改革等宏观手段吸引更多不同层次的人口流入，并以更优质的环境将流入人口变为常住人口，迅速形成人的聚集。二是要通过短期培训、职业教育和学历提升等方式多渠道加大培训力度，强调人口素质的整体提升。三是加强产业发展规划，突出创新引领，延长拓展产业链，尽快形成“教—研—产”立体化发展。

4. 开放共享，产城构景

玉溪在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桥头堡建设中发展国际物流具有先天的节点优势，应在充分发挥枢纽作用，畅通行政审批壁垒，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吸引更多国内外市场主体在玉溪进行资源整合、共建共享、融合发展，打造“以人为核心、以城促产、以景韵城、产城互动、景城融合”的魅力玉溪。

二、矩阵构建：玉溪推进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思路

目前，玉溪在人、地、产、城和钱五个方面存在一些现实困难（详见表2），如何结合个案经验，有效解决这些困难就是玉溪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所在。

为厘清玉溪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思路，课题组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城镇化品质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指标，选取依据（Cliff & Ord, 1973）（Anselin & Rey, 1991）的相关研究，考虑了空间自相关与空间的依赖干扰和同城化的聚集效应，运用苏州、重庆、成都、昆明和玉溪五个城市的2010至2019十年的城镇化成熟度、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社会文明程度测评指数、细颗粒物（PM_{2.5}）平均浓度、公共服务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六项指标，分别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居民生活品质六个方面，构建城市矩阵，通过实证分析，

^① 《合同执行率全球第一 园区营商环境世界排名居第一梯队》，苏州工业园区融媒体中心，2021年2月20日，<http://www.sipac.gov.cn/szgyyq/202102zmckhzzc/202102/a25b9d6efaa74eec9053ab4b5bfc4076.shtml>，2021年12月20日。

客观评述玉溪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优势和不足。

表 2 玉溪存在的现实困难

	现实困难
人	在滇中城市群中，玉溪 60 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为 16.56%，高居榜首；高等教育比 12.1% 低于昆明高于曲靖、红河、楚雄，且未达到全国约 17% 的平均数，人口素质偏低。常住人口超过 50 万人的仅有红塔区，其余县（市、区）均在 10 万至 30 万之间，且差距较大。
地	全市库存耕地数量指标 -4067 亩，水田规模指标 -4271.04 亩，粮食产能指标 -177.64 万公斤，批而未供土地规模庞大，占补平衡指标紧缺和批而未供矛盾突出。基本农田保护区与公益林重叠 10.14 万亩，与自然保护区重叠 5549.4 亩，与林地重叠 103.4 万亩，与生态保护红线重叠 7.36 万亩，国土面积 27.10% 的土地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远高于同级其他城市。
产	从近五年来看，全市固投增速在 2016 年达到峰值后，呈断崖式下滑，特别是 2019 年为 -8.8%，而同年全省固投增速均值为 8.5%，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从固投结构来看，除了一产实现轻微正增长外，二三产都在萎缩，特别是三产虽然呈 9.7% 的负增长，但其子目录下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却增速显著，经济有脱实向虚的趋势。
城	从城镇化率来看，2020 年全市平均水平 54%，但最高的红塔区与最低的元江县相差 27.68%，县（市、区）间差距较为明显；相较于滇中其他城市，玉溪虽略高于曲靖、楚雄和红河，但与昆明却有 20 多个百分点的差距。从城市更新来看，24 项主要任务中，澄江达标率最高，为 14 项；江川最低，仅为 5 项；步行、公共交通等 7 项指标均无达标县（市、区）；城市居住用地占比、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2 项指标，也分别都有 1 个县（市、区）未达标，城市体检结果不理想。
钱	从公共预算收入来看，2020 年全市为 134.5 亿元，比 2018 年少 8 亿，呈负增长。分区县看，以 2018 年为基期的前提下，红塔区和易门县连续两年正增长，澄江市和新平县连续两年负增长，江川区、通海县、华宁县、峨山县、元江县各有一年负增长。从民生项目来看，棚改中债券和贷款合计 214.4 亿元，占总资金的 85.5%；公租房建设中政府累计债务 15.22 亿元，地方财政压力较大。

资料来源：调研资料整理

(一) 指标相关性检验

首先基于 Gram - Schmidt 算法，考察经济发展指标、社会文化指标、生态环境指标、公共服务指标、居民生活品质五个大类指标是线性相关还是线性无关。

设向量 a_1, \dots, a_k ，对 $i = 1, \dots, k$ 其中 i 为《新型城镇化品质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三级指标。构建城市矩阵

$$\text{正交化: } q = a_i - (q_1^T a_i) q_1 - \dots - (q_{i-1}^T a_i) q_{i-1}$$

$$\text{规范化: } q_i = q / \|q\|$$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受影响程度，经济发展指标，社会文化指标、生态环境指标、公共服务指标、居民生活品质为解释变量。

可以发现，经济受影响程度与经济发展指标、社会文化指标、生态环境指标、公共服务指标、居民生活品质之间有高度的相关性，虽然不能确定反函数一定存在，但其线性相关可以确定。

因为五个指标线性相关，为避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广义系统矩估计 GMM，不采用差分 GMM。

(二) 计量模型的设计

为排除单位的影响，所有指标选取对数百分比表示，基于以上分析 GMM 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ln^{eco-effic} = \beta_0 + \beta_1 \ln_{it}^{str-indu} + \beta_2 \ln_{it}^{lev-civil} + \beta_3 \ln_{it}^{pm2.5} + \beta_4 \ln_{it}^{pub-serv} + \beta_5 \ln_{it}^{soc-degr} + \beta_1 \ln_{t-1}^{eco-effic} + u$$

其中：下标 t 为时间， i 表示不同的城市， β_0 是常数项， U 为控制变量。

相关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text{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str-indu)} = (\text{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 (\text{规上工业总产值})$$

值) × 100%

年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 = (有效日 PM2.5 平均浓度的合计值) / (全年有效监测天数) × 100%

公共服务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 (pub - serv) = (一般公共服务预算支出) / (总额 预算支出公共一般) × 100%

Soc - deger 为恩格尔系数

(三) 计量检验

1. 描述性统计

表 3 模型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E(X)$	$D(x)$	Max	Min	样本数
Eco - effic	0.0053	0.0011	0.0061	0.0039	250
Str - indu	17.661	4.224	24.081	10.905	250
Lev - civil	7.621	0.998	9.191	5.700	250
Pm2.5	12.120	5.575	17.662	6.491	250
Pub - serv	9.078	1.274	10.099	5.409	250
Sco - deger	24.856	8.276	29.177	22.331	250

注: $E(x)$ 、 $D(x)$ 、Max、Min 分别表示: 经济受影响程度 (Eco - effic)、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Str - indu)、文化娱乐支出比重 (Lev - civil), 年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公共服务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 (pub - serv)、恩格尔系数 (Sco - deger) 的数学期望、方差、最大值与最小值。描述性统计并不是某一个具体城市的简单统计, 而是基于研究的 5 个城市 250 个样本的概括统计。未来新数据加入造成的统计误差, 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在方向上影响 GMM 的计量结果。

2. 广义系统 GMM^① 回归结果

在空间经济学的视角下, 在 GMM 区域的选择上, 充分考虑城市的发展水平, 地理区位差异, 以及城市间的互相影响。选择西部普通发展地区: 昆明、玉溪; 西部发达地区: 重庆、成都; 东部发达地区: 苏州五个城市作为区域代表。

表 4 分地区统计结果

	西部普通发展地区		西部发达地区		东部发达地区
	昆明	玉溪	成都	重庆	苏州
对数滞后一期	[0.174]*** (0.0711)	[0.167]*** (0.0233)	[0.211]*** (0.0293)	[0.212]*** (0.0535)	[0.304]*** (0.0188)
Str - indu	[0.081]*** (0.0229)	[0.026]*** (0.0311)	[0.331]*** (0.0110)	[0.255]*** (0.0188)	[0.242]*** (0.117)
Lev - civil	[0.0021]** (0.0001)	[0.0023]** (0.0001)	[0.0027]** (0.0002)	[0.0019]** (0.0002)	[0.0023]** (0.0001)
Pm2.5	- [0.011]*** (0.0333)	[-0.019]*** (0.0690)	[-0.028]*** (0.0477)	[-0.030]*** (0.0356)	[-0.025]*** (0.0361)
Pub - serv	[0.449]*** (0.0310)	[0.399]*** (0.0174)	[0.311]*** (0.0201)	[0.391]*** (0.0604)	[0.422]** (0.0412)
Soc - deger	[0.2829]*** (0.0034)	[0.3867]*** (0.0064)	[0.1163]*** (0.0051)	[0.1101]*** (0.0290)	[0.0047]*** (0.0111)

① GM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即广义系统矩估计, 是基于模型实际参数满足一定矩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

表 4 (续)

	西部普通发展地区		西部发达地区		东部发达地区
	昆明	玉溪	成都	重庆	苏州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AR (1) - p	0.011	0.023	0.013	0.016	0.044
AR (2) - p	0.311	0.533	0.422	0.222	0.701
Hansen - p	0.280	0.424	0.392	0.279	0.254
样本数	250	250	250	250	250

注:***, **, * 分别表示在 1%, 5% 和 10% 显著水平下显著

从计量结果来看,无论是分地区,还是分城市,五个指标计量结果显著,说明评价指标选择科学,能反映研究主题的经济特征。

(四) 结果分析

从对数滞后一期的计量结果看,随着城市群城镇化成熟度的提高,城市的知识、资源等原始积累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有更大的影响,而玉溪的相关指标权重在五个城市里最低,表现出玉溪缺乏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原始资料积累,在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上起步晚、底子薄。如果不考虑上期积累对本期的影响可以发现,所选五个城市的城镇化成熟度在未来都会有所提高,但玉溪的发展速度依然是五个城市中最慢的,而成都发展最快。玉溪城市化进程中的最大优势在于发展的均衡性,市内片区没有出现明显的不均衡,而其他四个城市却两级分化严重。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来看,玉溪与昆明占比过低,产业转型升级还处于初级阶段。产业结构的转型需要政策、人才和知识的储备结构三个基础条件,玉溪储备匮乏,但随着生物医药产业、我国最大的 LED 蓝宝石晶体生产加工以及蓝宝石衬底研发生产基地、我国最先进的智能空气源热泵干燥机械及其控制技术研发基地等重大项目的带动,投资效益将明显增长,未来玉溪在该指标的权重会有所提高。观察苏州的结果,可以发现苏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占比也处于中间水平,这与传统认知有所不同,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苏州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界定有别于其他地区,西部认为的新兴产业,在苏州只界定为普通产业,这是发展水平不同所带来的差异。

从社会文化发展情况来看,地区差异不大,基本可以认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文明程度上是相似的,比较优势不明显。从文化的特征出发,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无论是东部沿海还是西南高原,都有其特有的文化禀赋与文化特色,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强势文化,只是开发和挖掘程度的不同,造就了市场呈现形式和价值的差异。

从生态环境情况来看,玉溪的自然环境保护在五个城市中做得最好,长期贯彻落实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生态观,紧紧围绕“陆地生态修复、库塘湿地修复、湖滨缓冲带完善、湖内水体保育”的思路,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显著。从计量结果可以发现,良好的环境对城镇化成熟度贡献有限,大城市往往比小城市污染严重,但并没有从实质上影响其城镇化成熟度。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到 2025 年“十四五”规划完成时,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 2.1 亿,占总人口数的约 15%,这也意味着适合老年人的消费会迅速增长,玉溪依托良好的资源禀赋,立足于高品质康养旅居新高地的建设,将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新的增长点。

从公共服务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来看,该项指标对城镇化成熟度影响较大。公共服务支出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且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强于东中部地区,这与公共服务支出的规模收益递减有关。研究表明,现实中增加公共服务的支出,将同时产生人力资本效应、消费乘数效应和消费挤入效应,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机制,是提高城镇

化成熟度的重要标志。从计量结果来看，玉溪在五个城市中，公共服务的支出效应最高，也就是说玉溪城镇化成熟度是最低的。

从恩格尔系数的分析结果来看，随着城镇化成熟度的提高，其影响力呈下降趋势。苏州该指标最低，表现在其人均收入较高，已经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玉溪的该指标同样比较高，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却比较低，表明玉溪的老百姓虽均但不富。未来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玉溪该指标的下降空间还很大。

综上所述，玉溪要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最主要是要通过产业的繁荣来吸引人、优质的公共服务供给服务人、良好的生态环境留住人。

三、五对关系：玉溪推进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建议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将“为了人”“依靠人”贯穿于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中，确立人在新型城镇化中的核心地位，从人的需求出发，提高人的素质、增加人的就业、保障人的权益、改善人的居住，整体提升人民群众对城市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这势必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将“人要怎么引”“地要怎么盘”“产要怎么融”“钱要怎么来”“城要怎么建”“人要怎么留”一系列关键问题用新发展理念贯穿起来的协调与统一，必须统筹推进。

（一）协调好人与发展的关系，突出人的主体地位

人与发展呈辩证统一关系，表现在人的行为导致了发展的结果，而发展的成效同时又取决于人的实践活动，这就决定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要通过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实现的和谐发展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并在发展中实现人的价值。

一要突出生态优势，吸引外来人口。各县（市、区）在原生自然资源基础上“做优山水做特情”，因势利导、精准定位、错位发展，例如，华宁县、澄江市、江川区围绕“三湖”着重突出傍水而居；新平县、元江县围绕“无量山—哀牢山”着重突出依山而建；易门县、通海县围绕山水，着重突出山水交融；红塔区和峨山县力求在“情”中寻求新突破。特别是充分发挥澄江市距离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仅59公里的区位优势，在“三个国际城市”的目标定位中，争取国家层面的高位推动，努力成为“53个国家人员过境昆明144小时免签政策”延伸的试点城市。

二要重视全面融入，加快转移人口市民化。既要促进居住证制度和户籍制度有机融合并轨，提高居住证发证量和含金量，吸引更多外来人口落户玉溪；又要建立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相关权益分配机制，探索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农村的相关权益，实现市场价值；打造“社区+服务+就业+保障”的运作模式，促进重大工程、生态搬迁、易地扶贫等搬迁人口及时、全面地融入城镇。

三要鼓励突破实现，落实人才培引。按照人才成长的规律“引培育”，结合玉溪的主导产业、重点领域，以第四、五、六类人才的引进为突破口，制定优于其它州市和东部发达地区同类人才引进的政策及配套政策；加强普通行业技能服务型人才的认定，建立“企业评价+社会评价”的评选标准，充分调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普通劳动者爱岗敬业的工作热情；继续推进“兴玉人才计划”，围绕重大项目和重点产业，加快人才培养；增设“引才伯乐奖”，对引才成功者实行一次性货币、追加货币和精神表彰的批次奖励；运用好柔性公关政策，加大玉溪籍、云南籍的各行业专家及朋友圈专家到玉开展智力支持，并极力争取专家及其团队在玉签订长期稳定的对口支援及技术支持。

（二）协调好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盘活低效存量土地

城镇化建设的最大制约和关键环节就在土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是要通过人口的流动，加速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也在市场中的自由流动，并实现优化配置，从而打破大城市群膨胀、小城镇萎缩、边远农村凋敝的不均衡，让城镇和农村在联动中协调发展。

一要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农村闲散用地市场化。借鉴“重庆地票”^①成功经验,开展城乡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推出复垦、验收、交易、使用四个环节为主的市场化运作生态票交易制度,盘活农村和城市的用地指标。运用市场化机制激励“退建还耕还林还草”,减少了土地的低效建设占用,真正打通了农村土地产权难以“动”起来的制度壁垒,将占补平衡、增减挂钩落到实处

二要提高集约意识,及时处置批而未供土地。从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从根本上扭转土地资源粗放扩张的发展观,提高集约用地意识。以工业园区为试点,引入“亩产论英雄”的评价机制,为科技含量高、亩均税收多、占地少的项目提供更多用地空间;探索创新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化供给方式。

三要强化用地监管,消化利用闲散土地。建立健全已供土地动态监管机制,协助用地主体尽早办理项目开工手续同时,以事前提醒、事中督促、事后通知等方式督促用地主体限期开工建设;对于尚未开工的用地采取精准化的方式妥善处理。

(三) 协调好经济增长与就业创业之间的关系,促进产城融合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社会财富创造的来源和大局稳定的重要支撑。^②创业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原始动力之一。就业创业都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结果,也是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一个结果。一个城市要长期保持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离不开持续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其基础就是要在产业布局上下好先手棋,让产业发展适应市场需求和变化,并快速在玉溪形成优势产业集聚。玉溪应该把产业发展的突破口放在工业上,加速工业倍增计划的制定和重大项目的聚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要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创新城市建设。全产业链塑造传统产业新优势,通过对烟草、钢铁、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的产业优化升级,促进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高质量发展,快速形成产业集群。

二要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加强市场主体培育。立足玉溪的区位节点,加快构建集公路、铁路、航空为一体的物流通道系统,如建设一批涉及县、乡、村三级,适应不同农产品储运需求的产地预冷、保鲜及销地冷藏、冷冻设施的现代物流业;探索开发“养老+旅游+康养”等新兴业态地产,因城施策满足住房供给;加强海外市场拓展力度,引导南亚东南亚国家到玉溪开展多元化合作;以众创园的平台建设为载体,形成线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协同、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局;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在“打造云南数字经济第一城”的战略布局中,充分利用华为、联通、融建数据中心的聚集效应,坚持不懈抓数字产业化,引进国内一流的软件企业、区块链企业和项目落地玉溪,加快“滇中数仓”的发展步伐。

三要重视市场主体获得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城市机会清单”,建设亲清政企关系;打通玉溪与昆明之间的行政审批壁垒,加快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谋划玉溪成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和起点,特别是在面向南亚、东南亚市场方面探索“虚拟海港”“虚拟空港”的通关贸易物流便利化程序,提升涉外业务服务水平;建立营商环境观察员制度,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对营商环境建设工作的监督。

(四) 协调好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服务差异化之间的关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是去差异化,城市进程中均等化和差异化往往同时存在,反映了需求

^① 地票,是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过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所产生的指标。企业购得的地票,可以纳入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增加相同数量的城镇建设用地。

^② 新华网:《李克强对全国就业创业工作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2021年6月3日, http://m.xinhuanet.com/2021-06/03/c_1127527625.htm, 2022年1月10日。

多元化的市场诉求。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就是要通过打破户籍这道分隔门槛，让人民群众都能平等分享到城镇化进程中的优质公共资源，其核心就是用“优质”的公共服务去差异化。

一要融入发展规划，推进城镇化。创新“多规合一”制定程序，形成以专项规划促进国土空间规划，以国土空间规划引导专项规划的调整协商机制；推进玉溪科教创新城与昆明呈贡大学城的资源共享、制度对接和联动发展，实现产城、产教、产研融合发展；加快通海撤县设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步伐，促进红塔、江川、通海一体规划一体发展，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加快县域城镇化，建设特色田园综合体，探索建设高等教育、科研、金融、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集聚的高端特色小镇。

二要提高教育医疗水平，拓宽住房渠道。以“社区10分钟”生活圈为半径，加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面；以“名校联盟、开设分校”为思路，鼓励优质中小学集团化办学；以提高一本升学率为目标，扩大提升高中教育办学规模和质量；以一流学科、重点学科、特色学科建设为重点，开办具有鲜明特色的职业教育和地方应用型大学。加强与省内专家团队合作，建成一批高水平的临床诊疗中心；鼓励社区医院按照1~1.5张/千人增加床位配置，增设特色专科诊疗，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应急体系。丰富以租赁补贴发放为主的多形式住房保障体系，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专属人才公寓；畅通缴存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购房和按揭的手续便利。

三要加强社会保障，提升社区服务。便捷社会保险转移接续和异地就医结算等手续；构建“以10分钟社区服务为半径”的社区养老和婴幼儿看护，以慈善、社工、志愿服务为载体，扩大城镇救助覆盖面，建立健全以救助对象为主的动态监管体制和与物价一致的标准联动机制，开发线上与线下互动融合的社区商业综合性服务平台和智慧小区管理系统，加快城市慢行和绿色交通系统建设。

（五）协调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确保建设资金充盈

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资源配置方式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①换言之，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要继续深化“人钱挂钩、钱随人走”的挂钩机制，争取省财政设立以奖代补专项，对类似抚仙湖环湖棚改和生态移民整村搬迁大型项目中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县（市、区），给予资金倾斜；争取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商业银行设立的新型城镇化信贷专项；共建“政府+银行+企业”资金池，引导产业发展的多元化投入机制；按照《国家储备林贷款业务规程》，通过营造和培育多功能森林，申请国家储备林项目贷款贴息；引导“政府+企业+居民”共设专项维修资金，解决老旧小区改造中资金短缺难题；推行“一元租金、资源换服务”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将已建成或完成更新升级公共场所以载体资源的形式交由企业进行管理和运营，增强城市造血功能。

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人、地、钱、产、城”五个元素一个都不能少。“人、地、钱”作为关键要素，是兴“产”和构“城”的关键所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是要让每一个有意愿向城镇转移的人都能如愿，让每一个居住在城镇的人都能分享城市发展的红利、都能享有平等的优质公共服务、都能在思想和行动上真正实现社会融合、都能有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中为现代城市文明不懈奋斗，这就需要正确分析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发展困境，运用科学的方法逐一击破，凝聚更广泛的人心和智慧，坚持不懈、共同奋斗。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6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6/c64094-23561785.html>，2021年1月5日。

现代化背景下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建构

赵 阳

(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河南 许昌 461002)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对乡村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要求用现代文明方式和理念重新诠释、解读乡土文化价值体系, 重新实现乡村文化的振兴。然而, 由于社会生产方式转变、商业文化传播、乡村文化精英单向流动、乡村集体经济低迷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乡村文化陷入了“破”“立”断裂、去主体化、边缘化以及文化空间萎缩等困境。为突破这些困境, 有必要树立乡村文化建设新理念, 通过构建乡村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再生产机制、构建乡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吸引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文化建设, 久久为功, 实现乡村文化在现代化发展框架中的转型与振兴。

关键词: 现代化; 乡村文化振兴; 困境; 路径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1-0112-09

乡村文化振兴是以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心、以村民为主体, 创造、发展、兴盛乡村精神财富的过程, 继而“促进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 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①。乡村文化振兴在促进乡村现代化的同时, 也受到后者深刻的影响。一方面, 乡村现代化客观上会解构传统乡村文化, 瓦解千百年形成的乡村传统文化体系; 另一方面, 现代与传统文化要素在新的环境与需求下的整合, 逐渐生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并为乡村现代化提供新的支撑。因此, 对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必须突破“田园牧歌”式的文化想象, 从更宏观的视野予以考察和展望。当前, 学界对乡村文化振兴问题多集中于乡村振兴的结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乡村传统文化传承等,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 在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文化所面临的新旧转承等系统性与核心性问题距离取得共识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需要学术界花费较长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鉴于此, 笔者立足乡村现代化的宏观背景, 对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生成机理进行深入分析, 并提出可操作性对策, 以期回应学界对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关切。

一、现代化维度下的乡村文化振兴

从根本上说, 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其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社会心理、社会文化体系的变革; 二是从广义来说的政治关系的变革, 指一个统治集团推翻另一个统治集团建立某种新的社会秩序或某一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变革……; 三是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 如农业社会向

作者简介: 赵阳, 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干部, 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分析、乡村治理。

^① 龙文军、张莹、王佳星:《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解释与路径选择》,《农业经济问题》2019年第12期,第16页。

工业社会的转变”^①。

“乡村文化是指在乡村社会中，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社会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乡风民俗、社会心理、行为方式为主要内容，以农民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文化类型”^②。近代以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三次革命，推动中国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轨道，并对乡村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根本上塑造了当前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格局。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我国广大乡村被强行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并直接导致了传统生产方式的瓦解与乡绅阶层的流失，同时也动摇了儒家思想在乡村的统治地位。辛亥革命后，乡绅阶层进一步瓦解，乡村知识精英流入城市。这一阶层的抽离不仅导致传统知识权威和行为规范逐渐衰落，而且使新思想新观念接受程度长期低下；同时，“‘重农务本’之类的观念日益退居一旁，商品经济的意识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人们安土重迁的习惯淡化”^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破除封建迷信，并构建起以集体主义意识为中心的拥有超强动员能力的“革命”价值体系。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第三次重大社会变革，“重新调整着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和人们的社会角色定位，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④，唤醒了农民的文化自觉；然而，乡村文化建设却始终处于要素匮乏和配置不均衡的困境，导致乡村文化发展长期滞后。

整体而言，乡村文化具有根本性、脆弱性与多元性等特征。在百年变局中，乡村文化一直处于极度不安状态，既要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同时也要凸显自己千百年传统的文化特质。因此，无论现代人们如何呼吁原初形态的乡村文化，都终将发现其不过是人们社会心理的文化想象。现代人们的任务是“在尊重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活化乡土文化资源，用现代文明方式和理念重新诠释、解读乡土文化价值体系，满足当前民众多重精神需求，唤醒农民文化自觉意识”^⑤。本质而言，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所要达到的一种文化形态是既能够实现村民的自我认知与群体认同，寄托现代人们的乡土情感；同时还能够实现乡村整体的发展需求——即文化自我演进能力的生成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

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我国乡村文化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缓慢，并未真正找到在新环境下的自处之道，更没有找到自身与现代文化的互融之路，进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迷茫与不适应感。这体现于社会生活实践的诸多层面，并形成了循环强化的态势。

（一）乡村文化“破”“立”断裂

“在历经了建国初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解构影响，现阶段传统乡村文化呈现出日益解体的传统乡村伦理、空洞虚化的乡村文化精神、逐渐消失的乡村文化价值以及流失匮乏的乡村文化资源等衰败迹象。”^⑥一方面，乡村宗族文化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内在制度呈现断

① 詹石窗主撰：《中国宗教思想通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54页。

② 赵旭东、孙笑非：《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基于一种文化转型观念的再思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19—148页。

③ 戴鞍钢：《近代上海都市文化对市郊乡村的辐射》，《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3期，第5页。

④ 林文勋：《中国传统社会变迁启示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⑤ 史云、孙泽宇、彭伟秀等：《传统的未来：乡村文化振兴机制研究》，《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84—92页。

⑥ 沈费伟：《传统乡村文化重构：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择》，《人文杂志》2020年第4期，第121—128页。

裂式变化,“财产开始出现双系继承的迹象,人们的生活意义由绵延的宗族生活收缩到了个体家庭”^①。这种转型已经完全不同乡村传统宗族文化,导致了以家族为依托、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乡贤文化、家庭伦理、乡风民俗等的不可逆地瓦解。另一方面,“许多地方村庄形态、传统建筑、田园风光、传统工艺不复存在,乡村文化没有了载体”^②。以传统村落为例,不仅传统村落数量急剧减少,且其毁坏日益严重,包括“有些是瓦面破损,房屋漏雨严重;有些是房屋结构松动,倾斜明显;有些装饰壁板脱落,一些精美的门板、窗花木雕掉落”^③。

乡村文化的碎片化也体现在当前乡村文化的传承机制不足。众所周知,乡村文化传统传承方式主要由家学传承与师徒传承共同构成。然而,乡村现代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与技能,无法容纳纷繁复杂的乡村文化,导致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主要靠家学传承。然而,这种家学传承又极易受到现代教育制度以及乡村家庭结构变迁的影响,导致主动学习传统技艺的人越来越少,并集中于具有经济价值的领域,这也直接导致了乡村传统文化的碎片化。

(二) 乡村文化建设原生性文化主体缺失

“文化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本质上都是人的精神的外化,是人的理想的实现。人创造文化,也就是创造自身;人创造文化的过程,也就是人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过程。”^④然而,当前,在各种因素影响下的村民几乎成为被边缘化的文化群体,逐渐丧失其在乡村文化生产中的天然主体地位。

乡村文化建设原生性文化主体缺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知识精英掌握了乡村文化的解释权,并对其进行了权威性、解构性的阐释,排斥了村民对享有自身文化的解释权,导致其无法按照乡村生产与生活的逻辑自主建构、发展自身的文化体系,进而强化了村民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围观与困惑。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知识精英有本土精英,但更多的是乡村知识系统外的文化专家。其二,政府主导乡村文化建设,在处理乡村文化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时,存在对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的多元文化需求重视不足的情况,这导致了一定程度上乡村文化供需失衡的局面,同时也存在一些对村民合理化的文化需求以及文化自我生产行为非理性处置的情况。

这种主体地位的缺失导致了很多问题,不仅会进一步强化村民的疏离感和被剥夺感,降低村民乡村文化建设的参与度,提升乡村文化建设活动的社会成本;更为重要的是,缺乏村民主体的乡村文化建设很难与乡村现有的文化资源、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导致当前多数地区的乡村文化难以在政府的支持下走上内生发展的道路。

(三) 乡村历史文化的“边缘化”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外来文化进入的势头强劲,渗透力度大……部分传统村落原住居民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时,逐渐接受和吸收外来文化”^⑤。然而,以城市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的传播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乡村传统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固化其百年来形成的“落后形象”,导致其进一步边缘化。

① 付来友:《表征、制度与观念的“三重奏”——一个山东村庄宗族文化变迁的考察》,《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09页。

② 韩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十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0页。

③ 胡彬彬、李向军、王晓波等:《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8页。

④ 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2—103页。

⑤ 胡彬彬、李向军、王晓波等:《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页。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边缘化”现象既是现实的,也是心理感知的。就现实性而言,乡村文化是各地发展的历史见证,是村民生活的重要历史记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外来文化的传入,乡村越来越被贴着“先进”“现代”标签的城市文化所占领。乡村社会传统的礼仪规范与规约越来越游离于现代管理体制之外,情法难容;传统的民居越来越蜷缩于遍地洋房的村落中,原始景观遭到了极大破坏;乡村传统技艺越来越让步于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技术,走进并陈列于博物馆,甚至完全脱离其原生的环境和百姓生活。就心理感知而言,在与城市交往的过程中,“原住地居民在都市文化主体的凝视中,不仅没有从镜像中重新发现乡村文化主体的价值,建构起身份认同,反而在差异中看到了文化等级,诱发其自我否定”^①。这种心态导致当前很多地区在发展乡村旅游时,不惜以破坏式的整合、展示性的文化满足城市人的某种想象。当然,这种行为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无可厚非,但是从乡村文化自身发展角度来看,却易导致乡村文化体系不均衡发展乃至进一步瓦解。

长远看来,随着我国城市与乡村进一步融合发展,上述情况将越来越严重。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在经济和社会服务意义上强调城乡融合的同时,必须在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尊重乡村文化自身发展逻辑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乡村文化的进一步边缘化。

(四) 乡村文化空间的萎缩

传统乡村文化空间是“长期生产、生活、聚居和繁衍在一个边缘相对清晰、特定地域中的农业人群所组成的空间单元”^②。具体而言,其是指“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③,包含思想价值空间、行为习俗空间、制度文化空间、物质文化空间^④。

随着城镇化和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当前我国乡村文化空间呈现出不断萎缩的现象。这种萎缩体现在多个空间层次上。就思想价值空间而言,在小农意识和陈规陋习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乡村集体意识和伦理价值不断丧失的同时却无法吸纳现代的价值体系;在制度文化空间层次,随着国家乡村治理的不断深入,传统的乡村治理规约与体系逐渐让位于现代法治与制度,并不断丧失自身的合法性与权威,导致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和治理能力迅速下降;在物质文化空间方面,传统建筑、祠堂、街道等物质空间逐渐消失,导致与之相适应的传统乡村文化缺乏足够的空间资源。此外,在行为文化层面,民俗逐渐异化,逐渐成为表演性文化;传统民间技艺逐渐让步于现代生产技术,最终退出生活场景,成为博物馆或民俗馆的展品。

三、社会变革中乡村文化振兴困境的原因分析

乡村文化在社会变革中所受到的冲击,根源于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同时,又受到商业文化传播、乡村文化精英单向流动、乡村集体经济低迷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当前乡村文化的演化路径。

(一) 乡村生产方式转型的影响

历史地看,传统乡村是建立在以精耕细作、耕织结合、劳动力密集投入为特征的传统小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农业社会。近代以来,由于“现代化过程的拉动,根本性地改变了乡村的文化与

① 季中扬:《乡村文化与现代性》,《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第202—206页。

② 刘森林:《中华聚落:村落市镇景观艺术》,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③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国办发〔2005〕18号),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24》,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94页。

④ 李亮:《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现代性重构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第142—171页。

政治地位,并使其法定地处于经济上附庸和被牺牲的境地”^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乡村现代化渐趋展开,由手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由分散经营向集约化经营急剧转变,并对乡村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是在这场变革中,村民生活越来越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与设备,以期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出;同时,对传统技术——不论其是否能够为现代科技与设备有效替代——淡漠,对其进行传承和保护所投入的资源不足,导致大量传统生产方式和技术最终只能化作人们田园诗歌中的节奏。二是“现代化的进程要求扫清种种封闭因循、消极反馈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模式,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要求舍弃局限于经验论的思想模式”^②。乡村以血缘为核心的组织结构、以经验为导向的思想观念、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以社会期望为导向的行为方式等传统生产方式的内容在这种根本性的变革面前开始受到质疑与冲击,并随着乡村生产方式的持续变革而不断解体。三是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增强了村民改造乡村自然景观与人造景观的能力,导致传统乡村空间结构的巨大变迁,极大改变了传统乡村文化赖以存在的物理文化空间——包括乡村建筑与自然环境。

历史地看,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乡村文化振兴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只有乡村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实现了彻底转型,才能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系统反思、重构乡村文化。但是,无论现代人们多么不舍与悲怆,乡村文化再也回不到那个温情脉脉的自然状态。

(二) 现代商业文化在乡村的广泛传播

随着乡村生产方式的变革,部分农民逐步摆脱土地的束缚,开始走进城市,从事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建筑业等工作,逐渐习得现代商业文化。同时,随着企业销售网络向乡村延伸,现代商业活动越来越突破乡村传统商业活动的范畴,为乡村带来了鲜活的商业文化与实践。

现代商业文化在乡村的广泛传播,不仅极大激发了村民的财富意识,促进了村民的创造性与能动性,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也在客观上冲击了乡村传统的价值观。如,现代商业的契约精神冲击了乡土社会基于传统行为习惯的信用体系,稀释了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乡土社会网络,使得乡土社会越来越破碎化;同时,现代商业的逐利倾向导致村民越来越突破乡土社会以集体为导向的行为逻辑、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将利益视为自身行为的天然动机。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商业文明在乡村的传播有助于弥补乡村传统文化的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乡村文化的进步与更新,使之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然而,就商业文化与乡村传统文化的关系而言,在现阶段二者之间在价值取向、逻辑之间仍存在着较多冲突。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乡村社会仍然要不断调适自身,主动寻找乡村传统价值、行为规范与现代商业文明的相通处,建构二者之间有效融合的方式和路径。

(三) 乡村文化精英的单向流动

乡村文化精英主要是指乡村社会中对村庄共同体所孕育的内生性文化(包括地方民俗文化、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等拥有话语权,能够引导乡村文化走向、协调乡村社会关系、规范乡村伦理秩序的乡村知识权威。乡绅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精英,“是联系国家政权与广大乡村社会的中间环节,是乡村政治的中心,具有相当的道德解释权与评价权”^③。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

① 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页。

②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34页。

③ 刘博:《精英历史变迁与乡村文化断裂——对乡村精英身份地位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青年研究》2008年第4期,第44页。

乡村精英来自于贫苦家庭和政治思想觉悟高的青年党员干部，他们代表党和国家的利益”^①。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打破和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官方的文化运作逻辑（追求文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绩效等）渗透到乡村社会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精英的生存心态，导致其对自我定位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追求经济的获益高于文化传承的使命”。^② 在此价值导向下，越来越多的乡村文化精英逐渐离开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到城市寻找更大的利益空间。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乡村文化精英逐渐适应城市生活、接受城市文化后，就再也难以回归乡村，无法服务于乡村文化和建设发展。

同时，在当前“先进——落后”的文化视野下，在城乡生活方式和公共服务巨大差异下，城市文化精英多数很难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乡村文化。在很多情况下，其参与乡村公共服务多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而不是受文化传承的使命召唤；同时，其参与乡村文化和建设开发时，多是短期行为，鲜有真正融入乡村社会、扎根乡村社会的情况出现。

（四）乡村集体经济的衰落

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度红利的刺激下，乡村集体经济曾经获得较大发展，促进了乡村基础设施和群众精神文化的提高。然而，随着制度红利的消失、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乡村治理的滞后，大部分乡村集体经济渐趋没落，这不仅削弱了乡村自身的积累，而且对乡村文化的振兴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是乡村集体经济的衰落使得乡村只能集中于基本生活服务的供给，削弱了乡村投资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却间接增强了乡村对政府资金和项目的依赖，而这又进一步削弱了村民的主体性地位；二是乡村集体经济的衰落导致村委会动员能力的降低，并间接导致村委会难以有效组织村民进行传统艺术的学习与演出，遑论村民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情感加强对自身文化资源的开发。以笔者所生活的村庄为例，在90年代，村委会逢年过节都会组织群众敲锣打鼓，或者邀请剧团、杂技班到村里演出，得到群众的普遍喜爱。然而，随着集体经济的衰落，这些活动越来越少，甚至消失。三是乡村集体经济的衰落也直接触发劳动力的外流，这在瓦解乡村传统文化的社会环境的同时，也带回了大量的城市文化，进一步加剧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

四、社会变革中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延展

针对社会变革中的乡村文化振兴困境，既要以宏观国际视野和世界历史思维来看待该问题，又要从细微处着手，以解剖麻雀的方法逐步深入问题内部，拨开问题表面的迷雾，揭露问题的根源和本质，有针对性地提出系统、可行性路径。

（一）树立乡村文化建设新理念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③ 为破解当前乡村文化发展困局，厚植乡村文化发展优势，必须转换思路，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培育文明乡

^① 何兰萍、殷红春、杨勇：《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543页。

^② 孙九霞、黄凯洁：《乡村文化精英对旅游发展话语的响应——基于安顺屯堡周官村的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3期，第27—33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8页。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①。

一是创新乡村文化形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人民需求为中心,通过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形成以乡土文化为底蕴的,适应现代文明发展需求的乡村文化形态;并积极运用现代新媒体传播平台,拓宽乡村文化传播方式,着力解决乡村文化传播难发声、声音小、听众少的边缘化处境,让乡村特色文化走出乡村,为现代人的心灵提供栖息地。二是协调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立足乡村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体”^②。三是“绿色”是乡村文化的自然色,应该保持、发展多样性的乡土文化,尤其是发展乡村自然景观、生态文化。“越把乡村搞成千篇一律,就越没有被中产阶级消费的可能。而恰恰是当前社会结构的变化,造成新兴中产阶级引领绿色消费潮流。这是农业绿色转型面对的客观需求。”^③四是,开放是乡村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乡村文化要保持开放性思维,大胆汲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吸引城市文化精英扎根乡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最后,共享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目的。“共享是一个渐进过程,要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逐步提升共享水平”^④。在乡村建设中,要努力让乡村文化建设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也是社会主义的要求和体现。

(二) 构建乡村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再生产机制

自古以来,中国乡村传统文化形成了氏族宗法血亲传统、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天人合一等一系列核心价值,为乡村社会绵绵不绝、生生不息提供了丰厚滋养,使乡村社会历经战乱而不灭。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我国逐渐形成了以理性、独立、自由等为特征的现代城市文化。这是中国文化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也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可以说,现代文化与乡村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则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力量。即形成以乡村传统文化为底色,以现代文化为传统乡村文化注入新动能,形成既葆有传统文化底色又拥有现代文化支撑的,顺应社会变革趋势,且与农业乡村现代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乡村文化。同时,必须注意的是“传统是非常复杂的,好坏优劣经常可以同在一统中。如何细致地分析剖解它们,获得清醒的自我意识,就显得比单纯的‘保卫’或‘打倒’,喜欢或憎恶,对今天来说,就更为重要”^⑤。

这就要求构建一套乡村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再生产机制,对传统文化进行甄别、协调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把物质文化遗产之‘形’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神’融会贯通,需要对传统的‘形’与现代的‘神’进行重新组合加工”^⑥,通过“资源链接”,即促进他性文化资本的引入和转化;和“增权赋能”,即对自性文化资本的挖掘以及实现自身的再生产,调和他性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8年9月26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2021年6月9日。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③ 《关于乡村振兴,看看温铁军最新十个观点》,2021年4月14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6960488784055243&wfr=spider&for=pc>, 2021年6月9日。

④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振兴》,2019年10月8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6770218969461175&wfr=spider&for=pc>, 2021年6月9日。

⑤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19页。

⑥ 李宇军:《用好乡村历史文化遗产》,《人民论坛》2018年第33期,第136页。

与自性文化资本矛盾、沟通乡村传统与现代文化。^①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文化遗产‘传统——现代’的联结性，从而避免陷入文化遗产商业性开发的‘原真性’之争和突破保护性生产的市场发展困境”^②。

（三）构建乡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针对当前乡村文化传承的困境，构建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乡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是乡村文化得以保存、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文脉延续的重要保证，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着力解决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拆除等突出问题，加强制度顶层设计，统筹保护、利用、传承，坚持系统完整保护，既要保护单体建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城镇格局，还要保护好历史地段、自然景观、人文环境”。^③

针对实物形态的乡村历史文化遗产。首先，相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编制当地乡村文化保护规划，对乡村传统建筑、农业历史遗迹、乡村巷道等实物形态的乡村历史文化遗产提出整体保护措施，并对破损历史建筑等进行“微循环”式修补。这样既能对破损建筑进行有机更新，又能在不破坏乡村原貌的基础上进行乡村历史文化建筑的整治和修缮，同时也能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其次，考虑到对乡村建筑遗产的保护不能只关注外在物质形态，更应关注依托于物质形态的人和文化。综合来看，开辟“历史文化保护区”是一个有益的路径。这是对传统乡村居住文化的保护和尊重，也是预防传统村落居住文化被架空的途径。再次，根据当地历史文化遗产状况，在合适的情况下建立农业考古遗址公园、历史遗址博物馆、农业文明陈列馆、当地特色美食博物馆等，“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④，增强村民历史感和归属感，凝聚后辈奋斗力量。综合来说，应将乡村“历史文化保护放在优先地位，坚持‘整体保护、系统展现、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⑤，探索农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乡村历史文化旅游和乡村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历史文化保护方式。

针对非实物形态的乡村历史文化遗产。首先，实施“乡村记忆工程”，建立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摸清本地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状况，准确定位到每一个保护项目；并根据项目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保护和传承。其次，大数据时代下“非遗保护要利用好数字化技术，分门别类，将列入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资料逐一进行数字化录入、存储，以便长期保存。通过调查、采访，将各类非遗项目以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的形式记录下来。”^⑥再次，重视村史、村志、家谱的修撰。传统美德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深入挖掘乡规民约、家风家训，并将其记录在册，成为村史、村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丰富乡村文化内涵，保持、弘扬良好的乡村伦理道德秩序，为村民积极投入乡村振兴凝心聚力。

（四）吸引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文化建设

乡村文化建设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借鉴历史和国内外经验，乡村文化建设一定要在坚持中

① 蔡鑫、朱若晗：《链接与赋权：现代性反思视角下乡村文化资本治理与社会工作实践》，《晋阳学刊》2021年第2期，第115—123页。

② 杜华君、张继焦：《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与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动力——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人类学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09页。

③ 《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2021年5月22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110444>，2021年6月9日。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93页。

⑤ 余佳、朱远：《推进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83页。

⑥ 李长庚：《加强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学习时报》2017年11月13日，第4版。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五个认同（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的前提下，积极吸纳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才能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一是要发挥村民主体性。村民主体性通常是指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①。乡村文化建设“是一个调动民众自主、自发、能动的过程”^②。以村民为主体建设乡村文化，一是要在社会变革中，转变村民传统被动性思维方式，激发村民主观能动性，使其积极主动投身于乡村文化建设；二是村民要主动利用国家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和互联网资源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和专业知识素养，做新型农民；三是乡村文化创建活动坚持民间文化民间办的原则，以村民为中心，创建村民喜闻乐见的乡村文化。

二是要转换政府定位，由乡村文化管理者变为乡村文化服务者。在当前乡村文化建设中，政府主要扮演着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和乡村文化管理者的角色。这一方面能够为乡村提供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有助于乡村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当前政府对乡村文化的管理是一种向村民输入式的管理，其不利于村民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这就要求政府积极转换角色，成为乡村文化的守护者和服者，通过完善各种制度保障政策落实、完善基层组织建设，积极引领乡村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村民真正需求的文化服务，促进乡村文化繁荣。

三是文化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感。乡村文化作为文化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可以为文化企业提供滋养。文化企业不仅要认清自身发展的源与流，也要积极主动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也就是说，文化企业不能仅将乡村文化当作赢利的工具，更应自觉承担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乡村文化的社会责任，包括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资金、智力和人才支持等。

四是要切实发挥文化精英对乡村文化建设的作用。一是为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精英提供支持机制，不能使其成为“民俗文化的演员”“景点里的表演者”，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保证其工艺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二是在户籍制度、产权制度、回报机制等方面进行多元创新，构建新乡贤的乡村回流机制，吸引这些文化精英在乡村文化转型过程中承担更为积极的作用。

五、结论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环节，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内容。我国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对乡村文化振兴提出了挑战，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同时也对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契机。乡村文化如何在社会变革中化险为夷，走向繁荣振兴，这是一个历史性、时代性、现实性问题。综合来说，该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守、创新传统乡土文化，汲取、吸收现代城市文化，以村民为主体，发动社会多方参与，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才能让乡村文化老树新生，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魅力。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梁莹：《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的历史考察及其现实思考——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视角》，《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22期，第160页。

^② 刘姝曼：《坚定文化自信 重建乡村主体性——〈中国乡村文化建设发展报告（2018—2021）〉项目启动暨撰稿人会议综述》，《哲学动态》2021年第3期，第119页。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进一步推动宗教中国化

——云南中华文化学院举行2022年第一期文化共识沙龙

为贯彻落实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更好组织和引导信教群众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3月15日，云南中华文化学院举行主题为“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进一步推动宗教中国化”的文化共识沙龙。沙龙由教务处处长魏贵华主持，文化交流处处长诸芳作为主讲嘉宾出席并发言，2022年全省宗教界人士践行“四条标准”培训班全体学员参加沙龙。



昆明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慧空说，宗教中国化是中国宗教界的普遍共识。他回顾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的历史，指出佛教在建筑、服饰、语言上的中国化演变，强调佛教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要努力适应社会发展，与其他宗教一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云南省道教协会副会长袁至兑说，道教土生土长于中华沃土，几千年来，道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激荡，适应社会发展。当前的道教中国化，就是要把道教与时代相适应的东西提供给社会，做好“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大理州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杨泽雄说，宗教首先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才能与社会相适应。在讲经工作中，要对伊斯兰教教义作出符合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我们的共同愿望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穆斯林群众同其他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努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昭通市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刘双豪说，明末清初利马窦等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主动融入中华文化。从现实来看，天主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有很多契合之处。他说，天主教要继承先贤传统，尊重中华文化，适应于时代，服务于时代，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云南省基督教爱国会副主席罗德顺说，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强不息”相对应。二十世纪中华民族自主意识觉醒，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努力抵御海外文化渗透。教会建设要适应社会发展，注重发挥信众主体作用，实现传承和发展。

昭通市道教协会常务理事曾宗乾发言说，大道无形，浸润不是冲击，而是感化。俗和雅都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道教要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积极贡献，要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推行宗教中国化要落到实处。



诸芳说，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不绝，不断焕发生机，是因为它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博大胸襟。各种文化包括宗教文化汇入了中华文化，如百川归海，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同时，各宗教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不断发展，因此，宗教中国化既是国家要求，也是宗教自身发展的要求。宗教界要团结引导信教群众，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魏贵华指出，宗教中国化，既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配合，也要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适应，五大宗教

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嘉宾们的精彩发言得到培训班学员们的赞同和积极响应。大家纷纷表态，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促进我国宗教健康传承，实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文字、图片：刘洋 责编：刘林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季刊,1999年创刊)

2022年3月 第1期(总第93期) 第24卷

主管:中共云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主办: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印刷:云南省人大机关印务中心

发行:《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址:昆明市五一路221号

邮编:650031

电子邮箱:ynsyxbbjb@163.com

出版日期:2022年3月20日

ISSN 1671-2811

CN 53-1133/D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Quarterly,Started in 1999)

Mar. 2022 No.1 (Sum.93) Vol.24

Responsible Institution: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Yunnan Province

Sponsor: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ed and Published by: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Printed by:Printing House of General Office of Yunnan
People's Congress

Distributor: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Address:No.221 Wu Yi Road,Kunming City,PRC

Post code:650031

E-mail:ynsyxbbjb@163.com

Published: March 20, 2022

ISSN 1671-2811



定价: 9.00元